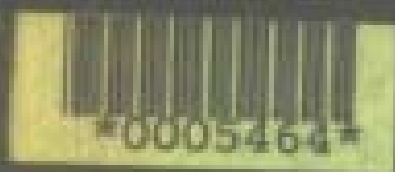


X · F · R · T · D · J · Z · B · Z · Y



# 談西方人

當今資本主義

王康 著  
三聯書店 出版

# 西方人谈当今资本主义

黄文虎 沈建国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西方人谈当今资本主义

黄文虎 沈建国 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武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

ISBN 7—214—00677—4

C·29

定价：2.90 元

责任编辑：王楠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60781/26

## 序

马莹何

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今列宁格勒)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其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说。列宁最喜欢引用这句名言,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有的甚至遭受挫折,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处于相对稳定、发展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些同志感到困惑和悲观,西方政界要人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则趾高气扬,头脑发昏,口吐共产主义“大失败”的狂言,做着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美梦。当然,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回答人们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去年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不少是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这对帮助人们释疑解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释疑解难,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们理论工作者针对热点、疑点、难点撰写文章是重要的方面,这个工作还仅仅是开始,需要继续做下去,力求做得更好。但只有这个方面还

不够，还应当有多种渠道。例如，让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谈前进中的社会主义，让出访西方国家的同志谈自己的观感，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看看西方人怎样议论当今的资本主义，这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理论工作者写的文章，在有些同志看来，总是将信将疑，认为恐怕未必如此。当他们看到西方人士，特别是有些算不上进步的西方人士，以其切身感受谈资本主义，其引用的材料和从材料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同我们理论工作者写的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有助于打开眼界，使一些本来疑惑不解的问题为之冰释。黄文虎、沈建国二同志所编《西方人谈当今资本主义》一书，正是在这方面做的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

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变化已经消除了它固有的矛盾了吗？请看：“关于工人阶级人数逐渐减少，这个阶级接近于完全消失的论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些事实上创造全部物质财富（这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的人和那些支配这些财富（并进而也支配创造的劳动人民）的人之间的对抗依然存在”；“债务危机使得债务国尤其是他们的人民处于更加依赖别人的虚弱地位”，“剥削和毒化第三世界国家仍在继续”；国际合作“不可能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更不可能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反复出现的危机”，“资本主义内部开始一场新冲突”。

资本主义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真是臻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吗？请看：那里的财团是“看不见的政府”，“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多元制是减轻过度压迫的阀门调节系统”；“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视劳动者的个性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真是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吗？请看：那里的人们感到“社会孤立，个性缺乏，前途无望，信心丧失”，“自杀率不断上升，认为生活没有价值”，“资本主义正患着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综合症”，“西方社会病”成了不可救药的痼疾。

这些论断都不是凭空作出的，而是以大量的事实和数字为依据的，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具体地看到。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不难从这里增进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暂时稳定、繁荣，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不过是回光返照。与此相反，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成熟，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改革一定能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终将磅礴于世界，永葆美妙之青春。

在六十年代初，美国统治者在“国情咨文”中曾说过一句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看来那时西方政界要人的头脑还没有热昏到现在这种程度。确实，时间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我们要树立长期竞赛、最后胜利的观念，专心致志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做好。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1991年3月12日

## 前 言

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同一个事物和同一件事情的评价，中国人说的，一些人就觉得不可信，或至少觉得份量不够；而只要是外国人讲的，则不仅可听，而且可信。就比如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评价吧，我们的人怎么说了，哪怕材料再翔实，论据再充分，他就是不信，认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外国人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评价，那才是真实可信的。这或许也属于一种逆反心理从中作祟的缘故吧。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就把西方人自己评价资本主义的许多言论整理出来，看看生活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专家、学者是怎样谈论资本主义的，这样也许更能提高一点可信的程度，帮助一些人增加一些对当今资本主义真实情况的了解。为此，我们萌发了编写一本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小册子的愿望。经过我们对这些年来搜集的大量资料的选辑、整理、编纂工作，如今《西方人谈当今资本主义》一书终于问世了，但愿它能为那些脑子里多少带有一点偏见的人提供一些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参考材料，获得对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当然，编纂本书的目的决非仅仅如此。对于目前正在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广大干部、教职员工、青年学生来说，本书无疑是一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辅助读物；书中许多出自西方学者的第一手资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当代资本主义

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相信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和保存价值。我们愿以自己的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入，帮助更多的人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菲薄之力。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主要运用美、日、英、法等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全面介绍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热点问题，书中都有评述。书中许多观点和结论是很深刻的，给人以启发。当然，由于阶级的局限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书中涉及的当今西方学者不可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系统地剖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肌体，因此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相信读者是能加以鉴别的。

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最终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依据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进行的历史过程。当今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比如，它还存在着经济发达、科技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的一面。但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完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应当走完的那段路程，而绝不能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可以永世长存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透过当今少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繁荣富足的表象，深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认清它的发展趋势。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少新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着，并



且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发展。这是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一种阶级的偏见，而是历史的辩证法。在这方面，本书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倒是颇有见地、富有远见的。当然，资本主义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对此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估计。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崭新而又复杂的大课题，需要我们从多学科、多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牢固树立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本书只涉及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对资料的选辑、编纂难免有不当之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理论性和权威性，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理论刊物《群众》杂志总编辑马璠伯同志欣然为本书作序，在此深表谢意！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国内一些学者的翻译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余孟仁同志和综合编辑室主任王楠同志对本书的编写表示了很高的热情，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编 者

1991年2月25日

# 目 录

前 言..... ( 1 )

**第一部分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 1 )**

**一 “自由经济，难以继续繁荣”**

自由经济：难以继续繁荣( 1 ) 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4 )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8 ) 我们正处于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17 ) 现代危机的理论( 23 ) 危机状态的经济( 25 ) 美国的不平等( 27 ) 信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 34 ) 资本主义对环境污染问题是无法找出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法的( 36 )

**二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前途”**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前途( 38 ) 不仅仅是一场福利危机，而且也是一场国家危机( 42 ) 对福利社会危机的评述( 44 ) 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执行资产阶级政策( 46 )

**三 “比较经济制度的标准”**

比较经济制度的标准( 49 )

## **第二部分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 ( 56 )**

### **一 “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56 )

多元制观念的欺骗性( 64 ) 美国“看不见的政府”  
( 68 )

### **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已名存实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已名存实亡( 70 ) 议会至上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司法对立法的监督( 72 ) 两党制对权贵统治并无妨害( 74 ) 日本的金钱选举( 82 ) 任命宪法法官的政治化  
( 84 )

### **三 “实际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不同于理论上的新闻自由”**

实际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不同于理论上的新闻自由  
( 87 ) 日本战时的“新闻机构完全被置于政府的法西斯体制之下”( 89 ) 新闻出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 91 ) 各种不同的学术压制  
( 98 )

## **第三部分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 ( 105 )**

色情文学日益商品化( 105 ) 包围少年的社会环境目前正趋于恶化( 110 ) 白魔腐蚀的国度( 112 ) 一个麻醉品文化的社会( 114 ) 自杀成了一种最常见的死因( 116 ) 建立在感官享受基础上的婚姻  
( 118 )

#### **第四部分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129)**

- 一 “我们的富裕社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我们的富裕社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129) 现代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吗?(13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视劳动  
者的个性发展(133) “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  
(138) 法国社会的贫穷形式(140) 当前日本工  
人的生活及其意识(142) 工人“富裕化”了吗?  
(144) 新中间阶级事实上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具有  
共同的客观阶级利益(151) 在瑞典,阶级社会绝  
不是临近消逝(153) 黑人与白人仍然不平等  
(160) 美国黑人的状况(162) 贫困向少数民族  
和妇女阶层集中(164)
- 二 “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166) 债务国  
的虚弱地位(170) 美国垄断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掠  
夺(172)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本质(175)
- 三 “经济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十分尖锐”  
经济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十分尖锐(179) 资本主  
义内部开始一场新冲突(185) 我们同日本的贸易  
摩擦是一浪胜一浪(189) 要对“敲打日本”反戈一  
击(192) 必须根除屈从美国的战后意识(196)

**第五部分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 …………… (200) >**

现代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矛盾(200) 国际合作  
不可能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反复出现的危机(205)  
面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7) 财富占有不平等与  
经济萧条(209)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  
无法维持下去(212)

## 第一部分

#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 一 “自由经济：难以继续繁荣”

### 自由经济：难以继续繁荣\*

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实际效果上已显示了体制的优越性，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它们看来难以继续繁荣。在工业国家中被正确地认为是最近几年搞得最好的美国也不能因此而例外。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使我们看出这种不足。

在美国，1986年每小时工资收入（经过调整的实际小时工资）的购买力比1977年要低大约5%，1985年的实际小时工资比10年前低3.4%。对一个参加工会的工人来说，这看起来似乎是工会领导在增加工资的要求上不够有力。当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美国经济一直没有使生产率取得根本性的

\* 摘自〔美〕P·麦克拉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歇根大学名誉教授，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7年在美国全国工商经济学家年会上的演讲，载〔美〕《经济影响》1988年第3期。

提高；而只有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实际收入持续增长的来源。战后的30年里，美国经济中的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大约2.25%（非农业部门）；1977年以来，每年只有0.5%；即使1982年以来也只有历史上正常增长率的一半左右。

再来看看就业。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相比，美国近年来的情况不差。就业率增长很大，失业率已从1982年和1983年的10%下降不少。然而，和我国过去的历史相比较，我们做得并不那么好。在本世纪最初的30年里，我们的失业率平均低于5%，而本世纪初的10年更是就业持续增长的时代——平均每年增长2.5%。这差不多正好是与衰退的1982年以来相同的增长率，不同的只是那时的平均失业率为4.5%，而今天的失业率是7%。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时，我们会发现它继续繁荣的困难甚至更大。据OECD的统计资料，在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失业率(4.1%)大约是美国(7.3%)的60%，法国(3.5%)甚至不到美国的一半。但在1985年，欧洲各国的失业率都大大高于美国，而且对其中某些国家来说，恶化的情况还是很可怕的。比如，荷兰1985年的失业率是14.4%，为70年代失业率(4.3%)的3倍多，几乎恰好等于美国1940年的失业率。欧洲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失业重担大多落到了年轻人身上。在80年代初，法国的青年失业率只比美国稍高（分别是17%和14%），但今天法国青年的失业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OECD认为，除联邦德国外，这种情况今后也不会有多大改善。

上述材料显然是读来不会使人愉快的。它们确实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一个如此难以繁荣和取得成功的经济制度，当它提高实际收入和扩大就业机会的能力变得如此令

人不满意时，能够有理由地指望在政治上取得长久的支持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显示出它更有能力广泛提高收入水平后，已失掉它的生命力了吗？这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那些管理经济政策的人已变得有点智力僵化了，甚至在明显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也没有行动的能力。这并不是罕见的令人头痛的事情。半个多世纪前，大萧条衰退期的延长和加深就是由于同样的僵化。本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不必要的恶化，就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思想倾向上一直是想避免失业，而同时又未能足够大胆地考虑当时所需要的新政策。

第二种可能性更令人烦恼：在现代世界里，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种手段是不是可能已没有能力为整个经济确定我们传统上所设想的方向？过去，货币需求功能的相对稳定提供了或似乎提供了和预定的经济进程相一致的货币增长率指标的基础；现在，这种稳定似乎已经崩溃了。

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对我们估算财政政策变化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的能力很自信。不管我们的估算模式如何，增加支出或降低税率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都是这一主要变动乘以约大2。但过去10年的经验是令人沮丧和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的。

第三种可能是，政府在抵制要求实行更加扩大的国内政策的压力时可能有它的道理，因为担心再引起加速的通货膨胀。欧洲各国看来已出现这种情况。根据OECD的资料，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的联邦德国失业率从10年前的1.5%增加到今天的8%。法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增长也比较大。相



反，美国在过去的10年里只增加了0.5%，日本只增加1%到2%。这些市场经济显然已不能象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做到的那样，既提供高水平的就业，也提供丰厚的收入。

如果自由工业经济继续使那些进入劳务市场的人很少有机会就业，使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机会出口他们的产品，那么，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忠心就会衰退下去。

## 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可以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80年代的发展概述为它对变化了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适应。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些条件的矛盾性和比例失调。战后时期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是垄断资产阶级为克服与削弱由于阶级斗争的国际因素和社会内部因素产生的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建立的。这个体系不仅受到延续到今天的危机打击，而且受到在许多方面变得越来越尖锐的危机的打击。

不分析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特点，就不可能了解当前条件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还在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就已经导致它在新范围内的垄断化，形成了国际康采恩——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输出借贷资本，积极参加国际现金业务和贷款业务。这些公

---

\* 摘自〔联邦德国〕H·容(联邦德国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的《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一文，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6年第7期。

公司以世界市场为目标，对国家垄断体系有很大的影响，这反映在“以保障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的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理论中。正是跨国公司关心供应政策。这种政策要保障利润增长，而不突出满足内部需求的问题。结果是在垄断组织对利润的关心与发展国内市场的需要之间出现了分歧。垄断组织增加利润的战略方针最终会成为使经济过程调节机制危机尖锐化的源泉。一系列其他因素也在促进这一点。

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逐渐成为使国际垄断竞争尖锐化的越来越起决定作用的前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同军事计划有关的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导致军事工业综合体及其影响的加强。

第二，资本和货币体制的由金融寡头控制和不受国家调节控制的国际市场在发展。这一过程直接与资本的结构积累过多有关。在国际范围内，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对再生产的国家机制的相对独立性有所增强。过分提高贴现率、资本大量流入美国、靠国际收支赤字的军备拨款，其结果是使整个现金关系、信贷关系和货币关系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敏感的关系，甚至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才对它们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对抗提到了帝国主义之间角逐的首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与在国际范围内运用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这里也有所发展。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国际化不仅同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地区性组织，而且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类型的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发展有着联系。除了国家和垄断组织之外，它们无疑是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为垄

断资本的利益实现自己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的新主体。在这里产生了帝国主义矛盾的相对新的领域。同时，这些国际机构是作为集团帝国主义统治的机构在发挥作用的，借助这些机构产生了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新结构。这可以解释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新趋势。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向心趋势占主导地位。这首先是由于经济国际化的结果。这并没有消除矛盾和与之有关的离心趋势。

西欧帝国主义力图在自己的边缘地区建立依附国势力范围作为自己的直接影响范围，但同时并不同北大西洋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西欧的垄断组织企图建立“集团”统治体系，这与美帝国主义企图独霸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基础上垄断资产阶级中间正在发生分化，出现了垄断资产阶级战略的不同方案。这反映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设制和结构的活动中。在它们对里根战略防御倡议方案、对“欧洲研究协调机构”方案的态度中，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经济同以前一样在按周期性危机的节拍发展，虽然危机的特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们记得70年代初的危机。滞胀是这次危机的特点。这次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结算制发挥作用和由于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拨款在美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危机也反映了垄断组织执行的价格政策、抑制资本贬值的战略。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内在动力。但由此也产生了服从垄断组织利益的调节机制的根本弱点。1974—1975年危机后，借助调节货币流通和全面“严格”节约的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成了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但是，这种方针不

仅加剧了生产周期性危机的基本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地区的和部门的结构危机，使国家预算赤字增加了。

从70年代起，生态危机是使局势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在人口稠密和高度工业化的联邦德国，保护环境的任务成了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甚至也要求对再生产机制进行本质改造，这不可避免地势必触动垄断组织的利润。这些现象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体系和基本经济结构的危机。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也揭示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这里首要的是指跨国公司在经济中居统治地位的条件。

联邦德国大约在20年前就已经确立了再生产的集约化性质。在由于国际竞争的尖锐化而加速了的科学技术革命的“电子技术”阶段，这种类型的再生产具有一系列的新特征。从60年代末起，建筑业和国家范围内的投资活动开始变弱了。在后一个10年，展开了旨在使生产合理化的投资结构改造。结果在生产的基本领域，积累的节约劳动和节约资本的机制越来越积极地发挥着作用。这导致在节约生产费用情况下扩大生产的能力，即腾出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尖锐起来，因为资本家的投资需求和消费者的大众需求都落后于再生产的需要。同时，过剩资本并没有用于生态领域或发展公共交通，也没有用于改造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因为这将导致降低利润指标。垄断组织也阻碍通过国家帮助来完善基础设施，因为这种完善要求认真改变再分配的制度，有可能损害利润。

现在，不仅在危机领域存在设备开工不足的形式，而且在迅速发展的部门中也有相对过剩的货币资本的形式，这两

种形式都表现出积累过剩。这一切导致借贷资本其中包括虚拟资本的增长。最大垄断银行的阵地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都在大大加强。

科学技术革命的“电子技术”阶段的到来，加剧了部门和社会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失调。公司在较大范围内重新合并的浪潮是80年代的特点，这导致“高技术”康采恩的产生。它们有强大的军事工业成分，并逐渐成为运用现代科学及实现研究、试验和设计工作的垄断形式的带头人。因此，在垄断资本内部正在发生结构改革的重要过程。这些过程有时是在国家领导下发生的，它们也影响着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向。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过去资本流动是通过自由竞争机制实现的。后来，垄断竞争占了上风，并形成了对这种竞争进行调节的国家垄断机制。正是后者现在处于危机状态，危机的实质在于，不能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现代化再生产的需要来分配生产因素。体现在上述现象和矛盾中的资本结构过剩逐渐成为危机的结果。

##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危机正使那些坚信我们已进入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资本主义矛盾已消失这样一个新纪元的人们极度困窘。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实现资本主义充分就业的目的—直受到猛烈的冲击。在这种环

---

\* 摘自〔英〕琼·罗宾逊(英国政治学家)著《论政治制度》第1卷。

境下，许多潜在或显在因素也正在发生作用。

人们谈论着“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而凯恩斯学派的方法即政府可维持就业的观点却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已看到，这些年的现实发展并不象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旦我们找到了经济衰退的原因，就知道如何控制经济，就能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开始享有一种合理的生活，克服现实的贫穷与不平，进而勇敢地步入一种不再需要经济学家的时代，即使需要他们也将成为象牙科医生一样卑贱的专家。

事实上，所谓凯恩斯学派政策的前景决非如此乐观。首先，刺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充分就业大都源于军备竞赛。翻阅一下联合国有关世界经济的调查，就不难发现，当面临经济衰退威胁时，美国的军费开支仍有增无减。我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冷战和各种热战部分是以防止失业而引起的。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力量发生了作用，但战争常被作为一种保持经济运转的手段。而美国，消除军费预算赤字远比消除社会福利预算赤字容易，因此，何时需花费于社会福利，何时需增加军费开支，往往都依赖于政治上的得失。除军费开支外，还有一种关于自由放任经济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的自由作用可带来利益（这种利益对社会是否有利，其实际含义留给实业家去评判），因此，投资的控制权主要都掌握在大公司手中，小公司的作用自然是其次的。这种为了保持就业的权宜之策比雇工在地上挖洞然后再填平的行为还要糟。在这种增长和充分就业时期，资本主义比它在其他时期有更多的作用，其保留条件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取代了军备开支和大公司疯狂的竞争投资。因此，那是在这种美好时期必须造就成的一个最大的保留条件，而这种美好时期现已受到威胁，并

且，似乎已近尾声了。

对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实施，还有另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是一般就业理论的提出者迈克尔·克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凯恩斯一般就业理论之前，他就提出了一般就业理论，但是，在人们了解有效需求原理，应如何实现社会文明方面，他的视野不及凯恩斯，对此他傲然视之。他预言：战后社会将进入一个政治贸易周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懂得如何控制商业贸易周期，我们也将懂得如何控制政治贸易周期。因为随着就业水平的提高，工资将增加，价格随之上涨，食利阶层为此烦恼，实业阶层也会因难以控制工人而叫苦。解雇不再成为对工人的严重威胁，行业惯例被暗中破坏，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许多经济学家无疑会承认情况糟透了。虽然政府平衡了预算，提高了利率，产生了一点失业，但不久下轮竞选又将逼近，任何政府都不希望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参加竞选。因此，他们召集竞选人马，主张非平衡预算，制造经济繁荣的条件，以获得竞选的胜利。如果有其他党派参加竞选，面临通货膨胀的困境，他们就会采取紧缩政策来消除由反对派造成的虚假繁荣的影响。政治贸易周期支配着经济的发展，也压制了传统商业贸易周期。正如克拉克所说：至今，充分就业只在经济鼎盛时才真正实现过，而在经济衰退时却只是表面的或暂时的。

所有这些都为凯恩斯时代的发展现实所证实。人们已痛苦地意识到，在经济社会事务中，最严重的矛盾是通货膨胀问题。这个矛盾不仅在工资与价格上涨的完全充分就业时期会出现，在高就业时期同样或多或少地也存在。对此，人们常说是凯恩斯的疏忽，但我却不以为然。我在1936年写的一

篇论文中提到：在产业关系无心理、政治因素干扰时，如果能成功地做到长期准充分就业，那么，通货膨胀也将随之产生。凯恩斯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一般价格水平决非处于平衡状态。在产业经济中，它受控于劳动力价格的运动，即随着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变化，货币工资率随人均产出变化而变化。当然，价格中的其他因素，如原材料价格，不会以同一节奏随之变化，有时，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还会扰乱工业品价格。但是，广而言之，货币工资率的变动控制着价格水平的变动。

目前，国际竞争已明显加剧。有些国家人均产出飞速上升，如日本，其货币工资提高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但相对人工成本率的提高却很慢。同样，联邦德国的人均产出和工资增长速度，虽次于日本，但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却比一些国家，如英国，要小得多。与竞争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均产出和工资的增长都较慢，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增长并未慢到妨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程度。我们常处于竞争劣势，而日本和联邦德国竞争实力很强。美国发现了竞争威胁，尤其是来自日本的。他们已开始采取一些手段来阻止从日本的进口，以拯救其自身的工业。

世界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赤字，资本外流量超过贸易差额。有时美国的国际贸易甚至出现逆差，这是由于美元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就可能无止境地要求供应美元。而美国事实上又是通过主要而不是现金来同其他国家购买货物、设备以及进行投资，这主要是货币金融协议了，新的货币协定随之形成。然后，又发生于本危机，接着又会形成另一次货币协议。由于世界不同国家的非平衡发展，国



际货币制度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事实上，通过提高货币工资来补偿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对保持世界经济平衡并不能起到有效作用，这是经济增长时期的另一种严重障碍。

然而，最迫切最紧要的矛盾当然是通货膨胀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说，货币工资的提高不会影响价格，但他的论点只是自欺欺人。因为，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增加货币数引起的。货币量恒等于流通过费用的增加，而与工资毫无关系。但这只能欺骗那些愿被他欺骗的人。

许多宣传者都谈到货币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生产率增长速度会引起价格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个问题，继而转向这是否是工会过错问题的争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工会的责任，因此，应该约束工会的行为。这是争论的一方面。而工会提出，货币工资增长对价格上涨的影响远非那么大，问题是各方都在利用宣传手段互相争论，而无人认真去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所在。现实情况表明，产业经济中货币工资的提高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这是工会的责任。如果价格上涨，而货币工资不变，通货膨胀将在原有水平终止。如果降低实际工资，将工资转变为利润，增加储蓄，通货膨胀也会抑制于同一水平。同时，这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是由于“成本推动”或工会借故生端而致。无论通货膨胀是由于什么因素引起的，价格上涨将引起货币工资提高，提高货币工资将引发价格上涨。这不是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如何运行的问题。我认为工会按照自己的情况来从事活动是完全正确的，考虑工人的工资是工会的责任。实业家通过提价来获得利润是无可非议的，每个人都在从事完全正当的活动。但是，认为这是工会的责任或工

会回答是垄断公司的过失，都是一种晦涩的论辩。

然而，当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它将成为使社会极度混乱的一个因素，如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就是这样。其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其收入并不取决于工作价值、技术水平或勤奋，而是取决于他所在工会组织的力量。强有力的工会能争取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其他入却觉得自己的实际收入没有保障。工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矿工或冶金工人能提高工资，而收垃圾的却不行。为什么？收垃圾的在为社会做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没有他们，我们就难以生活，但他们罢工是为这种制度所迫。那么，为何象医生和教师这种具有高尚地位的人也开始罢工呢？当他们发现其实际收入由于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时，必然会提出抗议，然后，被迫加入罢工的行列。同时，现实地推测一下，想以此获得好财运纯属异想天开。所有这些都令非常令人失望，因为人人都会发现这完全是荒唐之举。从来不会有公平的板球赛，相对收入也是如此。只要有油水，每个人都会喃喃抱怨，认为自己的工作收入太低。但是一旦其要求成为现实，那么“相对工资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种“报怨的均衡”在通货膨胀时期将被打破，因为各地相对工资都在变化。随即，“如何确定工资？怎么抑制通货膨胀？”的问题又要开始出现。只要这种“能抓就抓”的过程继续进行，那么，只有找到调整相对工资的办法，才能制止通货膨胀。但又怎样找到确定相对工资的办法？

这不仅仅是工资与利润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依据经济的“法律”，工人享得“合理的”或“公平的”份额，或只是工会与雇主之间斗争的问题呢？同样，也是一个相对工资以及统治集团的薪金与企业工资的问题。按高尔布勒斯所

说，在大公司的技术专家体制中，有些人薪金相当高，因此，生活比较豪华，而从事实工作者报酬却较低。什么是合理的收益标准？所有这些问题在通货膨胀之中都逐渐趋于表面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一。

有人说通货膨胀是工会的责任，因此，应该限制工会的权力。希斯先生曾在英国对此进行过尝试，证明并非如此。还有一种学说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只有一种选择，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始终追求充分就业之故。当然，这也有道理。因正是在准充分就业期间导致了经常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但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就不可能通过少量失业来制止。菲利普曲线表明：正是大量的失业保持了价格的稳定性。因此推论：必须有足够的失业，才能保持价格的稳定。多么玩世不恭的教条！这是不现实的。那些推崇这个教条的人，正是那些最后得到一个有养老金工作的人，可是他们还在说有些人应该失业。让他们自愿失业！这种以失业作为医治通货膨胀的议论是极其荒谬的，它只能加剧通货膨胀。如果告诉工会，必须通过少量失业来控制其购买力，他们不会答应，他们仍然会争取就业，扩大需求。

有人说，现在应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人们领取失业救济金，任何人都不会再想参加工作，他们宁愿失业来领取救济金。还有些关于失业方式的议论。30年代英国经常出现大量失业，在长时间的危机中，失业人数总不下于300万。内阁次第更换，并且众口一腔，认为许多失业者是妇女，她们不应包括在内，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以及自愿失业者也不应计算在内，还有结构性失业。这样，最终会发现根本不存在失业！人们痛苦地意识到，现在我们又在走回头路。对此，有

极不一致的看法，因为，一旦工会看透了这种把戏，就再也不可能用老办法令其信服了。通货膨胀局面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双方的一种表现，工会为提高工资，通过罢工来对付雇主，雇主对此并不很在乎，因为他们可以将成本加到价格中去。受工会罢工斗争冲击的并非是雇主，而是普通公民，罢工破坏了工会与其他一些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阶级斗争。几乎所有的领取薪金和坐办公室的人认为，应该存在一点失业，似乎存在着某种选择，或者是失业和通货膨胀间的一种交换。细想之，以失业的代价来减少物流，消除通货膨胀，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教条。通货膨胀可通过增加物流和供给以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来抑制。这种选择少量失业（当然有些人例外）减轻通货膨胀的整体平衡观念也是一种绝妙的效颦。如果想借助于失业来抑制通货膨胀，其结果将导致真正的衰退。当达到消除通货膨胀目的之前，失业率可能就会上升到10%、12%，甚至20%。当然，谁也不敢冒此风险。

政治贸易周期正在迅速复兴。以失业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企图很快被制止，因为政府没有勇气去面临因抑制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大量失业，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人们嘲弄政府，尤其是劳动部门，认为一切都是他们的责任，也是福利国家的责任，并将所有这些称为“社会主义”。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些承担责任的人，但我认为谁也不能负此责任。一切存在于现行制度之中，现行制度只能按这种方式运行。同时也难以找到一种回避的方法。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日本已通过有力的强制性经济手段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甚至在意大利，虽然实行的远非强制性经济，但

其通货膨胀已开始有所减弱，而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通货膨胀还在加剧。这意味着，不久我们将陷于“困境”。事实上，联合王国已在“困境”之中。只要你们象联合王国一样裹足不前，我想，你们也将重蹈英国的覆辙。

我认为，任何手段如指数化制度或冻结工资或控制货币发行量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征兆。追求充分就业，提高技术和教育水平使19世纪产业革命发展到难以处理好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阶段。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初期，是按封建制度的办法来处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已彻底消失，产业界这种“官兵”关系已成为历史。但是，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并非易事。也许不存在这样一种办法，一切都这样持续不断地进行，令人感到棘手和烦恼。在你们国家和矿区，看不到爆发革命的迹象，左派人士认为，通货膨胀愈严重越好，因为这将使现行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将跌跌碰碰地艰难运行。我看唯一的办法是制定一种能激发部分大企业关心自身利益的政策。这种政策在社会政策中通常是超前的，瑞典正在实施。这样主雇关系将得到彻底改变，应该让工人更关心其生活如何，是如何工作的，应该让他们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当然，这也意味着经理的习惯、思想及心理都有很大改变，需要有一种既能激发雇主关心自身利益，同时又要符合工会的利益的动力。要达到两方面的目的是有困难的，因为经理们从封建制度中继承了一种思想和观点，他们会发现很难真诚地把工人当作知己，因为掩人耳目的做法易做，实质性的改变却难行。工会也不会放弃对工资讨价还价的权力，因为工会的官员们必须为其成员做应该做的事，当然主要是工资问题，他

们在工会中的全部生活及政治地位取决于为工人争取工资的能力。无疑，工会应该承担多少诱发通货膨胀的责任是全部论题所及之一。阶级斗争的气氛正使其更固执、更难说服。哈德·威尔逊统治时代的“社会契约”已遭破坏，现在正处于残缺状态。只是夸夸其谈和表面性的变化以期望渡过危机，纯属妄想。

### 我们正处于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冯贝特曼：**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主张古典的自由主义。我想象中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和正确的，是可行的。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在实行这种资本主义的时候，做得很糟糕，甚至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现实的资本主义”是失败的，因为人们犯了技术上的错误，因为在利用资本主义模式的种种可能性问题上人们奉行的政策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就象一辆高级汽车，一辆好的运载工具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它都具备。但是我们必须能驾驶它，正确地控制它。政治上要解决的就是两项任务：装配这样一个模式并不断地改良它和正确地操作这一模式。就现实的政治而言，不论是在联邦德国还是在西方的其他国家里或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这两件事都没有办好。其中一个原

---

\* 文中的菲力普·冯贝特曼曾是法国法兰克福银行的房主，埃尔内尼斯·曼德尔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1986年9月中旬，他们在法兰克福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评论。摘自《法兰克福评论》1986年9月17日。

因是，人们尚未正确地理解这一整个模式，甚至其拥护者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模式的优越之处。那么，怎样才能去运用它呢？

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货币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就不能最佳地运转。人必须能控制货币，而我们的经济政策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货币理论是错的，今天的货币政策也是错误的，所以才导致现实资本主义的危机。

曼德尔：他与我的讨论是一位古典的或新自由主义者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讨论。米都斯和哈耶克是两位值得认真对待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与他们进行讨论是值得的。这些先生们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想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问题：我们社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历史地来看待这些基础？其伟大和弱小的地方何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矛盾在冯贝特曼的上述谈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我想概括地将其分为三点：

1. 危机的根源在于错误的政策。我反对。在过去的160年里我们共经历了21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我们正处于第22次危机的前夜。冯贝特曼先生甚至比我更悲观，他认为这场危机已经开始了。也许它在6个月或12个月以后开始，这不重要。但是，同样一种结局重复了22遍，就不能把一些次要的错误看成是根本原因。在这160年里，我们看到有种种不同的货币政策，银行的模式也很多，但都无法阻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到来。如果说在160年的时间里，经济上的景气政策、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有了种种变换仍然无法阻止

一件事重复发生21次，那原因必然是体制本身的。不能把这归结为主观的、心理的和智力上的原因。

2. 在新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新保守主义者身上我们常常发现一个重大矛盾，即他们与经典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的区别，比如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区别。冯贝特曼说必须要“正确地驾驶”市场机制。亚当·斯密听了一定会气死的，因为从定义上说，市场机制既不能被驾驶也不应该驾驶。市场机制说的是竞争那只无形的手，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起调节作用。不是靠驾驶员的技术。一位真正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说：这辆车最不足的就是它不是机器人，要人去驾驶它，所以人为地造成许多错误。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这辆汽车来说，不需要有什么驾驶员，不需要国家干预。这种干预只能说明那只无形的手不灵了，客观规律不能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目的。因此说，我们的社会是不好的，正象李嘉图的学生所说的那样，一只脚已经陷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泥坑之中了。如果我们问一下，要走什么样的路，为谁开这辆车的话，那么，人们对市场客观规律的优越性和自发调节的经济就不那么满意了。问题是市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而不是仅仅问客观规律将我们带到何处去。

3. “钱”，真的象冯贝特曼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吗？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一切从货币开始，最后又归结于货币，在这一点上我与您是一致的。让我们具体地说一下。我想引证冯贝特曼先生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了货币的中心作用。他使用了两个概念：货币和货币资本，好象两者是一回事似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形式掩盖了两者重大的不同点。



工人、雇员和小官员有一些储蓄，以应付急需之用。那些靠利息收入生活的人则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占全人口的10—15%，而且也有大、中、小之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和利率政策大概只会影响货币资本的占有者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全人口中90%的人们。不管利息的高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工人都得去买面包、肉和黄油，以及衣、裤，等等，他是被动的。物价上涨了，他不能说：我不吃了。物价下降了，他也不会因此而买50件衬衣。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企业主和纯粹的货币占有者所作出的主要反应都是对货币占有者所作出的反应吗？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关键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用他的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生存他需要工资用于日常的消费。资本家在分配其货币时也不自由，他受竞争的压力。在经济增长时期，如果他因为利率高或低而不去投资，那他可能欠债少一些，但他卖出的东西也少。在竞争中他可能会失败。反之也是一样。在经济增长下降时期，即使冯贝特曼先生亲自掌舵，那资本家也不会因利率有利而追加投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

大多数资产阶级景气政策制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的利率政策，而在于他们单方面地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和处理危机。只要存在着资本与雇佣劳动两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和两大社会阶级之间根本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引起危机的原因就不应是单方面的。这便是危机的原因。要不我们的政府和经济领导人就都是笨蛋，一头驴还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22次，而人却干得出来。

我同意冯贝特曼先生的意见，我们正处于一种严重的经

济危机之中。因为45年来通货一直膨胀。世界总债务已达75,000亿美元,美国的国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债务总数的2至3倍,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难道45年中所有的部长都那么愚蠢和一无所知吗?那么多不同的左的、右的政府对此都爱莫能助吗?原因只能到系统内部去找。在30年代,哈耶克教授曾对他的最大的反对者凯恩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您的建议只会带来可怕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答道:“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都得死。”凯恩斯只是想找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他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部分地、暂时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场危机早在1945年就爆发了。那样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是更好些呢?

**冯贝特曼:**我认为对市场过程实行控制很有必要,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影响市场发展,而不能只靠那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政策就是具有控制任务的一只手,而这只能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

我不想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生产力高而与那些吹捧资本主义的人站在一起。关键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少在我国是这样。大多数几乎是全部公民都有储蓄能力,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与储蓄多少没有关系。这是质的飞跃。现在数以百计的人都是事实上能够自由地做出决定的市场参与者,他们不仅可以在不同种类的香肠中进行挑选,而且也可以就支出还是不支出一笔钱做出选择。这就克服了阶级社会,至少是开始克服阶级社会。这种飞跃和变化已有20多年了,有趣的是5年来这种趋势又开始倒退或者停滞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静止和危机的开始。尽管有这么多的失业者,尽管危机已经开始,但在联邦德国已

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自由做出决定而言，在大资本家、小资本家和小市场参与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也使制定景气政策更为困难。在曼德尔先生所描绘的那种勉强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社会里，凯恩斯建议采用赤字支出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人一旦有了收入马上就会用于消费。但是20年来的情况表明，这一点是无法保证的了。工资的提高，退休金的提高，决不会一夜之间都用于消费，这就是质上的不同，也是资本主义的部分成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应该保持这一点。所以说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政策。

**曼德尔：**130年前马克思就写道：资本家对工人消费的态度有两种形式：自己的工人的消费越少越好，以便降低费用；其他工人的消费越高越好，以便能多卖产品。自有了成批生产的大工业以来就是这样，成批地剥削和成批地销售。我们都强调质，但是量也很重要，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可以通过其储蓄多少来划分。储蓄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小学生也储蓄。钱存起来总是为了消费，至于什么时候消费只是时间问题。这与资本的形成没有关系。

根据欧洲共同体市场的研究报告，约2,000万人属于“穷人”。一方面是几百万失业大军，机器开工不足，一方面是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冯贝特曼：**资本主义也可以做到。

**曼德尔：**160年来它没有做到。

**听众：**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除了财政赤字外还有人的赤字，人只是被当作物来使用。

**曼德尔：**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论点是：市场经济是建立

在竞争之上的。即使冯贝特曼先生能最佳地实行控制也无法阻止竞争的后果。一个不是以利润、不是以提高生产率和某种特殊服务的效率而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只能是建立在合作与团结的基础之上。

## 现代危机的理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与危机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以及对产业循环现实过程的分析，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就不能概括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但在以前，由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危机和产业循环的理论在结构上无关，人们以古典经济学危机理论为基础，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产业循环。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把国家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关键，以多种形态显现其基本矛盾，并通过深化危机的形式，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在理论上阐明这些基本矛盾的必然性，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同时，作为现代危机的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明确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既产生矛盾，又从其矛盾本身求得新的发展的现实过程。

**对现代危机论的探索** 所谓现代危机论这个课题，就是根据事实具体地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运动规律，揭示日本经济在结构转变中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此，在现代危机论的体系上，必须有特殊的构想。

---

\* 摘自〔日〕高木彰的《关于现代危机的理论》一文，载〔日〕《经济》1988年第4期。

也就是说，要有由“危机的基础理论”与“现代危机的分析”两个不同层次构成的理论。分析现代危机之所以需要运用有关危机的基础理论，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立足于商品生产，以追求利润作为基本动机，并以劳动力商品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的变动和发展过程使危机和产业循环进一步趋向必然化。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周期性的膨胀和收缩循环过程发展和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意味着包含矛盾，虽说其矛盾的积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有时要通过暴力，矛盾才能解决。同时，矛盾的解决又为重新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条件。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积累运动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引起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公布自己还不具备管理由自身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的一种表现。因而阐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周期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本质这一点，也是资本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课题。在“分析现代危机”时，应首先明确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1)基本上通过庞大的垄断体制控制生产和流通；(2)国家的作用被极力扩大，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关键。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从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并在再生产过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国家干预再生产的范围是有计划地调整政策。因此，必须把国家机能作为再生产过程的重要关键来研究资本积累以及国家机能在积累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

作者最后强调，在以上述理论为前提研究现代危机理论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对下述问题的分析，即(1)由庞大的垄

断资本形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2) 流通机构；(3) 产业结构三个问题，进一步明确日本经济产生危机和产业循环的必然性。

## 危机状态的经济\*

该文重点论述民族国家权力与国家经济不稳定性的辩证关系，分析战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如何为美国经济的各种政策所影响，如何为美国资本为首的国际资本的竞争所左右，以及资本迅速国际化给各民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所造成的灾难。同时，它也评论了这种国际化对美国资本自身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作者认为，70年代迄今，世界经济实际上一直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石油危机、外贸失衡、汇率大幅度波动，以及无法控制的债务危机，都是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关系”日益发生深刻变化。当前，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美国资本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支配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和西欧资本的力量明显增加。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尚没有突出变化，但它统治的“范围和性质”却已经改变。美国资本已经不可能再象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操纵一系列国际经济会议，制定国际资本活动的共同规则，为

---

\* 摘自〔美〕A·麦克埃万等《危机状态的经济：国家权力与国际不稳定性》一文，载〔美〕《社会主义评论》1989年第3期。

国际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资本在70年代以前的统治地位而造成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一体化”和“互赖性”，几乎把世界每一个地区的经济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没落，却没有形成一种“调整这种复杂国际体系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密切相互联系的和高度不稳定的国际体系所造成的危机时代”。

在这个危机时代里，虽然国际事变“规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动向，但各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它们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社会与政治基础，因此产生了“国家与国际”的关系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生活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回答。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没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一国内部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这种变化机制。另一种极端观点否认国际力量的重要性，鼓吹开展“反动民族主义”的国际竞争。作者认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方面，又注意到它的国内方面，因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当前看，资本主义经济都既具有国际的，又具有国内的特点，它既是国际的活动，又具有国内基础，二者是相互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正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说明。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扩张要以民族国家的权力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证；但也要看到，资本国际扩张的过程，反过来也会“破坏”民族国家的权力。英国在18和19世纪向北美扩张，既加强了英国的实力，同时也为美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本世纪以来，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既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西欧和日本的扩

张，使它们反过来与美国进行竞争开辟了道路。实际上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才使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处于危机和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该文在重点进行上述分析的同时，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和停滞的关系，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评述。例如扩张和停滞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当前的情况和过去有所“不同”。从历史上看，经济停滞和衰退为以后的扩张创造条件，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由很大的公司所支配，国家在控制需求过程中亦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它们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遏止”停滞和衰退，然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阻止停滞发挥它为其后经济扩张创造条件的作用。这不仅没有消灭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这一基本力量，而且使停滞的倾向日益严重，使经济长期处于缓慢而不稳定的运行状态。

## 美国的不平等\*

### 一、美国的不平等

在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美国是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因而在产生财富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包括政治权力及其影响）的分配方面也是极大的不平等。但有色人日益集中在这个社

---

\* 摘自〔美〕《社会学综览》1989年第1期。



会的底层，因而这些社会不平等也就成为种族的不平等。总的不平等是同种族不平等牢固地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认可这种巨大的不平等，认为它是经得住论证的和合乎要求的。在这样一个容忍巨大不平等的社会中，是无法消灭种族不平等问题。美国是西方工业社会很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拿美国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1987年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35美元。有670万美国工人处在这种工资水平，年收入是6,968美元。相反，工资最高的总经理李·亚科卡，1986年所得超过2千万美元，也就是每小时9,615美元。换句话说，工资最高的总经理1小时的所得比为数众多的工人在1年所得还多得多。

这种巨大的收入差别被给予了有力的理论论证，认为这种差别是激励的源泉。它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追求卓越。但这种论证更加合乎保护特权的逻辑。

比收入更加不平等的是财产所有制的不平等，这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激励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苍白无力。首先，大量的财产只是简单地继承下来，财产所有者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第二，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增长是以榨取工人为代价的。更多的是依靠财产所有者剥削他人的劳动，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进步。财产所有者简单地靠财产获得利益、租金或利润。

财产的集中问题在美国很少被研究。我想是因为它的披露将会导致政治上的窘迫，甚至危及那些掌权者。过去25年，这种研究只进行过两次，一次是在1963年，一次是在1983年。

1983年的研究发现，美国0.5%的上层家庭拥有这个国家

净值的35%还多。如果个人住宅的财产价值不考虑在内，同样的0.5%的家庭拥有多于45%的私有财富。

这个国家10%的上层家庭拥有72%的财富，留下28%的财富给其余的90%的家庭。如果住宅的财产价值不考虑在内，底层的90%的家庭只拥有17%的财富。

0.5%的上层巨富包含有42万家。这些家庭在国内拥有绝大部分商业企业。他们拥有58%的非合伙性生意和46.5%的全部归个人所有的店铺，他们还拥有所有托拉斯财富的77%以及62%的国家和地方债券。他们人均拥有890万美元，从250万美元到这个数目的几百倍不等。

福布斯每年发表一份400个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名单(《洛杉矶时报》1986年)。1986年，25个人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富的拥有45亿美元。名单中4%的人拥有1.8亿美元。在最高层财富的集中比1983年研究报告披露的更加突出。

到1987年，美国的亿万富翁已经从1979年26人增加到49人。最高的400人的平均财富已增长到人均2.2亿美元。一年猛增41%。最富有的个人现在拥有85亿美元。总之，这400人拥有净值2,200亿美元，相当于1986年美国整个的军事预算，或美国全部的国外投资。

## 二、种族不平等

作为美国社会特征的总的的不平等，当把人种和民族问题纳入进来时，便显得更加突出。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拉美人和土著美国人，日益成为用现有任何尺度来衡量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突出代表。

在职业分配方面，白人大部分属于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相当于从事这类职业的黑人和拉美人的两倍。黑人和

拉美人主要集中在报酬低的服务部门，或从事非技术性的或半技术性的工作。

职业的缺陷意味着工资和薪金的不足。1986年中等白人家庭每周收入566美元，与此相对照，拉美人家庭412美元，黑人家庭391美元。黑人和拉美人家庭的所得大约是白人家庭的70%。所有的无丈夫的家庭只能挣得很少钱。而黑人和拉美人的这类家庭所得则不足白人家庭平均数的一半。

此外，有色人种首当其冲地承受社会失业。1986年，14.8%的黑人男子，14.2%的黑人女子，10.5%的拉美人男子，10.8%的拉美人女子被解雇。而只有6%的白人男子，6.1%的白人女子失业。

缺少好的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缺少体面的报酬，这就意味着贫穷。尽管贫困线的数字有几分武断，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我们社会中体面生活的共同接受的标准。

到1984年为止，1/3以上的黑人家庭生活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把那些非常接近贫困线的人包括在内，那就有41%。五个黑人中就有两个是穷人或是准穷人。拉美人中有28%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如果包括接近生活在贫困线的，就有36%。与此相对照，官方公布的贫困白人的比例是11%。

财产上的种族不平等比起收入和就业来更能说明问题。普通白人家庭财产净值约39,000美元，多于黑人家庭的平均水平(净值约3,000美元)10倍。拉美人家庭稍许富有一点，平均净值约5,000美元。在无丈夫家庭中，差异更加显著。普通黑人和拉美人这类家庭的净值分别为671美元和478美元，不到普通白人家庭净值的2%。1987年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拥有85亿美元的财富。与此同时，普通的——不是最穷的黑人和拉

美人无丈夫家庭仅仅有几百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机会均等呢？

白人控制着各种形式的资本。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房屋、汽车以及银行户头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存款，而且拥有这个国家的商业投资。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数据是白人拥有股票的现象。白人拥有的股票是黑人和拉美人的3—4倍。

关于不平等和它的破坏作用，最近一个证据是45岁以下的人的死亡率。58.6%的黑人男子比白人更有可能在45岁之前死于心血管疾病。除了癌症对于印第安人，损伤对于黑人之外，实质上各种形式的疾病，少数民族都表现出极高的死亡率。最令人心碎的统计数字是婴儿的死亡率，黑婴在第一年里死亡的可能性是白婴的1.5倍。有人评论说，黑婴的死亡率相当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总之，在45岁之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死亡率同白人相比为1.42—1.47比1。这个国家的不平等成了有色人种的杀手。

### **三、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

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是同资本主义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只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消除种族压迫。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制度依赖于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依赖于不平等。

尽管现在公开赞成种族不平等是非法的，但我深信种族不平等仍然深藏于这个制度之中。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

欧洲资本主义迅速扩展到全球，经济动机是最基本的，寻求市场、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机会，寻求利润和财富的增长。

相信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相信欧洲人带来文明、拯救经济的发展，用这些来为白人的占领作辩护。

他们创造的世界秩序形成了。一方面，从欧洲农民和手工业者中创造出一个一无所有的白人劳动阶层；另一方面，在被占领的民族，他们创造出一个受着高度剥削的劳动力阶层，为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生产原料，从事世界经济中最脏、报酬最低的辅助性劳动。

两类劳工在剩余劳动上都受资本家剥削。但白人“自由劳力”相应地处在比较优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白人劳工得益于对殖民地工人的极度剥削。

尽管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以欧洲资本和对殖民地工人的剥削为中心的，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全球适应资产阶级经济需要的运动，在各自的区域复制着这一世界性体制。

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层次——有色工人处于最基层——今天仍然维持着这种状态。特别是有色妇女，是全球上最受剥削的工人。

能否在美国现有制度下重建一个种族不再同贫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呢？资本主义制度中所谓的种族平等，并不改变种族不平等的实质。

即使象白人那样，有色人完全分布于资本主义的各个阶层，也并不必然地消灭种族主义。这种同化观念就是同化主义。它宣称有色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和社区，象白人一样成为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必须用白人的价值观念来同白人竞争。这里隐藏着一种狂妄自大的看法，认为白人的方式是最先进的，而别人则必须尽可能快地适应它。其他所

有文化和价值体系都被指责为落后的、原始的或者是专制的，只有西方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人类社会组织的顶峰，是最完美的。

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几乎不值一提。白人的文明不仅给全球的被压迫民族，而且也同样给它自己的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例如，188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分配法》，它通过分配私有的小块土地给个人而结束了美洲印第安人公共土地所有制。然而，强迫美洲印第安人加入白人私有财产制度的计划并没有按照官方的计划进行。取而代之的是，白人买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留给印第安人的是贫困。

过去数十年中，黑人、拉美人和土著美国人中的中产阶级的增长并不能否定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存在。中产阶级本质上是这种制度的卫士。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黑人和拉美人中产阶级。有色人经常被作为一种象征来对待。他们在高层位置上的存在被用来“证实”美国制度是对任何有才能和有抱负的人开放的。但事实是，有色人中产阶级几乎都是用来控制穷人和种族上受压迫的社团，它摧垮反抗，阻止必要的社会变革。同样地，白人中产阶级也是这种状况。

事实上，一种为私有利益所驱动的制度是永远也不能解决它的社会问题的。拥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人允诺，市场力量将荡尽种族主义历史的消极影响，但这是一个幻想。已经富有的人财富仍在增长，权力和财富增强了特权。市场体系不能消除种族压迫，相反，市场的运行支撑着它。只有政治反抗，只有社会正义的需要，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 信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

日新月异的“信息革命”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萧条的重压下所进行的全面重新组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19世纪末和本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经验——大萧条和某种长期波动论所显示的那样，大萧条对资本主义来说，往往是强迫它进行重要技术革新和迫使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改弦更张的前奏。对这一全面重新组合来说，很明显，“信息革命”和微电子技术一道，实质上是起着核心作用的技术革新。

最近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发生太大变化，当然这里所谈的，也包括商品的卖方和买方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在内。表面上看，消费者在市场上的权利并没有被否定，反而得到加强，这是因为他们有了比较广泛的选择余地。这使他们在形式上还是一个有权力的购买者，但他们对于有关商品的信息和可能进行选择的整个范围，只能消极地去接受，“信息革命”仍然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这种处境。从而，他们在“信息革命”中的处境总是紧张的，他们时常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和不稳定感，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有时甚至出现类似精神病性质的病理现象。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有关市场的各种信息已能超越个人的信息网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世界的规模有效地集中起来。资本主义企业的贸易并不仅只限于国内市场，

---

\* 摘自〔日〕伊藤诚《“信息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一文，载〔日〕《经济学家》1988年第5期。

它总是要向世界市场求发展，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扩展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使用大规模国际通讯，信息系统的实力雄厚的巨型企业，完全能把国内和国际活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总之，“信息革命”已成为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向跨国经营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并有信息技术的发展，收集信息的效率也得到提高，但这些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与其内部信息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不稳定和不可靠性。不管过去和现在的市场能获得如何准确的信息，它的未来依然是没有充分保证的，它只能依靠间接信号筹划它的未来。

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熟练掌握了高级自动化系统，使它的地位和效率都得到了加强，在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关系上也是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向第三世界国家转让技术已愈加困难。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信息革命”这一进程的展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上的差距也在拉大，这已使第三世界的经济困难进一步恶化。

“信息革命”当然在提高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率上取得了效果。随着机器人化和工厂自动化的进展，各生产线上的直接劳动和能源消费量都有很大节约，从而使生产成本大大下降。在许多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特别是手工和熟练劳动的作用都在缩小，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也逐渐减少。工厂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同大萧条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使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可以说，资本主义正在患着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综合症。



## 资本主义对环境污染问题是 无法找出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法的\*

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混乱，有些人建议将社会史纳入自然史，使人类重返自然界，并提倡人类重新加入自然循环的行列，过简朴的生活。然而这却是失败主义和厚古薄今主义的做法。将自然史纳入社会史是促使人类对整个自然界担负起义务和权力。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将自然和人类对立起来，因为“未开化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已被人类所改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

目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日趋尖锐。这种危机是由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机制基础上的技术的盲目发展所造成的，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攫取利润的特点完全相符合的。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界似乎还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能源、工业和农业资源。这为人类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也是生产力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条主线。问题仅仅是如何来征服自然界。

就性质来说，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一方面要求无限制地扩大资本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样两者就发生了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分析这一点，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环

---

\* 摘自[法]谢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一书，1984年版。

境遭受破坏的现象还刚开始，只是局部问题。因此，这些现象并不是当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教条主义者们在环境和增长危机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只好满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这些问题将同资本主义一同消亡。现代主义者则宣传什么马克思被“超越”了。其实，只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无限的自我膨胀与自然界有限的资源发生了矛盾。

如今这种无限增长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发生了矛盾。因此必须给生产力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下一个新的定义。为了消除生产本位主义者为了利润增长，不惜破坏环境而引起的不良后果，我们有必要以“社会需要”为理由，有选择地控制生产力的增长。但是这种有选择的控制并不是某些专家治国论者所希望的“零增长”。他们的目的是维持西方社会各阶级之间以及世界范围内各人民之间十分尖锐的不平等现象。通过这种有选择的控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传统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过程中社会意识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生态问题的政治斗争直接对资本主义秩序提出了疑问，从而迫使人们把自然史重新纳入社会史，因为他们的斗争从根本上已经历史化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历史长河中人类行动的后果。

人类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态学家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指责。这种历史也就是上辈人的回忆：那年头面包味道好，河里也有鱼。他们有许多本领可以传授给我们。依靠这些本领，我们能够判断出现今社会的一些错误需求。

这种时代观还涉及到未来：“我们将给子孙们留下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人类的历史意义面对一个历来失调的、又为现状冲昏头脑的资本主义社会，再次得到肯定，生态危机大大动摇了西方社会，但第三世界的情况还远非如此。这里又涉及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一，即发达国家与依赖性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因为饥饿和日常必需品问题已经把他们弄得焦头烂额，因此对生态破坏尚未进行具体的研究。至于这些国家的官员，即使其中某些人是正直的、无私的，他们仍然掌握不住分寸，只注意短期的利益，忽视了失去控制的工业发展带来的长时期消极作用，从而破坏了环境。例如地中海穷困的南岸比富裕的北岸污染程度严重得多。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对环境污染问题是无法找出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法的。

## 二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前途”

###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前途\*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与政治分析家们普遍认为福利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福利国家为劳资双方所制定的“和平准则”（见C·奥菲著《福利国家的矛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已大部分被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模式”（见M·卡诺伊与M·卡斯蒂尔斯的《这场危机之后？》一文，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所取代，这种模式将重点放

---

\* 摘自〔美〕K·乔普克的《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前途》一文，载〔美〕《伯克利社会学杂志》1987年第32卷。

在国内经济的资本重定，加紧极权主义的控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织资本流量。“保守派革命”（见K·菲利普斯著《后保守主义的美利坚》，纽约瓦因出版社1983年版）的主要对象正是福利国家本身，它认为福利国家由于征税和限制过多，降低了资本投资的动力，并且由于发放福利救济金和加强工会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

的确，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战后福利国家的扩大促使西方工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强制性的保险计划，劳动保护法的制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教育与保健设施，国家补助的住房建筑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些社会政策加强了有组织的劳方对付资方的力量，但是却增加了国家自身的借贷，使货币紧缺，利率提高，其结果是利润下降，资本短缺。

换言之，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已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通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衰退的需求管理，福利国家创造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正常条件下，福利国家能够使阶级矛盾非政治化，并将它转变成为劳资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分配而进行的交易（C·奥菲：《竞争性的党派民主与凯恩斯的福利国家》，同前书）。然而为解决资本主义这种特有的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目前这种经济停滞不前的“零和”局面，也就是J·奥康纳所准确描绘的“积累危机”（J·奥康纳：《积累危机》，牛津1984年版）。

……总之，福利国家为适应人们不断提高的欲望，为维持“民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作的努力，已逐渐从资本转向消费。但目前国家正面临由于生产过程高技术的重新结构而引起的种种难题。耐用消费品充斥国内市场，工厂倒闭以及

“非工业化”现象的日增促使失业问题和国家收入的下降日益严重。此外，凯恩斯主义的赤字开支在资本紧缺而非需求紧缺的时代已经过时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是垄断资本主义既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而生存下去。由于采取利他主义的原则，福利国家削弱着市场关系和利润动力的优势，因而危及垄断资本主义，然而垄断资本主义又需要福利国家来维护其制度的合理性。

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成问题的关系一直到戏剧性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衰退时代表现出来。劳资和解的基础，即一种“正和”的发展经济已经消失，而作为阶级调和工具的福利国家本身已成为激烈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对象。

随着传统福利国家联盟的衰落，新保守派的联合及其新的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已达到无可抗争的优势。以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为代表，这种社会——政治联盟受到强调“生产率”的社会集团与阶级的支持。他们赞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一极是资本、职业和技能的占有者，另一极则是在生产系统中不再被人们需要的大批穷人。这种新保守派联盟是由老的中产阶级分子(店主、农场主等)、新的中产阶级分子(所谓“新兴城市的专业人员”)、工人贵族，以及大企业所组成。他们显然是亲工业、反福利国家的，在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经济上，他们赞成供应学派的政策：减税，将资源大规模地重新分配给社会上层人士和企业，听任失业与整个农村地区及其居民的贫困化。在政治上，他们希望政府的政策制定超脱民众监督和管理以降低国家的合理价格。在文化上，他们正在调动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流行宗教，以反

对传播后物质主义的强调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其主要的传播者是知识界的“新阶级”、自由职业者、新闻界的专家以及福利国家的工人(I·克里斯托尔：《对资本主义的两声喝采》，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78年版；B·布鲁斯—布里格斯编《新阶级吗？》，新不伦瑞克学报图书公司1979年版)。

我们可以从M·卡斯蒂尔斯和M·卡诺伊对于美国情况的分析中将“新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归为六点(《这场危机之后？》同前)：

(a) 从福利国转向战争国。公司的剩余资本既然不能再有利可图地投入大众消费品饱和的市场，发现它在国家保证需求的政治立场上可以找到有利可图的出路，如军备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b) 世界经济通过技术革命重新形成。其核心是发展微电子软件和信息技术。新的职业市场在相当少数的高薪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大量低工资的一般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厉害。

(c) 取消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工会的分裂，国家缩小对企业经济干预的范围，以及社会工资的剧减，这些都是目前资方在新工厂统治中恢复其对劳方优越地位的策略。

(d) 劳动力的分化与“非正规经济”的兴起。移民的廉价劳动、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工业生产，以及工作职务个体化的加强(如在家操作微处理机)，所有这些正从结构上破坏着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

(e) 非工业化，尤其在美国。在美国，愈来愈多的工厂不是迁向阳光地带，便是迁向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低工资国家。由于国际竞争的关系，它们从经济上考虑有必要这样

做。同时由于生产的灵活性的提高，在技术和组织方面也允许它们这样做（F·弗勒贝尔等：《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f)经济的国际化。生产和管理由于按地区而被分开了，同时由于金融资本逐渐集中于多国企业而生产遍布全球，公司大多回避由国家政策来制订规章条例。

总之，新保守派这种不要劳方的发展模式正在破坏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

## 不仅仅是一场福利 危机，而且也是一场国家危机\*

福利国家所遇到的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福利危机，而且也是一场国家危机。

30多年来，福利国家一直是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基础。今天，福利国家几乎处处都陷入了困境。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再是经济的稳定性因素了，不再是维持购买力的保障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本身已经不是一种调节器了。费用太高，国家开支已达到了极限，人们几乎天天听到这种抱怨：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再也无法为维护整个社会福利的大厦作出牺牲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改革？怎样才是根本性的改革？怎样达到根本性改革？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了1984年和1984

---

\* 摘自〔荷〕H·范·勒伊克《福利国家陷入双重危机》一文，载〔荷〕《埃尔塞维尔斯》周刊1983年10月8日。

年以后的发展，我们应当从过去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这些问题是不久前“1960—1970年荷兰福利国家建设”讨论会集中讨论的议题。这次讨论会在荷兰格罗宁根皇家大学举行两天，是由荷兰“哲学和社会学协会”组织的。

在讨论会上，学者们的意见也是很不一致的。博姆霍夫教授强烈地提醒说，我们不当草率地把现在的这场灾难归咎于上帝，归咎于偶然性或外国，现在该是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大刀阔斧地改革我们的制度。他的同僚德里海斯教授慷慨激昂地说，经过一段时期后，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格罗宁根社会学家福尔蒂恩却认为，如果政府现在不迅速决定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扭转购买力每况愈下的倾向，就会慢慢地出现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博姆霍夫教授反驳说，这是“无稽之谈”。他认为，大幅度的节缩政策确实给购买力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但是这些后果二年来大部分已经消除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职业政治家的态度，特别是参加讨论会的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他们都明确地承认，福利国家目前陷入了危机。工党主席范登贝赫说：“不应该说，福利国家已承担不起社会的开支了；而是应当说，我们不想让它再支付这笔费用了。”自由人民民主党主席卡明格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福利国家制度已经很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经济学家们也许能确切计算出福利国家什么时候就无法支撑下去。我们自由人民民主党人认为，福利国家无法支撑下去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讨论会上，左派人士有一种不寻常的观点；少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福利措施不能总是静止不变，应加强市场部



门的作用。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荷兰之外，都有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越来越明确地赞同这种看法：福利国家的危机首先不是一场福利危机，而是一场国家危机。现在，到处都使人感到需要就国家、国家的职能和国家的权限制定一个完善的理论。

不少与会者指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基础性的，应当让经济学家中精明强干的人来管理国家，应当争取专家们的帮助，仔细地考虑民主和国家的任务，研究各种福利措施的选择办法和日常的责任。因为福利社会远远不只是每个月发发补贴，它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方面。

## 对福利社会危机的评述\*

随着战后经济增长、生活富足年代的结束，西方工业世界进入了一个匮乏时期。人们痛苦地意识到增长和社会所能提供的机会，政府以及国民经济都是有限度的。由于结构调整产生的失业和生存机会下降等问题困扰着社会，各国政府面临着空前预算赤字。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不仅受到严重资源短缺的潜在威胁，而且必须竞争于国内外接近饱和的市场。

**超载危机理论** 正统观点认为，后物质主义社会中过分扩大的需求和过分的民主造成了政府统治控制的危机。问题出在政府本身。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平等，其福利和干预

---

\* 摘自〔加〕T·O·休格林的《匮乏时的分化政治：对福利社会危机的评述》一文，载〔加〕《政治学》1987年6月号。

政策削弱了人们的工作动力，其财政负担和对市场经济的限制性规定则挫伤了投资兴趣。结果是经济下降、财政危机。工业结构调整和削减预算等被认为是适应经济变化的“正常”调整措施。于是危机的原因便集中在人们的态度变化上：一般长时期的繁荣之后的工业社会产生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使社会拒绝进行必要调整来适应贫乏时代，同时对政府又期望过高。后物质主义的期望同可能实现的目标之间的暂时分离是超重危机的根源，政府过分控制、规定过多则造成统治无力和经济停滞。假如对后物质主义态度和过多的国家干预一起加以约束并制止，一般新的增长期也许会到来。因此，持超载分析理论的保守派主张，在以投资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一段必要时期里，实行“取消规定”政策，并调整人们过分的期望。

**结构危机理论** 同“价值观变化”和“超载”理论相反，左派激进分析家认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构矛盾带来的。规定过多和超载现象并非危机的基本原因，只是危机的一个方面，是表现形式。福利社会的矛盾实质是：社会经济稳定依赖于两种功能的实现——私人积累和大众福利合法化。私人积累越多，财产大众化的要求就越强烈。因此，战后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同当时长时间增长和繁荣一起得以发展并非偶然。资本主义由于其获利积累受到这种榨取的威胁，反倒依赖于这种福利支出的合法功能而得以发展。资本主义“难堪的秘密”和矛盾正是它既不能同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离开福利国家而生存。而国家一方面愈发卷入福利开支，一方面又不得不代表经济本身加以干涉。经济富足时，政府可以制定奢侈的福利计划。而经济萧条条件下，只好两头开

支。国家财政危机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综合方法** 作者认为，同超载理论相反，当前的危机不仅是价值态度变化和过多规定造成的，不能指望通过痛苦而必要的调整来扭转局面。激进理论忽视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对危机的影响。作者认为，先进工业的工业社会之所以难以管理，是因为顽固的后物质主义态度和进一步加深的结构矛盾两者共同造成的。富裕时期的经济剧增使自发异常困难，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积累不仅耗尽了可用资源，同时占据了潜在的新市场。在这种匮乏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重组现有的工业资源，而不是增加新的资源。

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曾预见的充满矛盾的困境之中。国家干预下的不平衡结构调整，加速了不同利益部门的分化。而分化的利益部门要求政府进一步干预，调整结构，这样又加深、加速了分化的过程。当前新保守政府采取的结构两极分化政策包括：（1）扩大社会层次间距；（2）推动某些部门非工业化；（3）加紧区域独立化分离。因此，现代化过程从两方面受到威胁：生产水平低的经济部门不断要求生存；工会工人坚持要求增加工资。

## 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执行资产阶级政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实行改革中起

---

\* 摘自〔瑞典〕X·彼捷松（瑞典左翼党执行委员、议会代表）的《改造社会的工具》一文，载〔瑞典〕《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89年第6期。

着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对于生活在具有相当高的生活水平和较低失业率的国家里的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改革在对瑞典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评价表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有利于劳动者，明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这种变化无论如何无损于资本家，因为这是在资本家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只有较短的6年中断（1976—1982年）〕，但资本却能够利用改革的成果来加强其在社会上的权力和生产中的统治，还在国外获得了强大阵地。

工人运动日益增强的组织性、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对于实现劳动者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工人阶级仍然是软弱的、分裂的，那么，上述变化就不可能发生。但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虽然所处阶级地位不同，并在表面上有对立的论据，但却伴随着整个改革政策而追求同样一些目的。

在我们今天，资产阶级同意改革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例如，请工人和职员个别地或通过工会购置日后可换股票的“兑换债券”。这种“参与”可转移工会为争取提高劳动报酬和发展生产民主而斗争的注意力，促使劳动者对增加利润感兴趣。同时，劳动者对财产的“共同”占有有安全感。

当然，共产党人向来赞成群众生活得更好的变革，尽管清楚地理解这种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而社会民主党则丧失长远的目标。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话确切地表明这里指的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瑞典社会尽管受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统治，却远离改变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目标。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利益同资本的利  
益一步步地结合起来了。在80年代，政府鼓励增加利润和抵

制劳动者增加工资的要求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政府使军事工业综合体得到优惠并促进经济跨国化的方针同样值得注意。追求最高限度的利润、更高的赢利率的意愿，开始渗透到社会公正的部门。生产中劳动操作的分解和个体化破坏着劳动者的集体斗争。

资本是否抵制改革？一般说来提出这个问题是一种简单化。分析一下什么要求受到抵制，什么要求被接受，谁“赞成”，谁“反对”，会是更有成效的。

显然，改革威胁着资本主义或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它受到有效的抵制。因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它通常是同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党一道进行反对共产党人在民主化和社会变革方面的走得太远的要求的。他们在长时期内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来估量其发展经济的改革计划的。

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是加强还是削弱资本主义？从瑞典的经验出发，可以说资本主义得到了加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改革保证工人阶级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影响渗透到工人阶级中来了，并且“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并借助资产阶级的论据来维护这种政策。众所周知，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还并不能自动地开辟社会主义的前景。主要的是怎样运用社会上和生产中的权力。而这又取决于那些管理国家的人们的意识形态观点，当然也取决于劳动者对必须实行进步变革的信念。须知，在群众施加强大压力之前，这些进步变革是不能实现的，也不会从议会中得到赞同。

在瑞典，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外汇业务和收入水平的监督削弱了，公共部门的企业股票要作为该企业私营化的第一步被抛向交易所。完全属于国家的企业按市场规则发挥着作用。这些企业存在本身无论如何也无助于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在国内，4%左右的最富有者在80年代大约占有瑞典家庭财富的80%）。社会民主党用它的“勒紧腰带”的政策和对待公共部门企业的方针准备着走上完全私营化的道路，当富裕居民集团要求作更大让步时，私营化可能大量涌现出来。

一般说来是很清楚的：国内所实行的当前这样的改革政策并不威胁资本主义。这个政策的限度取决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力量和觉悟的程度。因此，除实行保证很大的社会公正的改革行动外，我们党力图进行思想斗争，这个斗争旨在保护劳动者的根本权利和利益，并争取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前景。

### 三 “比较经济制度的标准”

#### 比较经济制度的标准\*

我们在此提出评判不同经济制度的几个通用标准。不过读者应注意，对评判标准，经济学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

**生活水准** 比较经济制度最明显的标准是一个国家人

---

\*摘自〔美〕伊博里斯特《比较经济制度：政治经济的方法》一书，1984年版。

民所达到的生活水准，一般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人们也许会认为，说甲国的生活水准比乙国高，就能充分证明甲国的经济制度比乙国好，至少在这个方面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资源。我们怎样把一个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同一个缺少这种资源的国家相比，把一个经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同另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相比，这公平吗？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刚刚实行了某种新的经济制度，那么用即时的生活水准就无法证明这种新经济制度的优劣。

此外，人均收入反映的只是一个有限的物质标准，它难道能反映经济制度对生活质量的效果和人民对这种制度的态度吗？比如说，资本主义所作所为和人们的想法一致吗？一个学者这样评述说：“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它提倡通过勤劳、俭朴和节约来致富，实现生活的尊贵和最终目标。”他接着说：“在以前的社会里，对富裕的追求和辛勤劳动被看作是低贱的活动，是一种痛苦，是奴隶、妇女和社会下层从事的。与此明显不同，工业社会使获取财富在道德上能够接受，并把它看作一种道德义务。”这种历史上产生的进取精神如今是加强了，还是淡薄了？我们怎样把它的作用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精神进行比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轻而易举的。

使用生活水准或人均收入作为比较标准还存在一些问题。假定人均收入平均值很高，可是只有少数人享有全部收入，而大多数人只享有这个平均值的很少一点，这如何解释？一些阿拉伯石油王国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不能仅仅看到平均的个人收入，而不注意这种收入的实际分配。还应提出

疑问的是，是否拥有更多的电视机，或者每千人口中医生的比率高就意味着生活水准高？对此看法，也不尽一致。难道一种高的生活水准就是有更多的香烟，更多的医院，更多的不动产买卖商和证券经纪人，更多的教师和更多的娱乐者，或更多的豪华轿车，然而同时，街道上却有更多的烟尘和犯罪吗？

在既定的人均收入基础上进行比较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用生活水准作为比较标准，而提出另外一些能较精确加以定义的准则，用它们在不同经济制度中的体现来进行合理的比较。这些标准是：(1) 静态效率；(2) 经济增长和动态效率；(3) 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4) 充分就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5) 经济自由和非经济因素。

**静态效率** 所谓静态效率是指在一定数量投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和一定工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品的数量。概略地讲，我们考虑的是生产力：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这些既定的资源？目标是通过有效使用现存资源并达到技术上所允许的最高生产水平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福利。当然，产量是由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产品构成的，因此，各种产品的配备组合应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

换句话说，效率的含义包括一定条件下的最高产量和产品类别的最佳组合，这种产品反映了社会需要和偏好。当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产品的需求并不仅仅由社会需求或人们的愿望而定，而且还取决于人们的货币收入(一个穷人希望得到一件裘皮大衣的需求并不能对产品的总需求产生影响)。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量的最“有效的”组合也在某种程度依赖于收入分配。



由于统计资料有限，计算问题，对质量判断等方面的影响，对不同国家静态效率水平的可靠估算极其困难。

**经济增长和动态效率** 经济增长是比较经济制度的又一标准。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依赖于动态效率，即相对于投入的加权增长率的产量增长率。建立一种新的工业技术或进行一项新的投资，不同的制度表现各异，有的好些，有的差些。

在各种因素中，经济增长依赖于每年收入结存和投资的数量。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投资率越高（由国民收入决定的投资），增长率就越高。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通过税收和国营企业的利润积累资金；然后又投入计划中的工程项目。不过对于计划者来说，在政治领袖和消费者的压力下他们提出的某些项目，资金总是显得不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新的投资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能获取利润，它是确定新资本来源的主要原因。如果工资被压低，利润非常高，那么就会有充分的资本供给。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富人的）资本积蓄就越多，潜在的资本也就越多。不过这种潜在的资本并不一定实际用作投资，除非资本家期望能从进一步的销售中获利。然而进一步的销售依赖于消费者的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收入分配更公平的情况下，才会有更大的增加。对那些过分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国家，出口也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没有充分的需求，产量和就业率必然下跌。因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有极重要的联系。

**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和公平，那么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不应当是：一些人工作低下，工资

微薄，食不饱暖，而另一些人却靠继承的财产，收入万贯，饱食终日。

无论怎样，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是许多比较经济学家公认的一个评价经济制度表现的标准。如果把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作为一个目标，那么，一些经济成就就不一定要过分地赞许了。例如，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巴西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不少观察家认为巴西人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巴西的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平等。大多数的评价报告都认为，多数的巴西穷人并没有从这种增长中获得多少好处。

**充分就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目前，美国的失业者已达到了1,200万，这些人想要工作却无法找到工作。许多研究显示，失业率与精神病、离婚、营养不良以及犯罪有着密切关系。人们遭受的痛苦是如此之大。即使那些被雇佣的美国工人比某一其他国的雇佣工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是某国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是美国的经济运转好些呢，还是某国好呢？除了充分就业问题，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标志还包括价格和产量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

**经济自由和非经济因素**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下述一种观点，即是否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更容易产生民主，或产生专制。一些人认为政治民主自身（在言论自由的气氛下，由选民或他们的代表来决定大政方针）和经济民主（由所有参与者通过各种层次的民主手段来管理经济或企业），既是重要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效率和平等这一目的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上的民主对一个企业的工人来说，或对社会大众来说，很可能是减少财富的集中，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在计划经济下，政治民主则是要使经济计划能更准确地

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既然产品种类的组合更接近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专制领袖人物的意愿),也许可以认为,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的不足可以改善。事实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制订整个经济或者一个企业的决策,工作积极性也会高涨。

经济自由常常被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解释为,消费者有选择他们所希望的商品的自由,工人们有改换工作的自由。新古典学派强调,这样的经济自由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则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权利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一个富翁可以选择一枚钻戒和一件裘皮大衣,而一个穷人对此却无权选择,尽管他也有想得到它们的愿望。一个穷人甚至连备足食品,吃顿象样的饭这样的事也无法选择。还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选择工作的自由是被失业大军和享受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约束着的。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应是每一个消费者享有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权利以及每一个工人享有的工作权利。简要地说,人们内心希望两种自由同时存在:消极自由,即没有阻碍地改换工作,购买所要买的商品;积极自由,即有足够的钱和就业的充分保障,有能力购买生活需要品,在乐意时,变换自己的工作。所有或大多数有理想追求的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保障”视为令人向往的目标,即使一个人病了、残了、老了,或失业了,他也有最低收入的保证。

一种经济制度也许对一些超出政治经济范围之外的事有特别的作用。例如,一个建立在私人利益不受控制基础上的制度,对环境的毁坏甚于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不少批评家都这样指责,因为追求最大私人利益是它强烈的动机。在一个大企

业的私人帐单上，从来就没有列出破坏环境的成本耗费……

我们在前文提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认为它使工人异化。就资本主义造成异化(马克思解释了缘由)这个意义说，这个制度趋于造成人们的痛苦、孤独、忧虑、精神病，等等。

很清楚，上文提出的这些社会准则不同于那种严格的限制条件。的确，衡量许多经济表现的比较准则是困难的，不少国家不具备有关的统计资料。所以在充分讨论展开并做出结论之前，我们将摒弃直接评价不同的经济制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热切希望读者记住上述几个比较标准。

## 第二部分

#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

### 一 “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 民主的要求和 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我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是指《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特别是1918年和1928年两次选举法导致普选制包括全部成年人以来，逐步发展而成的英国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一般叫做“民主制”。认为英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一概念已被看作一项十分明显的真理，不必多加究诘。这是以许

---

\* 摘自〔英〕拉尔夫·密利本德（英国政治学家，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多年，1972至1978年，在利兹大学任政治系教授，1982年起，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朗德斯大学劳工系教授，主讲社会思想课）《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一书的导言，美国纽约牛津大学1982年版。

多重大的未决问题为依据的。如果民主制被解释为民众参与决策和控制国事的处理办法，英国的政体就远非民主。本书的主要命题之一，是论证这一政体始终尽可能致力于扼制而决非助长民众行使决策权和处理国事的权力。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资本主义民主制”这一提法，也往往用来表示象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存在和无法消除的矛盾现象或紧张关系，一方面保证民众享有体现在奉为神圣的普选权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横加阻挠，拒不实行那种诺言。固然有一套民主制度和惯例使工人阶级、参加工会的工人、各个政党和团体等能够赖以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和提出要求，来表达意见和选派代表，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背景又要求尽可能地削弱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要在本书论证，所有管理国家和其他权力机关的人时刻关心着如何能够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依靠精心的控制，还依靠种种鼓励无所作为和听天由命而绝非鼓励压力和斗争的习惯、传统和规矩。即使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和所有其他统治制度一样，历来需要并且目前更加需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说，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历史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成功地多方实现了这一遏制。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时期发生的造成大规模破坏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英国仍能保持一个极端不平等的和阶级界线分明的国家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这一成就更为令人瞩目了。

从一项明显的意义上讲，英国的纪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压力和抗争。但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没有如此顺利和有效地做到了这一

点。这决不是要竭力低估在遏制压力时使用高压手段一直是达到社会一致同意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相比，有些英国人在相对的但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一直享受着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权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英国的政治体制对于实现高度的社会和政治安定所作出的贡献。

可以说，掌管国事的人抱有其他许多意图和目的——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领域安全，谋取和保卫帝国的利益，实现财政稳定和社会改革等等；另外还有求得他们自己地位的提  
升，扩大他们的声望，谋得某种官职和保住那个职位等打算。但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无一例外地同遏制压力和控制抗争的任务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鼓吹和实施社会改革。但是，此举之所以并不与其他理由相矛盾，一个主要理由是希望那种改革会削弱抗争的锋芒，有助于实现社会安定。同样，那些赞成海外扩张的人希望那种改革主要会促进国家的繁荣，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不论从哪方面考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种想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的愿望，使我们得以了解英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精神，其余一切均取决于这一愿望。

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目前要分析的两个基本概念，需要先作一些探讨。

我已提过的英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改造，自然在英国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中表示出来。但这些变化是发生在两个“基本”阶级的构成上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存在上：一方面是大家惯常称之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其核心为资本家成分，也就是真正控制（也许占有，也许并不占有）私有经济力

量主要手段的人们；另一方面是从属阶级，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其更为确切的定义目前尚待规定。在过去的200年间，这两个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连续性，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经久不变的事实，即一方面私人占有和控制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而另一方面却没有这种占有和控制。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随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集中和分离而引起的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关于私有经济成分管理人员的性质、作用和目的的变化所产生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存有争议，这里不必介入。我个人认为，这些变革并没有给这一制度的动态带来任何根本的变化；把这些有关的人统称为“资本家阶级”，现在和从前一样都是合理的。

除开这个资本家阶级，还有一些人在国家机构占据上层职位——政党领袖、高级文职官员、国营企业经理、法官和高级军警首脑；可以并入这一类的还有专业生活中的上层人士，诸如律师、会计师、教会领袖以及通讯系统的其他专家。这些人合在一起，掌握着生产手段、劝说手段和慑服手段。他们组成英国的“统治阶级”、“权力核心”和幕后统治集团。正是他们在负责管理主要的机构，借以行使权力、履行责任和施加影响；与此相关，也是他们组成收入额的较高和最高等级；大部分的私有财富就是分配给他们这些人的。

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情况当然千差万别。资本家和国家公务员履行着不同的职责并受制于不同的约束，这一事实导致了这些差别当中若干最重要的差别。资本家主要关心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领域，并且作为资本家，要听命于他们所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的迫切要求（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迫切要



求)。大臣们、民政机关和其他机构公务员们必须看得远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事项各有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也许是唯一的主要职责——是要采取行动，以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调处阶级冲突和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办一些为大部分甚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不乐意的事情。

尽管这样，统治阶级的成员中间还有很大程度的共同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上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

“工人阶级”一词通常主要用来指体力劳动者，但这种含义局限性太大，在当今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到目前，已有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从事非体力行业；这类人员大都受雇做办公室抄写、分配和“服务”工作，是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体工人”的人员，他们无疑是“工人阶级”（尽管他们有许多人可能拒绝这个美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由处于生产过程从属部分的绝大多数工人所组成；工人阶级的较大部分是受雇于私营经济部门的，但也有为数可观的一小部分人受雇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受雇于国有化企业和其他公共机关团体。

那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处于永久失业和家徒四壁惨景的人口，可以说也是从工人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大多数这类人员经官方承认，同老弱病残的穷人一起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有几百万人，共同组成英国社会的广大“下层阶级”。近几年来，大批失业现象已使他们的人数有了增加，把那些极端缺乏稳定就业机会（更不用说熟练技术就业机会）的年轻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抛进了这个“下层阶级”。

象统治阶级的成员一样，工人阶级的成员也有许多共性。除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处于从属地位外，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工资，他们的工资水平使他们处于等级的较低和最低几档。工人阶级具有共同的社会境遇、文化程度和“生活方式”。它的从属地位远远超过生产过程的范围；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几乎毫无权力、责任和影响可言。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存在着相当“客观”和极其巨大的差别。所有的宣传故意说这些差别大都已成陈迹，“拉平现象”和“平均主义”即使有的话也已经几乎模糊了阶级界线。但事实上，英国一直是、今天依然是个极不平等的国家，总的来说在财富、收入、工作条件、安全、住房、教育和“生活机遇”方面仍旧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如以天平的两端相比，可谓大相悬殊。在英国，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带有“民主的”性质，关于个人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占总人口5%的人占有个人财富总额的半数以上，10%的人占有2/3，20%的人占有4/5（阿特金森编：《财富、收入和不平等现象》1973年版；《英国皇家委员会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的报告》，1979年版），就是富人也绝大部分并非“白手起家”，“继承一直是财富不均的最重要的唯一源泉”（哈伯里等：《英国的财产继承和财富不平均现象》，1979年版，第136页）。

这当然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状况多年来毫无改善。这种改善显然还是有的，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有，连制约雇佣劳动者对待雇主的态度“生产关系”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丝毫没有推翻贫富不均这一经久不变的事实。有

一部分国民，他们自称拥有大量从财产和高收入产生出来的财力物力，享有特殊环境、安逸生活、权势和责任；另一部分国民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处境艰辛，前途黯淡，终身处于从属地位。现有政治体制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和保护这种布局并遏制反对这种布局的压力。

阶级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可能会加剧阶级矛盾，它本身却不会引起阶级冲突。阶级冲突最基本的和经常起作用的原因是雇主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可以这样说，这是阶级冲突的原始细胞，先在“生产场所”产生，由此扩展到其他许多更大的忧患和不满。我已经指出，工人阶级中的每一种分裂极大地影响着它提出要求 and 开展斗争的姿态。但任何分裂并不妨碍它提出要求 and 开展斗争。在地方、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在一个工业部门或跨越许多工业部门，在团结较强或较弱的情况下，围绕着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或者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目的，通过种种不同的形式，阶级冲突一直是并且现今依然是英国生活中主要的和持久的事实。正因为如此，遏制阶级冲突的问题一直是雇工们和国家持久地严重关注的问题，而成为雇主的国家对此更是越来越关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的著作卷帙浩繁，但其思想范围不外乎一头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向善论，另一头是鬼鬼祟祟地反民主的保守主义。然而，这类著作的基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经经历了若干变化。在第一阶段，即从战争结束和选举工党政府一直延续到50年代后期，基调一般是自我陶醉和溢美之词。它们普遍认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或者至少是正在形成，认为这种新秩

序要比它取代的旧秩序优越得多，并且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已再次显示出它有承受这场变革并为之服务的能力。

在60年代初期，当英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严重紧张的迹象时，这种溢美的基调有了变化。改革政府体制的主张这时成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主题——改革议会、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国有化工业部门、改革内阁以及改革除了君主制之外的一切东西，这些意见甚至提出必需使君主制也实行“现代化”。这也不再只是学术性的建议；历来要算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短时间内对现有体制不同部分的改革工作做得最多——尽管没有什么效果。

从70年代中期起，基调又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一种第三类型的意见，它对现有政治体制本身的生命力表示极大怀疑。1976年，当时卸职的黑尔什姆勋爵（1970—1974和1979年起两度任英上议院议长，1983年起任伯金汉大学校长）在他的丁布尔比讲座中宣称，“我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不管用了”，他鼓吹“为联合王国制定一部不折不扣的成文宪法”。另一位抱有保守信念的作家在197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尤其象英国这样一个有其政治业绩光辉历史的国家，表明它长期没有能够解决它必须面对的重重实际问题而找到前进的道路，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已经在政治上陷入绝境……指导政治生活的规章制度已经丧失了一定的生命力。”（约翰逊：《政体探讨》，1977年版）伯纳德·克里克教授（1971年起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政治学教授）在他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从政治领域的不同角度这样认为：“在近几年英国的历史上，人们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真正的怀疑，不相信它有能力使自己

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解决许多似乎是它无法控制的新问题。”（《参政和政府前途》一文。见格里菲思编：《从政策到施政》1976年版，第55页）

## 多元制观念的欺骗性\*

这篇短文谈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所以多元制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制所作的各种明确的规定（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和不选举新的一届政府、执政党和反对派的存在），可以保证各种集团、社会力量、见解的平等共处和合作。正如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从多元制出发，应放弃用强力推行部分人的利益和相应的世界观。为了使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切实可行，国家应该注意向所有的集团、社会力量、各种利益和意见的捍卫者，提供平等合作的机会。

对多元制这个概念，资产阶级内部也有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可归纳如下：国家的中立和主权可能受到各个集团的利己主义的威胁。集团的本位主义往往置紧迫的公共利益于不顾。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各种不同的集团和社会力量来说，并不存在平等的初始条件和活动条件（经济实力，形成意见的垄断权力）。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就要通过教育领域内的改革，通过

---

\* 摘自〔联邦德国〕施泰格瓦尔德（联邦德国共产党管理委员会成员、哲学家）《西方国家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制》一文，载〔苏〕《哲学科学》1984年第5期。

建立共同所有制、共同决策制和民主化，来克服上述在起点上机会就不平等的现象。

就实质来说，“多元制”概念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和它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是一致的。在这些范围内，和“多元制”概念对立的另一极是“极权制”；两者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的概念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彼此斗争的对抗阶级，它们具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惯例。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制概念是强加给社会意识的。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资本家和工人（工会）由于劳动工资问题而彼此斗争，而国家却好象袖手旁观。选举时的党派竞争，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存在，是有利于把多元制强加于日常意识的另一个论据。

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对于某些政治措施，对于采取哪一种策略来战胜自己的政敌，发生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也被利用来使多元制概念变得更有说服力。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群众具有丧失甚至最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经验，这个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群众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掌权方式，比法西斯主义好一百倍。马克思主义者保卫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不受反动势力侵害的政策也是建立在这种极其重大的差别之上的。“反对极权制的多元制”这个资产阶级概念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

批判多元制观念的困难，在于人们的日常意识并不能一下子就清楚地看出：在多元制的表面现象后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不是多元制的原理，而恰恰是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对抗，即那些事实上创造全部物质财富（这是社会存在

的基础)的人和那些支配这些财富(并进而也支配创造它们的劳动人民)的人之间的对抗。对人的劳动力的剥削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被掩盖着的。人们只有站到工人阶级真正科学的思想立场上来,才会看清楚利润、贪婪地攫取劳动人民剩余价值劳动的机制。

此外,隐藏在多元制、工人和资本家平等的表面现象后面的社会不平等,还被国家的活动掩盖起来,国家总是把自身吹嘘成现有的阶级多元制的中立卫士。

多元制观念的欺骗性,也由于一系列其他原因而不太容易揭穿。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多元制是减轻过度压迫的阀门调节系统。它所进行的不过是越来越不关痛痒的批评,所以它对于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危险。

可见,多元制构想的基础,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那些关系:第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第二是市场上各种商品所有者的情况——他们能够同时都是自由的,彼此竞争,等价地交换商品。

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固有的特点中,产生了多元制构想的基础,也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界限:商品所有者的角逐斗争以及与此相关的过程,可以导致个别资本家的破产,但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原则的毁灭。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会导致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资产阶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会用专横的、恐怖的、公开法西斯化的制度来代替多元制。

因此,政治上的多元制(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特

殊形态的体制，它不反对功能“正常”的资本主义（即相对说来未受到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主义）才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最适当的政治形式。无论如何，它并不是和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相一致的。

为了批判多元制概念，首先应该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多元制都不表现为企业主和工人的平等共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有社会产品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平等共存。无论在什么地方，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都不允许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通过投票从自己手中夺走政权。相反，资产阶级总是用法西斯主义来对付这种威胁（例如在智利就是这样）。或者举一个较近的例子：德意志联邦议院的三个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在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他们不主张多元制，而是主张一元制。

然而对于大资本来说，只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没有严重的威胁，多元制（即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就是最适当的政权形式。资本掌握政权的情况是不大容易看穿的。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生活的。他们很容易轻信，议会和政府中所解决的那些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如果实行法西斯制度就很难使人相信这一点，因为那时工会被禁止，没有罢工权和集会权，也没有议会讲坛。因此，资本只有在需要备用的救生圈时，才转而实行法西斯制度。

左右社会生活的势力，无论在魏玛共和国，也无无论在法西斯制度下，始终是同一类势力，即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起作用的势力，也就是大资本的势力。在这个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多元制”和“极权制”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是没有丝毫差别的。然而，也有必要划清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民主在掌权方式上的重大差别。

“极权制”和“多元制”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从报刊而进入科学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不会根据解剖学上的相似而产生把人和猿等同起来的思想。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由于雅各宾党人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分子都采用恐怖手段，就想到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农业社会，就把这两个社会等同起来。然而，当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便偏偏“忘记了”一切科学分析。在这时，纳粹分子的屠杀暴行，竟然被等同于革命者的暴力。可见，问题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反对用暴力维持这个制度的斗争，遭到了种种诽谤。由此看来，我们显然是在同司空见惯的资产阶级党性打交道。

## 美国“看不见的政府”\*

早在50年代就有人提出，“统治美国就等于统治世界”。据V·帕罗的《最高金融帝国》的说法，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的有八大财阀。它们是：（1）洛克菲勒财阀；（2）摩根财阀；（3）杜邦财阀；（4）梅隆财阀；（5）全国城市及纽约各集团；（6）

---

\* 摘自〔日〕赤间刚《洛克菲勒帝国的世界战略》一文，载〔日〕《历史读本》1988年第9期。

中西部各集团；(7) 加利福尼亚集团；(8) 得克萨斯各集团。其中最大的金融财阀是摩根。政治权力最大的是洛克菲勒财阀，而它在经济权力上也是最大的，控制着全美200多个跨国公司，其中包括十大产业中的6个，十大银行中的6个，十大保险公司中的6个。据说这200个公司生产的财富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据国际工商会议所所长J·波尔克预测：“到本世纪末，这200到300个公司的跨国企业将拥有4万亿美元，控制世界财富的50%以上。”不久，这些跨国公司的大多数将被洛克菲勒财阀控制。洛克菲勒财阀主要通过控制金融和取得股份的形式逐个掌握大企业。这些都是通过以切斯·曼哈顿为中心的16个大金融机构进行的。

美国的民主借助于舆论，而制造舆论要靠新闻媒介。这些新闻媒介由50多个大企业控制着。当然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要对大企业有利。这从政权上也可以看出洛克菲勒财阀的实力，而且不自今日始，可以上溯到艾森豪威尔时代。当时的总统特别顾问就是洛克菲勒财阀的头头——洛克菲勒一世之孙纳尔逊·洛克菲勒，而国防部长是GM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经理C·威尔逊，国防部副部长则是该公司副经理R·基斯，陆军部长R·史蒂文斯是GE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头面人物。GM和GE不仅是美国的大型企业，而且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子公司和系列公司，是世界范围的跨国企业。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的要员在白宫中占据要职。难怪国防部长C·威尔逊在就职时声称：“GM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GM的利益。”这清楚地反映了美国的世界战略在政治上代表着美国跨国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时代都没有变。

里根就任总统以后，洛克菲勒财团成员占据要职的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以副总统J·布什（洛克菲勒财团理事）和国务卿J·P·舒尔茨为首的外交问题评议会（CFR）成员，仍有38名占据决策地位。这个CFR就是洛克菲勒财团为统治美国而创立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专门机构，外号又叫“洛克菲勒国务院”或“看不见的政府”。目前已有成员1796名，都是财界和学术界的佼佼者。其资金来源由洛克菲勒财团提供。原会长就是戴维·洛克菲勒。正如“看不见的政府”的说法一样，CFR成员中正在担任美国政府要职或曾任要职的人不计其数。

## 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已名存实亡”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已名存实亡\*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古典议会主义，否定了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以人民主权原理为基础，将议会置于全体人民代表机构的位置上，从而控制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产生了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统治形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这一点上看，当初的议会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然而，由于政治上的统治者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否定了大多数民众的参政，

---

\* 摘自〔日〕泽野义一《社会主义》一书1990年版，第4页，第19—25页。

因而当时的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原理并不等于是民众参政的民主。

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开始要求彻底的民权和普选权，这个时期的议会制是以大多数民众的政治参与为基础，议员也受到选民的约束，因而，这个时期的议会制是议会制民主产生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议会制民主危机的开始。因为工人阶级一参加议会，统治阶级就不再把重点放在议会上，而是放在行政权力上。虽说在某些方面扩大了选举权，但由于采用了非民主的选举制度，所以仍然抑制了民众的参政活动。

不过，这时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还未全面出现危机，全面出现危机的是20世纪30年代，议会民主制被法西斯主义彻底否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又恢复了议会制民主，但到了50年代，议会制民主已是名存实亡，其原因既有表面的，也有潜在的阶级和阶层矛盾的激化，以及与此有关联的“政党国家”“行政国家”化的问题。

所谓“政党国家”现象，指的是政党的对立阻碍了议会的审议功能；所谓“行政国家”现象，指的是为维护资本利益，从各方面加强行政权力的现象。行政国家通常是以提出大量行政立法的方式，使行政控制整个立法过程，让议会立法、审议功能名存实亡，而议会及法律的行政统制机能也由于行政处理、行政指导、计划行政的增加而徒有虚名。

议会制民主的名存实亡，除了由于降低议会作用外，对人民参与政治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为了防止大多数民众控制议会，统治阶级采用了不民主的参政制度，如选举制度等。英国的选举制度是小选区制，虽说有不少人目前还支持这种

选举制度，但人们发现，这种选举制不能正确反映民意，绿党无法通过这种办法取得议席，其方式是不公平、不民主的。美国是两大政党制，选举方法也是为维护这一体制，对其他政党则有种种不平等规定。法国的选举采用的是两次投票的小选区制，该选举制确立之初，就有防止反对派进入议会的企图，这种选举制，只能使选票集中于大政党一方。联邦德国的选举制是小选区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方法，也是为了阻止少数政党进入议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法、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国家形态及统治方法虽然不同，但都形成了议会制民主。然而，若从选举制度、对政党的限制及对选民参与政治的限制上看，这些国家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并不货真价实。

## 议会至上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司法对立法的监督\*

政府的主要立法职能是对通常由行政部门所提交的议案经适当的审查之后制定法令。在大多数情况下，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院解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一向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这样，法律的制定是立法机关之事而非关法院之事。所以，法院无审查议会制定法律之权，也无权品评立法是否适当或是否明智。法院决不能基于他们认为立法机关应当如何做而解释法律。在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是议会，以议会法

\* 摘自〔英〕J·E·契斯等著《英国和大陆行政法制度》一书第4章。

令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被称之为立法或成文法。

一般地说，在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立法机关形成立法的可能受到违反宪法的特殊规定即违宪的挑战。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宪法仅是一般法律的一部分。

不成文的宪法灵活方便，便于使用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缺少成文宪法也有不便之处，其结果致使法律和惯例的界限模糊不清。而且，没有成文的宪法规则易于步入议会主权无限制的错误学说。

在英国，普通法确认了议会至上(或主权)的原则，这样以致无论它的立法内容如何，法院都须遵循运用。这个原则象与其他法律部门有关系一样，也与行政法有关。因为议会是至高无上的，它能以适当的形式按其意愿造成任何法律的变化。而且，因为创设行政机构的是议会，所以议会能够废除它们；因为行政机构的权力由议会授予，所以议会也能取消这些权力。在理论上，议会可以无视国际法而立法。它也可置宪法惯例于不顾而立法。萨尔蒙表达了这种观点：议会“在现代法制的国家可以随意制定、修改和取消任何立法”，而“法院仅有的权力是肯定和执行现行法律，不是肯定和执行现在和将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法律”。

毫无疑问，英国议会至上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司法对立法的监督。很难想象，行政法这部机器除了解释法令和将其适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之外还能有监督议会的功能。在英国，当可作多种解释的语言所表达的法定权限时，法院可以求诸普通法中立法意图的推定。例如，在无相反明确规定时，如可能，法院将以这样的方式解释以免因词语含混不清所造成对授权的滥用；如可能，对那些没有效力的追溯

既往、有失公正、甚为荒谬以及造成不合理后果的法令，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但关于授予征程权力，除非意图明确，否则不能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此外，不能推定立法机关抱有无偿地取得财产的意图，除非有明确的词语表达，这是解释成文法的最重要的原则。

但是，法院不能基于想当然来解释立法机关的成文法。解释一个法令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图。如果法令的表述毫不含糊，这种意图，亦即法令的含义主要是在用以表达法院所适用的词语自身中寻找，但他们可能强烈地怀疑适用的结果将不代表议会的真实意图。然而，如法令的词语是清晰而毫不含糊，其已指明议会的意图，那么就无须到别处去寻找和发掘其意图和含义了。

## 两党制对权贵统治并无妨害\*

权贵是由在法人社团\*\*和政策网络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阶级成员和这些机构中的高级雇员组成的。说得更正式一点，

\* 摘自〔美〕威廉·多姆霍夫（美国圣克鲁斯加州大学心理学、社会学教授，60年代因著《谁在统治美国》一书而一举成名）的《当今谁统治美国》一书的第5章，1983年版。

\*\* “美国经济部门多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所主宰。这些公司又以各种方式互相联系，形成法人社团。……位于这个法人社团中心的最重要的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法律事务所是由上层阶级成员控制的，因此法人社团是上层阶级主要的金融基础。”（见该书第59页）

权贵包括上层阶级中起作用的活跃成员和营利、非营利机构中的高级雇员，这些营利、非营利机构是由上层阶级成员通过拥有股本、予以财政资助和参加董事会等手段加以控制的。

权贵通过三种基本过程直接介入联邦政府，每种过程的作用略有不同，但都旨在保证接近白宫、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的特别机构、部和委员会。就人而言，有些是三种过程都参加的，但多数人参加一种或两种。这是因为每种过程要求的知识、技巧和社会关系都稍有差异。这三种过程是：

1. 挑选候选人过程。权贵企图利用资助竞选和支持政治候选人等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影响竞选运动。

2. 争取特殊利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个人、公司和工业部门同国会委员会、制定规章的机构以及行政部门等打交道，以求在税收、补贴和规章等方面实现他们范围狭窄的眼前利益。

3. 拟订政策过程。政府设计网络设想的一般政府通过这个过程到达白宫和国会。

权贵介入挑选候选人过程的方法简单、直接，时常很露骨，即提供大笔竞选费用，其数目大大超过其他阶级和集团能够凑集的数目。介入的方法虽然简单，但要了解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直接途径的原因，却需要从结构上和历史上去了解政治在美国的作用。但本章只能帮助读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

在全国挑选候选人是通过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政党制度进行的，这种只有两个政党的制度在世界上很少。这是一种由基本的政府制度缓慢发展并形成独特模式的政党制



度。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概括说：“政党和选举缠绕得难解难分，政党的结构就是选举过程形成的。”

美国政府的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两党制。第一个特征是总统选举，第二个特征是从州和众议员选区选出参议员和众议员。只有一个人能当选总统，或者说只能从某个州或选区选出一个人，这个情况看来很平常，美国多数人也认为理所当然，却产生了“胜利者赢得一切”的一系列选举。这样，投票赞成左翼或右翼的第三位候选人实际上就支持了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投票者最不喜欢的候选人。因为投给第三位候选人的票就等于给你“最坏的敌人”投了一票。想要避免这种命运，最清醒的做法是在选举以前组织尽可能大的联盟，即使必须放弃许多原来偏爱的政策或作出让步妥协也在所不惜。这种做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两个政党结盟，企图使它们的分歧难以觉察出来，以便赢得中间派的选票。

……对于选举规则和政党数目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美国挑选候选人过程是如何逐渐通过两党制进行的。总统选举制和众议员选区选出一名议员的制度产生了倾向两党制的强烈趋势，但最初设计时并未想到这一点。美国的奠基人想要建立一种控制和平衡的制度，使权力，包括已经觉醒的并有组织的多数农场主和工匠的潜在力量在内，保持受约束状态。然而，建立两党制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以内。美国的奠基人的确不喜欢政党这个主意，他们把政党斥为具有高度分裂性的“派系”。政党是他们深思熟虑时不经注意产生出来的重要后果，直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新一代的政治领导人才终于适应了两党制对权贵统治并无妨害的看法。

如果领导人最终把政党看作就他们的不同意的那些问题

进行辩论的手段，那么，多元论者把政党的作用看得比这还要大，认为政党是普通老百姓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他们使用经济上的类推法，把投票者比做消费者，把选举过程比做市场。消费者能通过购买影响企业，使企业提供消费者喜欢的产品，投票者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用选票来影响政党，使政党提供他们喜欢的政策。经济学家唐纳德·威特曼曾对这一市场类推法认真地提出质疑，并把典型的观点总结如下：“他们要表明自私与政党的竞争能导致最佳结果。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被应用到政治上来了。”

证据表明，多元论者关于政党如何起作用的种种假设是不正确的，政治家为了当选将采纳多数人的观点这种假设与事实相矛盾。事实是，多数政治家在经济问题上并不同意多数选民所持的相当开明的观点。一个政党和它的候选人也并不总是设法取胜。有许多例子说明政党领袖虽有一个同自己观点相同的候选人，但他宁肯输掉也不愿使比自己更得选民之心的候选人当选而取得党的胜利。19世纪晚期，美国中西部持人民主义观点的民主党候选人的经济纲领没有得到民主党富有的领导人物的赏识，这些候选人的命运就只能是失败。

还有迹象表明，有时各政党进行合作而不是竞争。当一位“不受欢迎的”候选人获得这些政党之一的提名时，尤其如此。例如，1972年，南方民主党人和劳工民主党人公开或暗地支持尼克松，反对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为了回报这种支持，“白宫战略家大笔一挥就抹去了100多个共和党候选人的名字，他们原是想竞选南方民主党人和劳工组织支持的民主党人握有的席位的”。然而，联合不一定是明确的。威特曼通过策略运筹理论的论据表明，只要两党感兴趣的是得到报

答而非获胜，那么联合时常比竞争对它们更有意义，而它们的确时常这样办的。威特曼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政党可能找到许多限制彼此竞争的方法：双重党籍制度、倡导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对上层政府的政策稍加改动、招募不反对另一党的人，等等。就连不相信某些纲领能赢得选举的念头也可能是一种含蓄合作的形式，只要这种念头中想象多于实质内容就行。因此，各政党同投票人的竞争大于为了投票人而进行的竞争或政党之间的竞争。

因此，同多元论者的说法相反，不存在先验论的理由认为政党及其候选人将出于需要而反映大多数投票人选择的政策。候选人和政党可以相当随意地言行不一。总统或其他当选官员一旦上台，就有能力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解释选民对他们的授权。林登·B·约翰逊1964年大胜，显然是因为他关于东南亚政策的表白没有巴里·戈德华特那样“好战”，但他获胜后不久，他和他的政党便让战争升了级。1980年的投票记录表明，罗纳德·里根的胜利部分反映了传统投民主党票的那些人对失业情况不满，他们投里根的票，希望他能将经济刺激得活跃起来，并且不去触动他们的“安全净利”。但里根政府宣布它执行卡尔文·柯立芝政策获得成功，并且着手进行造成失业增长和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

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两党制阻碍了政策讨论、政治教育和按多数人的选择行事的企图，而不象多元论者用与自由市场相似的办法来鼓励这些活动。诸如总统职位这种关系重大的地方，需要多数票，这种需要可能导致没有争端、只有个人品格不同的竞选，哪怕投票人对争端极其敏感也罢。例

如，曾详细报道过1976年总统选举的报界人士朱尔斯·威特科弗就认为，这场竞选是树立形象和避免争端的竞选，双方候选人都要求投票人根据他们的个人品格而信任他们。其时，这两个政党都集中攻击对方候选人个人的小过失：

这场竞选不是人们会称之为提高道德水平的美国最高职位的竞选。人们的政治视线所及的都是那些表面的事物：克拉伦斯·凯利的公寓房间里窗帘横架是联邦调查局的木工做的；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在流产问题上机智地躲躲闪闪以公然追求天主教的选票；福特不花钱作打高尔夫球旅行（由美国钢铁公司出资）和卡特（不花钱的）打猎旅行（由木材公司出资）的报道；卡特在税务改革声明上的掩饰和福特对卡特掩饰的掩饰；揭露卡特内心的贪欲；以及似乎没有贪欲之心的共和党人所作的道貌岸然的谴责。

然后，也有迹象表明两党制阻碍投票，因为就连得票49%的人也是白忙一阵。关于两党制的政治后果，应当得出的主要结论可能不是允许平民表明他们喜欢哪种政策，而是它创造了政治与政策没有多大关系的局面。如洛伊所说：“美国两党制所产生的多数只是数量上的，通常没有任何政治内容。”

在政策选择变得模糊的制度中，强调候选人个人形象变得很重要。个人品格比政党政策重要。随着新闻工具、特别是电视的兴起，这种倾向或多或少是加强了。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一种现实，对“最近”政党衰落发出感叹的许多专栏作家和权威性评论家在认识到这种现实之前，它早就存在了。早在新闻工具大谈政党退化之前，美国国会的一个监察组织“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把这件事讲得非常透彻：“尽

管有意图和目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存在。只存在个人（即候选人）和专业人员（即顾问、民意测验者和新闻工具顾问）。”

正因为美国两党制的挑选候选人过程非常注重个人，挑选取决于人们对候选人名字的熟悉程度和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因此，权贵可以通过提供大笔竞选费用这种比较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竞选活动。指挥公司企业和参加政策团体的人同时又扮演大施主和资金筹集人的角色，他们对在大小不等、影响不等的州中超出当地水平而崭露头角的多数政治家的生涯起重要作用。政治学家沃尔特·D·伯纳姆下结论说：“物色杰出的候选人与候选人的财富或能否得到大笔竞选赠款息息相关，对于较大的州中最重要的职位来说，更是如此。”

这样注重竞选费用和新闻认可的政治过程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当选官员呢？从许多份研究报告中可以找到答案。政治家、特别是那些选举产生的最高职位的政治家，首先是在职业和收入阶梯顶端的10%至15%之中的人。20世纪的总统很少有不属于最富有圈子的。

上面已经说过，争取特殊利益过程是一种方法，特殊个人、公司或工业借之得到照顾、减免税、作出有利的规章裁决和得到其他政府支持以实现他们的短期利益。这要靠以下这些人的努力：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惯常在国会班子服务或在制定规章的机构中工作的律师、同业公会的雇员以及其职能显然是与政府联系的法人企业行政人员。

争取特殊利益过程基于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提供信息、施加压力、赠送礼物、发展友谊和——并非罕见地——含蓄地允诺将来为可能有此需要的人安排有利可图的私营企业的

工作等各种各样的做法的综合。这种种复杂的活动最普遍的叫法是院外活动。但与此有关的律师坚持说他们并不是在进行院外活动，只不过在提供信息。前政治家也暗示说，他们的许多谈话和礼物是出于友谊，并不是出于要为他们目前的雇主争取好处。院外活动具有施加难以对付的压力的内容，但在争取特殊利益过程中活动的人，很少认为自己是在施加压力，多数政治家则把企业集团看作是在正在辩论中和问题上拥有合法利益的人，院外活动是别人——即对手——搞的。

争取特殊利益过程是社会学家和报界人士研究和揭露企业——政府关系的一个侧面。这个过程正是为消费者说话的拉尔夫·纳德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多次调查研究的问题，有改革思想的其他团体也一直在对它加以检验。这个过程正为人所熟知，对公司富豪又是有好处的，因此人们时常认为这是华盛顿决策的主要内容。

政治学家格兰特·麦康内尔新发表的经典著作《私营经济的实力和美国的民主》，对争取特殊利益过程的内容作了最细致的概括。该书对几十年来国会进行的院外活动调查，包括半心半意地表示要限制院外活动等进行了研究，并对许多研究报告提出制订规章的机构多半被本来以为要接受管束的那些人“俘虏”过去的论点进行了评论。他指出：“这种揭露重复不已，几乎令人厌烦。”他显然否决了多元论者的通常看法，他下结论说，争取特殊利益具有主宰特别委员会和他们关心的其他机构的能力，这就使得这些利益大大避免了其他来源的任何抵消性压力：

政府各部门得到的自主权已经太大，使有关公共政

策的重要事务不再受想象中的抵消影响。此外，政府作为不同利益的仲裁者的形象被歪曲成政府已分裂为许多部分，而各个部分都要感激各自的特殊利益集团。

## 日本的金钱选举\*

在今年2月的大选中，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为了继续掌权，大概已经花了2,100亿日元(合15亿美元)，这与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所有的候选人只花了4亿美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明日本的政治为何如此难以改革。对金钱的要求压倒一切。用323位左右参加竞选的自民党人去除该党的竞选费用的总和，每个竞选者平均花费6.5亿日元(合450万美元)。候选人实际上分作两类：270位原来的议员每人只需要5亿日元，新参加竞选的年轻候选人，则需要付出多两三倍的钱。难怪那么多的席位是世袭的：议员的儿子或孙子本身就是候补议员，这使他们一出面竞争就占有巨大的财政优势。

在哪些地方需要花这么多钱呢？不是花在电视上，因为日本现行法律禁止在电视和大众宣传媒介上作竞选广告。但租借会议厅，请客吃饭，租用交通工具，雇大批专人来协助竞选，都要花钱。还要给选民送礼，从社会节日的小额礼金到给私立学校提供津贴，不胜枚举。在80年代初，据计算，每张选票等于一个电冰箱的价值。

关于竞选经费的来源，自民党声称：现在不是通过党内

---

\*摘自〔英〕《经济学家》编辑部文章，1990年2月3—9日。

各大派的领导人、不是通过个别政治家对地方企业家施加恩惠以换取捐献，而是通过中央机构筹集竞选基金。在里库路特丑闻案发后，自民党允诺停止在豪华饭店跟大公司进行交易的做法，并实行改革，使此类事成为非法。但自民党已经把这两项诺言忘得一干二净。

由于自民党在去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失败，该党感到必须不惜花费重金。去年8月上任的自民党干事长当时就跟大公司的机构——经产联摊牌，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必须在自民党统治下的自由市场民主和社会党统治下的混乱之间选择。如果自民党在2月大选中不能赢得多数，那便将政权拱手让给社会党人。

工业寡头对此心领神会。一般来说，经产联每年支付给自民党的费用，达120亿日元。各家公司再捐献150亿日元，作为自民党的竞选费用。从去年对奢侈品减税中得益的汽车公司和家用电器公司，也拿出大量资金。建筑业和银行也不示弱，特别是大商业银行持积极合作态度，结果于去年年底提供150亿日元的优惠低息贷款，甚至表明属于捐赠，无需付还。

所有这些中央机构的活动多少都是公开的，但所得的经费的数目跟自民党预计花费的2,100亿日元相差甚远。没有任何人能说明是通过什么渠道补足这些差额的。也许其中的 $\frac{1}{3}$ 是候选人个人筹集的，其余的来自党内各派。自民党党内各派都在哭穷。拿竹下登派来说，它是最大、最有钱的派别，却声称在银行中只存有20亿日元，实际上他们有120亿日元可供支配用作竞选费用。

比较起来，反对党可用于参加竞选的资金捉襟见肘。社



会党计划耗费自民党竞选费用总和的1%，即20亿日元；民主社会党花10亿日元，公明党花4亿日元，共产党花9亿日元。但自民党总部的职员说，如果反对党对其竞选活动按市场价格付钱(意思是许多人不计报酬帮忙)，那么反对党所花的钱要比自民党多。

## 任命宪法法官的政治化\*

在法国，人们通常问起宪法委员会委员到底是不是法官，因为宪法委员会并不具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特点。毋庸置疑，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不是普通法院的法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法官，宪法委员会的委员是不同于普通法院法官的另一类法官。

宪法法官与普通法官的不同首先是他具有宪法赋予他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其监督公共权力机关的活动而又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预。宪法法官的地位和任务一般由宪法规定，如需改变宪法法官的地位则必须修改宪法。另一不同的是，由于宪法法官审理的对象是公共权力机关，因此，尽管他的活动或活动方式属于司法性质，他所作出的决定都是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义。

毫无疑问，宪法法院具有政治上的作用和职能，它们作出的决定将会在政治上发生影响。因此，宪法法院的人员组成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象在法国—样，谈论是否有另

---

\* 摘自〔法〕路易·法沃赫《西方—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文，转引自《国外法学》1985年第4期。

一种组成方法或任命方式可以避免宪法委员会的“政治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所有宪法法院都具有政治性。正如查理·埃森曼早在1928年就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说，宪法法院是反射出最高层政治斗争的影像的一面镜子，这种反射尽管是部分的，但却是忠实的。准确地说，它的作用是将最终地把这种最高层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法律上的纷争。”

各国宪法法官的任命方式不尽相同，但似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最满意的方法。在奥地利，所有法官均由联邦总统根据政府、国民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提名任命，其中由政府推荐6名法官、3名递补法官以及法院院长和副院长，也就是法官的多数；由国民议会推荐3名法官、2名递补法官；由联邦委员会推荐3名法官、1名递补法官。这个制度更有利于政府。联邦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由议会两院通过复杂的程序各自选举出8名，院长和副院长轮流由下院12人委员会和上院选举产生。意大利宪法法院的法官，5名由议会两院共同任命，5名由共和国总统任命，5名由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任命，法院院长由法官选举产生，任期3年。法国宪法委员会委员由共和国总统、参议院议长和国民议会议长各任命3名，任期9年，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在任命的委员中或当然委员中任命，任期不定。

由上可见，各国宪法法院的法官，除意大利宪法法院的三分之一的法官外，均由政治机构任命。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因为正如上所述，宪法法院不可避免地在政治制度中担任职能和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莫罗·卡佩莱蒂的报告中找到这种任命方式在逻辑上和法律上的根据，而由司法机关任命法官反倒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人们会注意到，在多数国家，

政治机构的影响受到宪法法官须具有的法律能力等条件的制约。此外，法律能力等项条件并不能防止任命宪法法官的政治化。

事实上，力图找到一种可以保证绝对公正和完全的非政治化的制度是徒劳的，这既是由于前面所阐述过的根本原因——宪法诉讼反映政治斗争，也是由于程序上的原因，即很难客观地任命。查理·艾斯曼在其论述中十分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点，并指出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很显然，担负着如此崇高使命和享有如此巨大权力（监督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以及公民表决是否合法；维护国家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保证各公共权力机关的正常工作以及它们之间的职权划分；监督法律的合宪性和保护基本权利）的司法机构的人员的任用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由于宪法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在各政党之间起着仲裁人的作用，并保证实行法治（包括在政治领域），因此，其成员的公正就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在需要对那些极为敏感的问题表示态度时。但是，这种公正是同样十分不易得到的。怎样才能保证公正呢？

老实说，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会有解决办法的。在国家元首任命、议会选举和由于担任某项公职而成为当然法官这三种主要方法中，似乎只有最后一种能够保证政治因素不对宪法法院的组成产生影响，这种方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即使这种制度也不可能切实地保证法官的公正。法官还是可能属于某一政党，或至少同情某一政党，因此，可能不会更多地放弃他们的政治倾向、政治热情，或者他们的阶级意识。

### 三 “实际意义上的新闻自由 不同于理论上的新闻自由”

#### 实际意义上的新闻自由 不同于理论上的新闻自由\*

今天的多数美国人会不加思索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大众媒介属私人所有。他们也接受这样一个信念，即“新闻自由”这个东西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许多人甚至认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安排：大众传播媒介是不受政府干预的。很少有人担心经济考虑会限制媒介的内容。同样，大多数人对于侵蚀“新闻自由”的字面含义所持争议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知道。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的大众媒介应该换成另外别的形式，或我们现在的媒介形式很糟。但我们确实想在此指出，我们美国人民为选择现在的制度共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重点是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想说明，私有制是如何极大地影响媒介的内容，以及媒介是怎样受各方面的限制而无法完全自由地传播消息。

美国的传播媒介大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对传播媒介不是直接操纵就是加以广泛的

---

\* 摘自〔美〕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的“媒介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一章，1981年版。

监督控制。在美国，传播媒介以赢利为方向，部分原因是美国社会相信这一套价值观，即把利润、私有制和摆脱政府控制看成是很理想的。

早年的美国人一代复一代把竞争、私有制和赚取利润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情况仍然如此。早期媒介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是建立在这些道德准则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如果它们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生产和发行费用，就只能停业倒闭。20世纪新的传播媒介也不享受政府津贴，因此，它们也是以私有赢利的竞争性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很多知识分子为美国传播媒介的经济基础感到遗憾，认为它导致许多质量低劣的东西。拥护这个制度的人说，总的来讲，美国人有了书籍、电影和广播以后，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批评者说的有理。我们将会看到，传播媒介的私人占有和对利润的追求已经导致它注重大众文化。大多数消费者的兴趣爱好主导着传播媒介的内容。很清楚，这种内容往往缺乏艺术性、知识性和教育性。

美国传播媒介因为是营利企业，都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多数法则”的支配。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内容，只要能吸引最大量的顾客并赚取最多的广告收入，就是要提倡的内容。能够吸引大批顾客观众的内容将把不能吸引大量顾客的内容挤掉。艺术知识趣味不高的人远远多于趣味高雅的人，这并不是秘密。尽管这个粗俗的“多数法则”也有些例外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这恰好是美国大众传播知识和艺术水平低的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所有权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多的传播媒介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局限来自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

新闻自由的权利有时与社会维持治安的权力有抵触。例如，新闻界要行使新闻自由权或许与警察和法院履行职责相抵触，或与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守秘密的能力发生冲突。新闻自由也会同个人权利，比如同个人隐私权和要求公正判决的权利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结果，法院的裁决常常是限制新闻界可以发表它想发表的任何东西的权利。

……我们已经对几个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进一步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也不同于理论上的新闻自由。

## 日本战时的“新闻机构完全 被置于政府的法西斯体制之下”\*

日本近代报纸产生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故而日本新闻自由是以一种近代化的后进性与特殊性结果显现出来的。一言以蔽之，也即是在政府的严厉强制下，以一种扭曲了的畸形历史进程，艰难跋涉过来的。

---

\* 摘自〔日〕内川芳美(现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所所长和日本新闻学学会会长)《新闻自由的历史沿革》一文，该文是收入〔日〕《新闻学》一书中的一篇专论。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在日本逐渐兴起，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潮。但是，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领域的社会主义言论和活动，却一直遭到特别严厉的限制和镇压。1925年3月制定“治安维持法”之后，政府对社会主义的镇压更为严酷。自此，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言论活动就逐步窒息了。

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日趋强化。不言而喻，新闻自由也当然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从总体上来说，不论是客观情况还是新闻界的主观意识，新闻自由都丧失了存在的条件和阵地。

日中战争(1937年)爆发后，根据“报纸法”第27条的规定，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不断发出不准报刊报道有关事项的禁令，新闻检查更加严厉。1938年4月，军国主义政府又发布“国家总动员令”，并以此将新闻事业完全纳入了国家管制轨道。1940年12月，又成立“内阁情报局”，由政府直接掌管宣传报道。1941年1月，根据“国家总动员令”又发布了“报纸等掲載限制令”。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后，又发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又恢复了报刊杂志的发行许可制度。此外，通过建立国家控制的“同盟通讯社”、成立御用的新闻团体“日本新闻会”(1942年2月)、推行“一县一报”的强行合并政策、对新闻用纸实行统一分配给制等措施，报纸等新闻机构完全被置于政府的法西斯体制之下，新闻自由丧失殆尽。

在战后被占领时期，美占领军曾借口维护同盟国的利益，仍对日本的新闻自由施加种种限制，并根据占领军司令部签署的“关于发布新闻消息的备忘录”(1945年9月10日)和“给

日本的新闻遵则”(通称press code, 1944年9月19日)两个文件,对日本报纸实行事前的新闻检查。此外,占领军当局还因后来的美苏冷战势态,转而采取反共政策,直接插手干预战后兴起的日本新闻界的民主化运动,在劳资纠纷中(如“读卖争议”、“北海道争议”等)打击报社的工会力量,从报社驱赶左翼势力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占领军当局又下令取缔《赤旗》等共产党系统的报刊,并大搞所谓“清共肃整”,驱赶、迫害新闻界的日本共产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

## 新闻出版自由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

早期的媒介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媒介产品和它对读者和观众的影响上。这些研究者对于媒介信息的来源几乎没有兴趣。然而,正如许多最新研究所表明的,如果大众媒介传播谬误的、歪曲的、不真实的、片面的或者耸人听闻的消息,那么,发布这些消息的机构自然就成为被追究的对象。科恩和扬(1981年)甚至认为在对于组成大众媒介的机构有更多的了解之前,应该停止对媒介效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当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媒介机构是复杂多样的。在不同的国家,媒介机构具有不同的形式。有些地方,国家似乎垄断了大众媒介的生产,把它作为一种统治工

---

\* 摘自〔英〕戴维·巴勒特(英国埃塞克斯劳顿学院讲师)《媒介社会学》(1986年版)一书的“媒介产生的社会环境”一章。



具。在另一些国家，出版“自由”在表面上受到尊重。大多数大众媒介掌握在大公司手中，并象所有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受到同样的影响。

在我们继续对组成大众媒介的机构进行详细探讨之前，粗略地考察一下在许多社会学家（包括研究媒介社会学的学者）著作后面包含的对社会的某些不同的看法，是很有用处的。

近年来，对媒介社会学研究者有着重要影响的一种观点是以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作为根据的。马克思的著作写于电视、电影和收音机产生之前，但他的确对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自己作为一个报刊编辑的经历是产生这些思想的极有用的来源（见默多克，1982年）。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都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即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工厂和机器设备，可以产生社会上其他人所需要的产品。凭借这种所有权，他们能够统治所有其他阶层。对于其他各个集团，马克思把他们统称为工人阶级，他们被迫受雇于统治阶级从事劳动，尽管他们得不到他们进行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

这一统治集团或者叫统治阶级的权力产生于他们对经济的控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权力可以扩展到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由于存在这种不平等制度，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必然会遭受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所有者凭借他们拥有的开除工人和剥夺工人阶级谋生手段的权力，成功地取得了这种统治地位。他们的这种控制也全面扩展到社会的各个主要方

面：教会、学校、家庭和国家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并非是以民主形式代表全社会利益的中立机构。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不考虑产生政府的选举过程，国家也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也扩展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马克思写道：“在每一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想中也包括对大众媒介的看法。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出发，大众媒介所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将会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顺理成章了。

与柯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同的，是某些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断变革其结构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使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一切工业组织走向民主化。现代企业不再把单纯追求利润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了。公司的特权阶层已被体现现代公司特点的企业经理、技术人员和专家取而代之，他们用人道的和对社会负责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组织机构。

当然，媒介机构的规模戏剧性地发展，技术水平也得到迅速提高。控制和管理这些技术先进的庞大企业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维持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象许多其他工业一样，媒介工业也在寻求外界投资者的支持，需要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本。

认为目前小股东越来越多，构成了这种观点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正确的。然而，认为是这种状况使公司的权力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则是错误的。

有两个理由能说明上述观点。首先，大多数公司只有少数大股东能控制公司的决策。联合通讯公司的创办者和现任

主席卢·格雷尔先生和他的两个经理共握有80%以上的股份，这使他们的股票数多于所有其他股东的股票总和。控制着大不列颠国家出版业的有7家大公司，其中5个是由最初创业者家族的后代以及他们的亲友控制的。在美国，哥伦比亚图片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由这些业主所控制。

其次，小股东几乎没有个人投票权。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战胜大股东。大多数小股东对于公司的管理不感兴趣，也很少参加会议。结果，少数组织得很好的有实力的股东对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非常容易了。

由于媒介组织的规模逐渐发展，公司的所有者不可能掌握公司机构各部门日常活动的详细情况，缺少保持对公司的具体控制的时间和专门知识。但是通过董事会议他们得到了对公司的目标和政策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例如，公司的发展方向是否应该变化，向哪个方向发展，应当分配多少利润，以及将多少资金投回公司经营等等。这就是帕尔和温克勒(1974年)所说的分配控制。实力雄厚的所有者能够建立一个总的机构，由经理和专业雇员进行管理，而且雇员在这些范围内会有相当的灵活性，有艺术创作和编辑的“自由”——即决定以最佳的方式，利用既定的人力、物力按所有者的愿望办事的时候。

媒介机构极易受各种各样的商业性影响。在西方，大多数媒介机构本身就是盈利性质的企业。他们通常是某些较大的工业或金融集团的组成部分。无论属于哪一集团，获取利润的需要很可能就是对他们各种活动的一种影响。

对于许多媒介机构来说，广告是一个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自然地，广告商的要求对媒介的内容

和发展就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广告商以两种方式影响报纸。一些报纸支持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事业，因此遭到广告商的联合抵制而被迫停办。与另一种更不易觉察的影响相比，这种直接干预的行动较少见。为了寻求广告商的支持，受到工人阶级欢迎的报纸也被鼓励扩大读者范围。因为一份只有工人阶级读者的报纸对广告商几乎没有吸引力。

广告商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新闻出版界。巴尔诺(1978年)已经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电视剧作者是如何受到广告商的鼓励和支持而停止制作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电视剧的。这并非由于这些电视剧不受欢迎——实际上，他们有很高的收视率——而是由于广告商认为这类节目不能为宣传他们的产品提供合适的背景。因此，他们提倡用惊险情节的系列片代替它。

就英国新闻出版界来说，报纸的真正顾主是广告商而不是读者。广告商对媒介的内容有着重要影响。同样，也有证据表明，所有者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并且确实实现直接控制。下面摘录了同一位业主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先生的谈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会见人：如果编辑与你的看法不一致，你怎么办？

戈德史密斯：这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如果你与编辑的意见不一致，那就有让步与坚持两种情况——有时你让步，有时他让步。如果分歧发展到双方不能协调的地步，那么，编辑就辞职，正如一个总经理将会做的那样。

(见默多克，1982)

但这种直接控制是不得已的手段。所有者实行的最有效的管理是间接的。公司的雇员知道，为了获得成功而得到提升，他们必须遵守为他们规定的目标，避免可能冒犯所有者的有争议的材料。这些界限成为机构里毫无疑问的常识性原则。

在西方，出版自由经常与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相提并论，被看作是神圣的民主原则。它们的作用是揭露腐朽堕落行为、维护普通公民的权力。

把新闻界看作是监察者的观点受到西里诺(1973年)的批评。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在传播媒介里向公众隐瞒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政治家和大公司感到头疼的问题，如美国穷人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汽车设计的事故，抽烟的危害等问题，都被有计划地从媒介报导中删掉了。西里诺认为，媒介确实很少领导抗议运动。

媒介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是一支独立的力量、自由的卫士，这种主张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当然，国家和媒介之间的种种关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的。但新闻出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即为了树立民主的形象由政府编造神话。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制而自由发展。大众媒介对公民的影响太大了，不能给它们无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势力把控制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台）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但维护新闻出版自由神话的愿望确实迫使政府在对付媒介时采取慎重的行动。尽管存在干预的事实，政府也不愿意被人们看作是干预了新闻自由。因此，控制经常是隐蔽的；控

制是通过半自治的团体间接地进行的；或者通过自我调整的机制最有效地进行的。大众媒介本身是训练有素的，从不越轨，因此，并不需要强制管理。国家有能力调动力量对抗传播媒介，这些力量大部分储备起来，可以威慑不轨行为，促进自我控制。

在国家危机时刻和“非常时期”，政府可能对媒介机构采取更为直接的控制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由温斯顿·邱吉尔领导的英国联合政府以共产党人的《工人日报》对统一的战争规划构成威胁为借口，禁止发行。发行量更大的《镜报》也遭到取缔的恐吓。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采取镇压措施的真实动机是压制政治批评，而不是保卫国家的安全。（科恩和西顿）

最近，在南大西洋，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了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政府直接检查在英国特混舰队上采访的新闻记者能够发回英国报界的所有描绘战争情况的稿件。战争结束后，新闻记者抱怨说，军事审查官不但以军事合法性的理由，而且以文件风格为借口拒绝发出一些材料。甚至涉及新闻报道遭到军事审查这一事实的材料也被删掉了。记者还指责政府不与其合作，使他们难以把战争的电视画面传播给英国的观众。通过直接检查、拖延对有争议的文章进行清理以及对传播媒介（尤其是对通信卫星）的直接控制，政府对英国传播媒介关于战争情况的报告，保持了有效的直接控制。（哈里斯，1983年）

在现代国家，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信息来源的控制给政府提供了对媒介机构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对传播媒介实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将信息划归为国家机密。例如，英国政府用在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最严密的秘密围罩，将其行动掩盖起来。这个围罩是由200万文官签名的并遭到许多批评的“官方秘密条例”。这一条例规定，除了由一名文官作出说明，每一个官方行动都是官方的秘密。情报局前任局长马丁·詹姆斯·弗尼瓦尔爵士巧妙地表述了这个条例的实质：“如果它在官方的档案里，它就是一个官方的秘密。”

英国政府经常用这个条例堵那些批评者的嘴。如果一个文官泄露了官方秘密或某一公民设法得到官方的秘密，就是违反了条例。萨拉·蒂斯德尔是一名低级文官，因为向《卫报》透露了关于国防大臣米歇尔·赫塞尔廷操纵议会的消息，于1984年被判刑入狱。

## 各种不同的学术压制\*

有三个简明的个案研究：第一，1915年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授S·尼尔林由于公开反对煤矿使用童工而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解雇。因为这个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中有一名很有影响的煤矿主，大学校长决定必须让尼尔林走。第二，1940年纽约州立法机关的拉普—库代尔委员会开始对市立大学系统（现

---

\* 本文是《控制知识分子：对八十年代学术自由的想法》一书（C·卡普兰等编，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83年版）中的一章。作者B·奥尔曼现为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为纽约市立大学)的颠覆分子进行臭名昭著的调查。1942年, 40余名教授或者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 或者由于他们拒绝公布他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联系而被解职, 或未能续订合同。第三, 1978年密执安大学政治系拒绝给J·萨莫夫任职, 说他没有充分地、在正统的政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并且指责他在研究他的论题时采取了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在这三个个案中, 作为一个教授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的权利被剥夺了。对学术自由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呢? 人们最容易提到, 也最容易得到广泛支持的看法是来自政府对学术决策的干预, 只有当政府对大学采取不干涉政策时, 学术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证。

然而很多愤愤不平的教授和学生都认为当今对学术自由的更大威胁来自那些试图把他们的价值标准和看法强加于整个大学社会的大学校长和理事会。另一些人则认为, 系里的偏见为害最大, 如果处于教授地位的人们不能对非正统研究方法采取真诚的容忍态度, 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学术自由。

由于那些支持政府干涉大学事务的人也往往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学术自由”, 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简单说来, 人人都赞成学术自由, 只是着重点和所反对的东西不同而已。1978年, 马里兰大学由于我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而拒绝让我担任政治学系主任, 我认为这是对我学术自由的打击。而拒绝我当系主任的校长J·托尔却坚持说, 他是为了学术自由才这样做的, 他的学术自由就是不顾一切外部压力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很多州的政治家也在谈论要针对我这样的人维护学术自由, 这些人对大学进行财政惩罚的威胁构成了最强大的外部压力。



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能说明一下当今美国学术自由的状况。

我们研究的场所将是大学，不是任何大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学。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资本家想从大学得到什么，他们在大学里干了什么，以及所有这一切和学术自由有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生产方面的一切决定都取决于是否能为所有者赢取最大利润。为了保证利润，政府为资产阶级在管理经济方面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思想——即对现实进行片面的、带偏见的并且实质上是神秘化的解释——作为一种掩饰国家越来越明显的亲资本主义偏见的工具，已经从工厂传播到宣传媒介、市场和学校中去了。

在所有有助于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得以顺利发展的思想中，没有比“机会均等”的思想更重要的了。在这方面，大学也有它的特殊作用。看来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或者将来会有机会得到补偿，他们宁愿接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正是高等教育比较开放的制度可以为存在这种机会均等提供生动的证明。要使大学在这出资本主义戏剧中扮演好指定的角色，仅仅使每个想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进一所大学是不够的。如果把大学仅仅看成是提供低水平的技术的、并且是用未来的资本家雇主所认为重要的价值标准和态度来向学生灌输的职业学校，看成只是在中学已经开始的那种连贯制度的继续，那么大学为提高人们对于存在真正的机会均等的信念方面所进行的关键性思想工作必将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害。

大学在为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影响到课程的内容。特别是目前，由于政府对资方经济进行更直接的干预，而且大学里有这么多年轻的工人阶级成员有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阅读和思考，因此十分需要对现状加以比较巧妙的合理化。大学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时，必须在表面上容纳各种观点，包括对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批评，一直到自由争论。否则从大学产生出来的各种思想就会被认为是宣传，而不是“知识”和“科学”，不大能够左右人民了。这不仅会影响到学生，而且也会影响到一般公众，他们很多信念和偏见都是通过学术界的裁判而取得它们作为不受价值约束的社会科学的合法性的。

.....

从上述情况中，首先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美国大学需要一点批评的思想，这意味着需要有少数能批评的教师，也意味着为了使他们能够工作而给他们少量学术自由，以便使大学能起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预定要起和必须起的作用。有几个激进主义教授有助于使从大学里作为“社会科学”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合法化，也有助于使人们不把大学仅仅看成训练中心。

关键的问题是容许存在的少数激进主义教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才不致被认为过多了？在工人阶级入学率日益提高而经济情况日益下降的情况下，大学里存在激进主义分子，这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真正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应该在什么地方划线，由谁来划线，以及根据什么标准来划线，人们一直在政府、大学行政当局以及几乎每个大学的院系里进行辩论。

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大学里学术自由的实践看来是在三个层次起作用的一种控制机制。在政府这一级，它的手段（压制性的法律、行政方面的干扰、威胁削减经费等）和目的都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作了某些努力，用维护学生的学术自由以免受激进主义教授欺骗这样的话来掩饰其目的。在大学行政当局这一级，他们掩饰的办法，一方面是采取维护大学的自主性、不受政府直接干涉的方式，另一方面设法使大学能顺利地办下去。在系一级，用马克思主义者M·菲斯克的话来说，这种“内部控制”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对于什么构成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以及每个学科的哪些杂志能够得到学术上的赞许的问题，作出所谓客观的决策，这样就使得人们若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一般说意味在激进主义杂志上），那么，在考虑提升、任职等问题时，他们的这些文章就不会受到重视。只有在政府这一级，学术压制才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竭力使激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信念而被排除出大学。

在区分政府、大学行政当局和院系所特有的学术压制方式时，我并不认为这三个层次是各自独立的。恰恰相反，政府对大学行政当局的影响——例如表现在任命校长和理事会，决定预算，确定重点研究项目，批准计划等方面——是压倒一切的，为此有一位学者M·布朗认为我们应该把公立大学的行政当局看成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在现在仍称为“私立”的大学里情况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我并不想贬低把政府、大学行政当局和大多数院系同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和价值标准方面的联系，即M·菲斯克通过把大学教授称呼为同资本家保持一种特别侍从关系的“官员阶级”所试图着

重表明的那种联系。我主要感兴趣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大学里那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特别是教育、社会化和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合法化）怎样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学术压制，而从分析来看，又变成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这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府、大学行政当局和大多数院系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致。

那么，关于我们经常设想的、或经常提到的学术自由的理想能说点什么呢？

第一，很明显，只要资产阶级还控制着大学，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那么学术自由的理想及其实践之间的差距就或多或少是固定不移的。但是，我也认为学术自由理想本身在保持这种差距固定不移方面可能起着作用，它非但不能使问题得到部分解决，而且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因为学术自由理想通过对实质上压制的做法进行不全面的描述反而有助于起掩饰和歪曲作用。

其次，学术自由理想从开始作为对实际情况进行不恰当的描述起，逐步变成对于发生的事物作出软弱无力的解释，这些解释在极少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甚至能被一切最坏的恶棍所接受。正是由于大学里的大多数人从不完善的学术自由出发曲解学术压制，才使学术自由能够和学术压制一样继续有效地起作用。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术自由的实践是学术压制，那么，学术自由理想就是一种既允许、也为这种情况的产出提供掩护的思想。

此外，学术自由理想在维持现状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来自对自由的狭隘的理解。在谈论自由时，不论是关于市场、政治或学术自由，都假定存在着平等条件和容许人们能够利用自由。因为自由不只是需要某些东西，而且包括有能力去做

一个人想做的事或拥有想拥有的东西。这是包含在实践中的需要，但和单纯的需要不同，实践要求存在某些条件。遗憾的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这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平等。简单说来，一些人享有金钱、工作、教育等，而可以自由行动，而另一些人则不行。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从他们特权的现成的合理化中得到利益，他们无非只是利用他们的自由而已。

学术界有权的人们按照上述办法来利用他们的自由压制激进主义者。如果说包含在学术自由实践中的控制机制给他们这样做的手段，那么是学术自由的理想给了他们有效的办法使之合理化，因而这就使他们一面在进行压制，一面又不断喋喋不休地谈论学术自由。在大学里，正如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在对社会正义缺乏强烈支持的情况下去支持自由，其本身就带有甚至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的种子。要使学术公平的理想和学术自由的理想同时实现，我们必须等到这样一种社会来到才行，在这种社会里不再需要它的大学来帮助它重新产生不平等和使现存的不平等合理化，也就是说，要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

## 第三部分

#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

## 色情文学日益商品化\*

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已目睹了色情文学日益商品化的过程。有时它是一笔很大的生意，而眼下是估计有50亿美元的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但是，色情文学已不是简单的扩大，而是更加多样化了，并找到了新的读者，到80年代后期，它已具有一个根本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技术上的进步和通讯系统的改善，对色情文学的创作、销售和消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电视的出现，把色情文学从小街僻巷的电影院中带出来，进入了家庭甚至办公室。（一个女雇员反映说，黄色影视片被作为新的地下“娱乐”了）。由于通过电话付帐的新方法和恢复购物卡制，现在的重点是在家庭消费上。空闲和娱乐越来越依靠游乐场所，而色情文学也正随着这种趋向发展：如果你有供顾客带走的烤羊肉串和四个一包的花蕾饼而能在家里享受黄色书刊、录像时，你干嘛要到外面去呢？

---

\* [英]卡罗琳·哈里斯等《改变了的形象描绘——评色情文化》，载《今日马克思主义》1988年第1期。

把你所花钱买的色情文学作品或录像带隐藏起来，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毕竟比用电话要妓女是不受追查的事（至少在详细列出的帐单到手前）！无论如何完全不用去带有个体化和利己主义化的消费的地下俱乐部，因为色情书刊、录像作为可以接受的娱乐商品多半公开出售。电话叫妓女的下流活动由冷到热，公用电话亭不再是“堕落者”的活动场所，它们目前成了一种神学士宣扬礼貌的设施。

20年前，那类被谴责为无耻、下流甚至不道德的形象描绘，今天已广为人们所理解。我们文化中色情的形象描绘激增，已扩大到“第三版”和《周末娱乐》以外的电影、广告和电视中去了。正当女人们设法把钉在墙上的女郎照片取下来的时候，似乎很多报刊经销商却正购进一大批影响日增的标题“最引人注目”的刊物。整个80年代，创办已久的一些“男人杂志”中的个别发行量缓慢下降。但这是由于比较多的个别读者更加广泛地选择订阅范围的结果。现在，我们既有《雨篷采风》，又有《雨篷》，既有《花花公子》，还有《花花姑娘》相伴，等等。

这类杂志的激增，其主要产物是“隐晦的黄色内容”的市场。近几年渗透各种刊物的形象描绘，用托尼·帕森斯在描写男性生活方式的杂志《竞技场》中的话来说，就是“舰队街按摩女郎”那半圆形的凸出的屁股背，卖弄风情的微笑和两只沉甸甸的乳峰间的沟壑。文简图多的小报使得色情文学大受欢迎。在价格战中，利用描绘女人的形象以增加销售量，与“耸人听闻的通俗报刊文章”的精致描写和彩印手段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这些小报不再出卖它们的新闻报道，而是使人娱乐消闲。于是女人对于异性的男性读者，就成了这种娱乐消

闲的一部分。

第三版、《星期日娱乐》和《娱乐》利用了历史悠久的英国人使用猥亵语言的传统，学童戏言中性的影射和刺激，海滨“下流的明信片”和音乐厅里对女人的嘲弄。在这个国家里，如果穿着本尼·希尔式即“奶头和屁股”令人遐想的三点式泳衣，是唯一允许给以性的特征的形象描绘的话，女人们倒是会怀着这种态度乐意迎合的。

当色情文学终于到了“赤裸裸地描写”时，在欧洲，英国是唯一仍然保持禁止毫不隐讳的题材描写的借口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赤裸裸地描写”色情的文学就在这里找不到，也不意味着习惯法能设法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可是正是这种禁令有力促成英国色情文学行业有其本身的特点。正如《色情文学金牌》的作者戴维·赫布迪奇和尼克·安宁所解释的：英国色情文学目录一半源于80年代初《磁带录像法》制定以前的进口货……这种进口货——主要在一群热心的业余爱好者中间流传——又陆陆续续得到商人和度假人带进英国的色情录像带和书刊的补充。一旦1992年欧洲共同体的贸易壁垒取消，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人们普遍预言“赤裸裸地描绘”的各类作品将泛滥成灾。结果是，保守党政府必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谴责色情文学，实行严厉制裁特别“红灯区”的尖锐政策（这一切都是在为“人民需要”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本身那种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使得它愈来愈不能控制事后默许的有关商品交易的冲击。

“较隐晦的黄色内容”的书刊录像带早已扩大了它的市场，“赤裸裸的黄色内容”的作品表明它有未来的潜力，而且所有色情文学——从纯粹的行业风气来看——正趋向于多样



化。在美国，随着“女性作品”专营公司的开路，“描写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一个相当兴旺的行业。记者柯尔斯蒂·米尔恩断言：“将来决不会有用现在规定方法所解释的‘描写女人的色情文学’。”与此大相径庭的是，看来早已购买10—20%色情录像带的是女人。有时，女人们看色情文学作品和录像，是想通过性刺激重新恢复夫妻的关系。但是其真正的结果是“姑娘们夜晚成群外出的场面”。女人们为了寻欢作乐就自动利用色情文学刺激自己。“安·萨姆纳”交际会日益流行，而“黎明咖啡馆”眼下可能意味着一起观看最新录像。色情文学作品制造商已看到了潜在的女性观众，并开始制作适合她们口味的题材、作品。例如，影像制作商迈克·弗里曼已经从“赤裸裸黄色内容的描写”上转移到以米尔斯和布恩风格的电影剧本集中写“罗曼蒂克内容”方面。

由于色情文学作品力求找到新的出路，其形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而且由于我们的视觉文化利用更加直率和更为公开的性描述，所以色情文学与非色情文学的区别也日益模糊不清。电影《我心中的火焰》和《九个半星期》就把性作为它们的主题和票房价值，并用某些人会称之为色情描绘的方法来处理性情节。在时髦的印刷界，塔特列尔和哈珀斯与奎因公司近来已利用“蓄谋强奸者”序列片（妇女被毒打、捆绑和劫持，但又白璧无瑕地出来了，并且拍下了艺术性的照片）来赚钱。而0898电话线使另一个定义问题非常突出：你怎么称呼那种人们认为同色情文学沾边，允许“录下他们想要禁止”或“满足你的性念头”，而实际上从神学士那里捞回同样一大把钞票的某些性内容的东西呢？

我们应当怎样解释这些变化呢？对色情文学最严重的批

评来自争取女权运动。经过80年代的发展，争取女权运动者的分析已不断引起人们对我国文化中的色情文学的广泛注意。他们对黄色读物的作用、旨趣及隐晦的意义都表示非难。首先，作为性别歧视者的描绘形象，这些读物把妇女描写成没有自发性生活的性欲者的对象。第二，许多争取女权运动者认为，色情作品在对妇女压迫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间，在男性强奸中的黄色描绘部分是主要因素。

尽管有一系列看法，安德烈娅·德沃金的黄色读物《占有女人的男人》出版之后7年仍把争取女权运动者的说教作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她的论点过分依赖于生物学上的决定论：女人永远是所有“作为一个阶级的男人”的牺牲品。她把男人和女人置于对立的两极，并主张一种本质先于存在论的性行为观点（男人之所以不能改变是由于他们绝对幸运地生下来即为男人）。

德沃金和诸如“反对蹂躏妇女的妇女”团体的观点，即把色情文学与暴力联系起来，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人的赞同。妇女们正日益寻找出她们自身性暴力的经验和色情文学的存在与作用之间的联系。《交际》杂志6月份的一次调查表明，在2,000个左右的回答中有98%的人对下述问题回答“是”：“黄色读物鼓励以性暴力对待妇女吗？”一种根据争取女权运动观点对色情文学的理解，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应当说是一个胜利。争取女权运动者分析的这条路子，早在1983年也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当时《色情文学和性暴力》一书——提交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委员会（美国）公开听证的正式文本——由《普通女人》出版社出版了。作证者有身受与黄色读物有关的性虐待或性强迫之苦的妇女，心理学家和对性

犯罪者做工作的精神病治疗者。该书最后声称，要提出在黄色读物、录像带的制作及其对男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两方面“色情文学的赢利与性暴力犯罪之间”有联系的证据。

## 包围少年的社会环境目前正趋于恶化\*

当前，日本少年违法犯罪继1951年和1964年两次高峰之后，正处于形成第三次高峰时期。无论从量上说还是从质上看，都很值得忧虑。

1983年明显地出现违法犯罪低龄化，同时少女违法犯罪显著增加，对教师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包围少年的社会环境以及对少年产生有害影响的出版物等泛滥，少年喜欢逗留的场所，如游乐中心、深夜饮食店以及性违法和少女卖淫等各种场所日益增加，正在助长少年违法犯罪并成为妨害少年健康成长的主要因素。

以最近社会一般的享乐风气和过分的营利主义作为背景，以露骨的“性生活”作为招揽的窥视剧场、个人按摩室等所谓性企业，以及成为不良少男、少女们逗留场所的通宵快餐馆和吃茶店、游乐中心、迪斯科舞场等鳞次栉比；同时，明显刺激少男、少女性感的杂志等有害图书、唱片等泛滥成灾，这一切都说明包围少年的社会环境日益呈现恶化的倾向。

另外，百货商店、超级商场等大型商店的商品陈列方法

---

\* 摘自〔日〕山日晋作《日本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及其对策》一文，载《犯罪与非行》1984年第5期。

和保障安全体制，车站前等存放自行车场所的管理状况等，在防患于未然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为偷商品和偷自行车创造了条件。

这样恶化的社会环境，对于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直接、间接地都给予不好的影响，必然成为诱发和助长少男、少女违法犯罪、妨害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

所谓逗留场所，是指少男、少女聚集在一起吸烟、饮酒，进行异性交往等不良行为的场所。到1983年7月为止，警察所掌握的这样的逗留场所，全国共有16,473所，其中通宵快餐馆和吃茶店最多，占22.4%，其余是公寓，占15.1%，游乐中心占14.8%。

因性违法犯罪而被管教的少女，1983年以来一直在增加，1983年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7.3%。其中高中学生最多，占28.3%，其次为初中生，占28.2%，特别是初中生比1982年增加了10.8%，引人注目。

根据对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因性违法犯罪而被管教的少女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因受对方引诱等性违法犯罪的场所，在“路上”最多，占31.3%；其次是在“通宵快餐馆与茶吃店”，占22.1%。另外，根据其他调查，“类似汽车游客旅馆”占36.3%，“旅馆”占27.5%，两者加在一起，占60%以上。这些营业所可以说都是为少女们提供性违法犯罪的场所。

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自1982年12月至1983年2月进行了“关于恶性违法犯罪少年研究调查”。根据这一调查，即使从少女来看，“经常出入迪斯科舞场与游乐中心等”，虽只占少女总数的4%，但是其中违法犯罪的少女却占57%；同时，“经常逛马路的少女”，只不过占11%，而其中违法犯罪的少

女却占50%。由此可以理解违法犯罪少男、少女与有害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最近情人银行、约会吃茶等所谓性企业繁多，以及由于杂志、电视等造成的性信息泛滥，更进一步诱发少女违法犯罪，因而造成卖淫的人数急剧增加。

包围少年的社会环境目前正趋于恶化。从最近少年违法犯罪的过程来看，少年们聚集在马路、迪斯科舞场、游乐中心等场所，许多人是在游乐之中，彼此相识成为朋友从而集团化。由于游戏、享乐挥霍，才走上盗窃、恐吓等违法犯罪道路。同时，经常出入这些娱乐性设施的少女们，则成为暴力团体和恶劣的经营者的引诱对象，因而在各地经常发生卖淫等事件。目前的不良社会环境，已成为影响少男、少女健康成长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舆论调查指出的“酒、香烟、黄色杂志等的自动售货机过多”、“庸俗黄色的杂志、电视与广播节目泛滥”、通宵快餐馆、迪斯科舞场、游戏中心到处林立等问题，正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同时，8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电影、杂志关于性和暴力的描绘过多，对少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 白魔腐蚀的国度\*

布什总统上台不久便任命原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为全美毒品管制局局长，向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开刀。他当时指出“毒品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

\* 摘自〔日〕《政界往来》，1989年第7期。

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10年，美国的毒品消费量、吸毒人数、贩毒案件有增无已。对美国人就“你生活中最担心的事是什么？”所做的民意调查表明，对“毒品蔓延”的担心居于首位，已超过对通货膨胀、核恐怖、公害、艾滋病、失业、治安问题等的担心。就近5年的报纸标题看，已经没有任何一天看不到“吸毒”、“艾滋病”的字样。体育界、文艺界、实业界甚至司法界因牵涉吸毒而曝光的事件层出不穷。因可卡因中毒死亡的人数逐年直线上升。1984年是470人，1986年是930人，1988年是1,582人。与可卡因有关的患者人数1984年是7,155人，1988年竟达39,657人。

1988年被当局没收的可卡因达27万磅(约123吨)，是两年前的2倍。而在黑市上销售的恐怕是其20倍。的确已经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吸毒是怎样蔓延起来的呢？

普通市民开始吸毒是在越战期间，出于对越共的恐惧和对战争的厌倦，是为了逃避现实。大麻流行时，有许多学生和教师吸毒成瘾，教育的荒废是毒品流行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多民族和阶层复杂的美国，缺乏统一进行全民教育的基础，许多人自甘堕落。

另一原因是收入和生活两极分化，有钱人有了钱和闲暇，就想法找地方消磨，给毒品销售造成了好机会。

然而禁毒运动并不一帆风顺，法院围绕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禁止不合理搜查”，长期争论，相持不下。一年前因火车司机吸毒酿成重大事故，美国最高法院才判决同意对联邦政府职员和铁路工人进行吸毒检查。也许联邦政府毒品检查官和警察有权对机场涉嫌贩毒的旅客强行搜查和审讯。但这种

没有根据地对旅客行使强硬的权力，在宪法上也还存有争议。国防部也表明美国军队开始参与“毒品战争”，为不直接行使搜查权，可对阻止贩毒者随时给予提供技术和交通工具等帮助。

1988年一年之间杀人案件中的受害者达371人，几乎所有的杀人案都与毒品有关，人们把受杀人案件困扰的首都华盛顿称为“晚期症状”。政府终于对未成年人发布了夜间禁止外出的戒严令，表明联邦政府有了直接介入的意向。在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保卫自己的“开拓者之国”的美国，枪支管制一向很难，如今也不得不决定全面禁止持有半自动手枪了。

政府部门，如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等以邻为壑，各扫门前雪。扫毒又不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所能马上解决的问题，一般市民的期望给政府带来的压力很大。连贝内特局长本人都告慰说：“这是10年、15年或20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 一个麻醉品文化的社会\*

近15年来，青少年使用麻醉药物的现象显著增长。许多青少年日益成为严重的、肆意冒险的吸毒者。除了广泛使用大麻以外，几乎有五分之一的美青少年使用中枢兴奋剂苯异丙胺和镇静剂巴比土酸盐、海洛因、可卡因、LSD、PSD（粉末天使）等药物。

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与朋友集合在一

---

\* 摘自〔美〕J·康格、A·彼德森《青少年：在变迁的世界中的心理发展》一书，1984年版。

起时尝着玩，有些是城市贫民窟里孤独的绝望者。用一个14岁的、一度是吸毒者的话来说，他们吸上海洛因是为了“摆脱无处可去”。

青少年尝试吸毒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麻醉药到处有的是。我国的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麻醉品文化的社会。我们服用麻醉品，为的是使自己放松、恢复精力、及时入睡、解除焦虑忧郁、排遣无聊。和成人一样，许多青少年认为，他们能够通过药物得到比较好的生活。

对于青少年来说，各种药物都很容易弄到手。每10个高中生中就有9个声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或“相当容易地”弄到大麻烟叶。大多数人对弄到苯异丙胺、巴比土酸盐和安定药物持同样的看法。不到一半的人说，他们可以容易地弄到可卡因、LSD等迷幻药。今天，青少年面前有着大量的、五花八门的毒品可供选择，这些药物有的在药房出售，有的在街头巷尾成交。

青少年尝试吸毒，可能是由于同伴群体的影响。当大多数青少年离开家庭的庇护、进入比家庭范围更广的同伴社会中去寻求一种归属感时，就产生了对同伴压力的顺从现象。有些青年人尝试吸毒是为了让男友或女友高兴。另一个促使青少年吸毒的理由是：它是反抗成年人（特别是家长）的压制的一种手段。

有26%的青少年说，他们吸毒是为了逃避生活的紧张和压迫，是为了排遣无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成年人吸毒的主要理由。一个极度紧张不安的少女用大麻烟来放松自己，用安非他明兴奋剂或可卡因来消除机能不足感和自卑心理，并使自己产生一种强有力的、能够胜任工作的、幸福的



感觉。

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少年面临着失去希望的前途。经济的、社会的、种族的歧视，无法生存的条件，难以医治的疾病，破裂崩溃的社会环境和家庭，使他们完全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因此，只能在强烈的麻醉药物中追求自我的解脱。

总之，促使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是很多的，其结果也是各种各样的。

尽管如此，和成年人一样，当前青少年面临的问题，决不是用麻醉药来使自己兴奋，产生快感，从而逃避现实，而应该是寻找一条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更富有正义性，更富有创造性，更充满意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这一时代的五花八门的数不胜数的麻醉品才会被人们抛弃。人们才会从生活中得到快乐，因生活而感到精神抖擞，从而彻底摆脱社会孤立、个性缺乏、前途无望、信心丧失等感觉。

## 自杀成了一种最常见的死因\*

在发达国家中，特别在15—44岁的人当中，自杀成了一种最常见的死因。

“自杀”有“直接”自杀和“间接”自杀之分。“直接”自杀是指故意采取的导致死亡的行动，而“间接”自杀是非故意性自杀，它只是为另一种目的而故意完成的一种行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

\* 摘自〔意〕《天主教文明》（1987年第8期）编辑部社论《当代的一个悲惨现实：自杀》。

企图自杀与自杀不同。在自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我毁灭的意向，是死的愿望，而在企图自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我保存的意向。企图自杀的人是想发出一种“呼喊”，其目的在于唤起别人和社会的援助、干预和关心的反应及同情心。

根据社会学所进行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使自杀的危险增加并导致自杀的原因是，社会上的孤独，缺乏社会交往，很少参加所属的宗教团体和家庭活动，任其自流等。另外，所有那些不再可能适当地调节个人的需要并由此使人产生绝望情绪的社会准则和价值，也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一个人越是不能适应一种现行的准则体系，他想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自杀的危险性也与某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有关：抑郁症、吸毒、酗酒、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和精神变态。

造成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危机和孩子们今天受到的教育不对头：不是培养具有坚强性格和能够对付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的人。因此，当他们第一次遇到严重障碍时，或者他们感到是严重障碍时，便会陷入忧郁和灰心的境地，并有可能把自杀看成是一条出路。另外，人们也不能忘记宣传工具如电视、电台和报纸的责任，因为它们过多地报道自杀事件，以致使那些心理上脆弱和意志消沉的人模仿那些行为。

为防范自杀灾难而有待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加强家庭团结、和谐和它的教育功能，因为50%的自杀事件都是由于不稳定的家庭状况所引起的。另外，要尽可能地限制对自杀事件的报道，特别是不要报道有关细节。但是，最有效的预防自杀的方法是在道德上和宗教方面采取措施：只有从超凡的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才既能说明自杀是对上帝的

一种严重罪行和冒犯，从而有效地打消人们自杀的念头，同时又能给人以力量，使其经受并战胜曾导致其轻生念头的最严重和最悲惨的生活的考验。总之，如果说当代社会自杀率不断上升，是认为生活没有价值，那么，只有提倡这些价值才能防止自杀。

## 建立在感官享受基础上的婚姻\*

问：在美国，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是情欲。

问：情欲？

答：情欲就是对感官享受的强烈追求。情欲既是大多数婚姻原来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大多数婚姻之所以破裂的主要原因。让我来解释解释。在西方大多数婚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每个爱侣都相信另一方将会满足他或她的感官需要。这说明为什么一个女人总是在找寻一位长得英俊漂亮、“床上好”的男人，还要求他富裕阔绰，足以为她提供好房子、汽车、立体声音响设备以及其他等等，来满足她的感官享受。而一个男人总是在寻找一个体态娇美并且乐意充当一部好的性机器的女人。他还要求这个女人精通烹饪之道，以满足他的口腹之乐，等等。不管具体细节是什么，情形总是大同小异。共同之点是大多数的人结婚都是出于情欲，也就是说，出于满足感官享受的欲望。今天，西方之所以广泛地

---

\* 摘自〔美〕柏忠言《西方社会病》第4章“探究离婚的根本原因”一节。

流行男女两人完全不经过结婚就发生性关系或象夫妇一样同居的风习，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做法有个名称，叫做“试试货色”。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让每个人在性方面去试用一下另一个人。有点象你要买一部汽车或一些别的产品时先将它试用试用，看看是否合适。所以，性就是他们赖以决定结婚或不结婚的关键。换句话说，每个爱侣同意结婚的理由是另一方使他(或她)得到巨大的性欢乐。他们把这叫作爱，而实际上这真正是情欲。归根到底，导致大多数西方人结婚的最初原因就是情欲。

**问：**那么，导致他们离异的也还是情欲？

**答：**是的。如果婚姻意味着在性的基础上结合的话，他们性生活上出现了任何干扰都可能导致离婚。如果两者中有一方已经不再具有性的“魅力”，或者感到对方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时，于是男的或女的就开始想到两人呆在一块儿没意思。

**问：**但是，性的欲望岂不是永远也无法满足得了的吗？这事看来就跟人身发痒一样，越痒就越抓，越抓越痒。

**答：**对了。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满足“止痒”的要求，那么，男的或女的就很容易和自己婚姻配偶以外的人搭上性的关系。如果一旦发现有人能比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更能给予他们性的享受时，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再没有什么理由保持结婚状态了。

**问：**看来离婚案激增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婚外性伴侣的做法可行性增强了，另一个是婚外性行为的社会接受性也增强了。

**答：**是啊。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搞性行为的

随便自如真是和猫狗一般。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想在性方面享受一番而完全不受婚姻关系和责任所约束，那真是容易得很。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拥有一名随时应召而来的私人妓女——那么，当他意识到，他用不着花钱和负责养一个妓女（即妻子）也同样享受全部性乐趣的时候，他就开始感到自己做了一桩“糟糕的买卖”。越来越多的女人也意识到她们用不着去扮演私人娼妓和厨娘的角色了。由于避孕用品和堕胎手术容易获致，再加上经济独立机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离开了家庭。换句话说，一名妇女也许会感到：她用不着承担照顾丈夫和家庭的责任，也同样能够得到性满足和经济上的安全。

**问：**那么从根本上说，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结婚的人，当他们的私欲能够在离婚中得到满足时，他们必然提出离婚，对吗？

**答：**完全正确。欲念比性欲意义更广。欲念是自私心或自我陶醉心理的根子。一个被欲念迷了心窍的人只会关心满足他自己的一切欲求。当这样一个人把他自己仅仅看成是一具肉身及其感官的时候（换言之，他想：“我就是肉身。”），那么，他关心的事就仅仅是满足他的肉身及感官的需要（这就是享乐主义）。他的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受到贪欲的影响和左右。这样一个人会认为每件事物、每一个人都是供他享受而存在的。他（或她）变得无法看到人，而只能看到物。换句话说，当一个被贪欲迷了心窍的人，他并不是真正地看见你——你的“自我”，你这个有意识、有生命的人——他所看到的全部景象是你的肉身、你的财富，等等。当他看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全部景象是一大堆肉——也许是形

态优美的一堆肉——反正就是一堆肉——一堆物质而已。他无法看到生命——生命体——他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物品”。这种人，当他认为从某个人身上得其所欲之后，他就认为那个人不再值得利用了。于是，他就只想甩掉这个人。这就是说，他要使这种关系破裂。离婚通常意味着男女双方或一方感到：“我用不着你了。”

问：那么，离婚正是美国今天演变成“扔东西”社会(the “throw away” society)的另一个侧面罢了？

答：是的。正如有一位社会学家说过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扔东西”社会——扔掉纸碟子，扔掉剃刀片，扔掉尿布片，而现在，扔掉人。我们使用一个人——一个所谓朋友或配偶——是为了我们的高兴，然而当我们从他们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乐趣时，我们就把他们扔了，然后再去找一个。这不过是整个消费主义意识的部分表现罢了。当我们买一部新汽车，或者别的什么物品，心里想的是东西会使我们满意，可是过了一會兒就把它扔掉，再买新的。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做法。同样，我们四处寻找一个人，希望他能满足我们的某些需求，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感到没有得到满足，就甩掉这个人，再去找新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失去了区分一个“物品”(也就是物质)和一个“人”(也就是生命实体)的能力。丈夫本来应该把妻子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是整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他把她只看成除了满足他的欲望外再也没有什么存在目的的一具肉体。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陷入同样的享乐主义的剥削意识之中，认为丈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她性欢乐。于是，许多当丈夫和当妻子的都越来越多地只把他们的配偶当作满足感官需要的东西。正如我们说过的那

样，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旦他们的配偶不能再为他们提供那么多的性享受，或者离弃他们的配偶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感官满足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闹离婚了。

问：这么一来，你的意思是说，美国的许多婚姻更多地是一种做生意的关系(买、卖、交易)而不是一种爱的关系了？

答：是的。比方说，我这里有一本美国的畅销书，名叫《关照第一号人物》，作者是灵格。这书中有一部分题目叫《自私自利——万善之源》，灵格明确地说：他的“爱”的理想，实际上一点儿都不是爱。他说：

由于在关照第一号人物的哲学(即自觉的、合理的追求欢乐的努力)中，合理自私心是基本因素之一，又由于爱或许就是感受中最令人感到欢乐的一种感受，那么，好好理解爱在爱的各种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对你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了。如果你不懂得在爱的各种关系中找到‘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你就会在胳膊窝下夹着一大堆问题来冲出跑道闸门，这堆问题的负担使你在追求幸福生活中脚步越来越慢。

由此看来，灵格关于爱的观念和做生意——“等价交易”毫无二致。对他来说，一宗婚事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贸易协定——双方自愿妥协，但是双方也当然是尽量从对方身上捞取最大好处。事实上，今天契约婚姻越来越多了。男人和女人各自找律师起草婚姻契约，然后进行磋商。因而，婚姻和贸易协定简直完全一样。但这决不是爱，这不过是做生意。生意人的动机并不是爱，而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商人决不会白白地送给你什么东西，只有当你回报他一点什么东西，他

才会给你一点东西。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给予”，这是“出卖”。纯粹的爱不是这个样子的；纯粹的爱是无条件的。它不是建立在任何回报或偿付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爱我的话，我就爱你。”不，爱是无条件的。灵格在他那本题为《关照第一号人物》的书中继续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对爱的意义没有丝毫认识。在题为《出售的爱》的一篇文章中，他说：

在“你能否得到爱情？现在你知道答案了：你必须买它——在一个自由营业的爱的市场上去购买。

显然，灵格在关于爱的问题上是糊涂不堪的。事实上，爱和爱人都不是用钱买得到的。爱如果可以买到，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爱。灵格事实上显然不懂“爱”这个词的意义。爱从本质来说是“给予”。爱并不是对人有所期待，希望得到回报或酬劳。一家商店不会“赠送”人们自行车，它只是“出卖”自行车。如果一家商店做广告说“我们赠送自行车”，那就很荒唐。如果你进去不给钱就推一部车子出来，你就会被逮捕。因此，“给予”和“出卖”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显然灵格不懂这一点。灵格只懂得做生意——真的，他的整个人生观显然染上了他那种“自由营业”经济观点的色彩——他对“给予”一窍不通。他只不过是一名商人。他做“物品”的生意。但是，人并不是“物品”。爱是生命实体所独有的财产。他无力区别物品和生命实体，把自己的经济观点应用到生命实体上，这就犯了错误。我想，他那种“等价交换”的哲学也许在经济领域是有用的——那是买卖的世界，在并不真正相爱、但又需要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们之间的关系上也许能够有用。但不要把它误认为真正的爱。看到人们之间真正的爱已经越来越少，少到



人们不知道这是何物，这正使人感到悲伤。人们把它和做生意——做买卖混淆起来了。

问：灵格认为爱或者爱人可以用什么来购买呢？

答：幸运的是，灵格明白用奢侈、豪华的物质享受无法买到一个人的爱。可惜的是，他仍然相信爱是可以购买的。他认为你可以用对待某些人的某种态度来买到他们的爱。他认为你要买到一个爱人，那你就得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举止作为购买货物的货币或者金钱，这种行为举止包括：甜言蜜语、扮出关心对方各种需求的样子，等等。他说：

为了一个爱人，你得付出些什么样的价钱？唔，人们常常用貂皮大衣；但是，可惜的是，貂皮大衣也不可能使你得到那“真正的东西”。物质奢侈品不过是各种各样可以讨价还价的爱情货币（关心、慈爱、温暖以及一大堆抽象安慰物）的很好的附加物罢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附加物罢了。

灵格先生说，他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但是，他实际上是把影子误认为是“真正的东西”了。他和其他的“等价交换”哲学家并不是在谈论真正的爱。他们谈论的是行为举止。真正的爱毕竟是不能由人们随意地要有就有，要无就无，好象电灯那样，要亮要熄随心所欲。如果真能要有就有，要无就无，那它就显然决不是那“真正的东西”。“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的整个观念都是荒唐的。如果我爱你，我就爱你——这和你爱我与否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就不是爱情了。如果我关心你的健康幸福，那我就的确是在关心你的健康幸福，——这和你是否关心我的健康幸福毫无关系。如果它和这方面有关系，那么，所谓我对你的关心其实还是我

对我自己的关心罢了。因此，灵格所谓的不过是表演罢了。照他想，你要表演出你爱某人的样子，而别的人也表演出似乎他们也爱你的样子。他的想法是要表演出“慈爱”、“体贴”他人的样子，等等。换句话说，要表演出仿佛你真心实意关心另一个人的健康幸福和快乐的模样，而实际上，你真正关心的一切是你自己罢了，实际上全是演戏罢了，一切都不是真的。于是，尽管真正的爱不可能随心所欲的要有就有，要无就无，演戏却是随时都可以要演就演、要停就停的。因此，灵格和那些象他一样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误把影子认作“真正的东西”了。拥抱亲吻的动作或者说“我爱你”这类的话有可能是一个人真正的爱的表现或流露——但是不论拥抱亲吻或者“我爱你”这类动作话语，都不是爱本身。所以，灵格的“等价交换”哲学只不过是说，人们该表演出爱别人的假戏。如果他们停止表演爱你的假戏，那么，你也能够而且应该停止表演爱他们的假戏。这套把戏完完全全是虚假的，真正是一场假戏。这全是一种政治权术——充满了两面派作风的权术。

问：请你稍为解释一下政治权术和两面派作风好吗？

答：好的，政治权术或外交手腕是充满了两面派作风的。两面派作风就是口是心非：我心里想的是一回事，但是我表面上装扮成另外一副样子，目的是使你相信，我内心想的和表面上装扮的一模一样。我之所以如此这般表演一番，目的是想使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我。换句话说，本来我应该对人诚实地披露自己的心意，我却不这样做，我装出另外一副样子或按另一种方式来行事，借此引出别人的某种反应。换言之，政治权术和外交手段基本上都是虚伪造作的东西。譬如，

灵格说，你应该对您想得以作为爱人的那个人装扮出“亲切”或者“温暖”或者“关心”的样子。换句话说，就是要你按某种方式对待他们，以便他们也按某种方式对待你——以便他们也装出他们关怀你、爱你、关心你的幸福的样子。实际上，你们双方都只是关心各自的幸福——你们双方都在装模作样。

那么，在政治上，这种外交手腕或两面派作风之所以存在，只有一个理由：没有互相信任。不同的国家总是企图剥削其他国家，而又保卫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剥削。但是，在真正的爱中是不会有剥削的；因此，就能有真正的信任。在真正的爱中，不会有剥削别人的愿望；也没有耽心别人要剥削你的想法。因而在真正的爱中，没有耍两面派手法和外交手腕的必要。因此，哪里存在着两面派作风和外交手腕，那里就没有真正的互相信任。如果两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那怎么能得出结论说，他们相爱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问：在过去几十年中，离婚的夫妇经常在法庭上争夺子女监护权，但是最近的情况相反，越来越多的父母都不想要子女监护权。这是为什么？

答：这和我们谈过的理由完全一样。享乐主义的人们不愿意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感官享受。负担领养孩子的那一位家长必须作出许多牺牲——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牺牲，更多的是社交和性生活方面的牺牲。当然，如果那个家长也是搞乱伦和儿童卖淫的，则另当别论。但对于那些不搞乱伦的家长，一个孩子也会给他在性生活方面带来负担，因为有了孩子就更难或更方便当一名“换侣者”了——那就是一种花花公子或女阿飞之流——邀请异性朋友到家里来招待他们玩乐。有孩子在家里总会妨碍这种“招待会”的。所以，不

管怎么说，仍然是同样的问题，即享乐主义的意识。谁能使你得到感官享受，你就要他在身边，谁妨碍你得到感官享受，你就不要那个人。道理就这么简单。这是对别人和世界都非常冷酷狠心的观点。

问：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的离婚率来了一个大跳跃，增加2倍以上。现在每年有100多万起离婚案件，离婚率正在逐步上升。请谈谈牵连在这种动向中的社会因素是什么？

答：正如我说过的，美国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影响日益加深。所以，我们若想找出是什么社会因素助长离婚率增加，我们先要看看什么社会因素使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心理滋长泛滥。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同时也不断滋生着享乐主义的风气——而享乐主义是和自私、贪婪和嫉妒是分不开的。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整个信息就是：“能取到什么就尽量取，让你的邻居下地狱去吧。”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就是他们的金科玉律。感官享受被视作人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力为自己掠夺，越多越好；尽量少拿出东西来，越少越好。每个人都为他自己的感官享受而奋斗和苦战。他靠这个格言的教导生活：“接受胜于给予。”因此，我们首先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特点——它建立在人们的自私心理和享乐主义意识形态上，而且又助长这种自私心理和享乐主义。这一点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但是从前有过另外一些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防止人们堕落到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和禽兽生活中。这些力量往往包括家庭、邻居、教会或宗教。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消费主义经济总是经常地在滋长享乐主义，但是家庭、宗教

和邻居所灌输的道德思想却起着一种平衡抵消的作用。可是，近15到20年之间，推行消费至上和享乐主义的那些经济力量影响大增；同时，道德、节制和责任的传统力量却被削弱了。这是一个内容极为广泛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这里只能简单地谈一下。

**问：**你能否举例说明：滋长享乐主义的那些力量其势力是如何增长的，而那些限制约束享乐主义的传统力量是怎样被削弱的呢？

**答：**最明显和最典型的例子是商业电视成功地征服了家庭。首先要认识的一点是，美国的电视，不论在普通节目内容上或者更直接地在许许多多商业广告上（每小时都有10分钟的商业广告节目），向观众直接而有力地宣传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事实上，看电视这个事情本身几乎常常就是为了满足个人自己的感官享受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极少是为了教育或其他的建设性的目的。第二点必须认识的是：现在用来看电视的时间过去总是用来作家庭、社团或教堂指导下的各种活动。以往在晚餐时间，家里人都是用来祈祷、讨论、交换意见、说笑或听从父母教导等，现在却代之以永远是现成可看的电视节目。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享乐主义的势力及影响如何越来越强，而传统的道德势力如何越来越削弱。

## 第四部分

###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一 “我们的富裕社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 我们的富裕社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本文阐述了自1940年以来，绝对贫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再次出现，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经济的不稳定和贫困，正不断地反映出这一问题。人们意识到，他们依旧繁荣、富有的社会正在产生出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作者指出，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中，贫困问题已经又回到政治议事日程上来。许多国家担心：失去充分就业的机会也就使人口中的大多数丧失通过劳动保障生活的机会，由此，拥有大量失业人口的社会组织正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救济。许多国家日益提出“新贫困者”问题。

---

\* 摘自〔英〕G·詹姆《欧洲共同体的贫困：趋势与辩论》一文，载《世界经济》1988年第7—8期。

早在150年前，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就已经考察了这种贫困的新形式。他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工人易受冲击而陷入贫困的弱点会变得更加明显。这种情况已戏剧性地发生在今天的工业结构中。然而，他关于较少工业化的国家也较少“易受攻击”的看法在今天却未被验证。同时，他还指出，广泛地使用社会救济，不仅是社会的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还会打击贫困者希望靠劳动来生活的积极性。托克维尔的忧虑不幸被言中：经济的变化将为数众多的人口抛入穷人的行列；日益严重的靠施舍度日的现象被称为“依赖性福利”。而且，脆弱的单亲家庭的数目也正在不断上升。

或许，这些新型的贫困并不严重。因而人们在概念上争论较多的是“相对”贫困，因为过去的奢侈品已成了今日的必需品。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许多城市，无家可归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这已成为贫困的“绝对”形式。

作者认为，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富裕社会正产生一个新的“下层阶级”：他们是社会援助的长期负担；他们感到自己和现实社会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他们，也包括青年人，除了长期依靠福利救济外，几乎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也许还可以这样说，在“下层阶级”内部，正在出现亚文化的变化，这或许增强了他们的对外的排斥感。

这些情况的存在和发展，向当代社会的训练、教育和福利体系提出了挑战。在经济调整时期，在对付贫困上取得相对成功的瑞典，证明需要一种更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战后时期制定的主要针对于个人就业的劳动收入方案，今天已不再适用。然而，究竟如何能最好地确保新的贫困者获得基本的劳动收入，似乎还没有统一意见。

## 现代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吗？\*

### 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吗？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无视各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垄断资本与大多数国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状况，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无需掌握政权就可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而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飞速发展是提出“社会资本主义”的首要理论根据，然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并不会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无视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

所谓生产社会化，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集中在大企业手中，许多工人共同从事生产劳动，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日益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也向前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占有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今天，垄断资本同国民的矛盾日益加深，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股份制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实行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私人所有制本身，相反，一些大银行、垄断资本拥有越来越大的资本支配权。

多国企业不外乎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日本的大企业近几年正作为多国企业活跃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剥削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获取巨额利润。因而决不能说，依靠“生产

---

\* 摘自〔日〕卜部学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吗？》一文，载《学习》月刊1989年2月号。



的社会化”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因素。

### **美化垄断资本的理论**

过去，日本也曾有人主张，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国有化无须打倒垄断资本的权力，就可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发展。今天，这种“社会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上述理论如出一辙，不外乎是一种美化并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

只要看一下资本主义各国的实际状况，就不会说，今天工人的生活稳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也绝对得不出“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的结论。

在日元的比值迅速提高的过程中，大企业增加了收益，把巨额资金作为内部留成积攒下来。相反，工人却受到就业不稳定的威胁，被迫加大劳动强度并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中小企业面临倒闭的威胁，经营状况日益恶化。

### **为垄断资本的利润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经济生活，这并不是保卫国民的生活，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垄断资本的利润服务。

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竹下内阁强制推行最不公平的税制——消费税便可明白。迄今为止，自民党政府仅给大企业享有特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的待遇。而且政府使用国民的税金，实施大型开发计划，让大企业发横财。相反，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对于大企业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嫁祸于承包者等做法完全不加限制，甚至在“开放市场”这一口实之下，推行舍弃农业的政策。

关于福利制度及和平、民主的问题，这首先是工人、劳

动人民斗争得来的成果，不能因此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已经改变，也不能说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自民党政府已成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

今天，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正采取各种方式攻击福利制度和民主主义，妄图对反核运动进行反扑。在国民的意识方面，根据去年经济企划厅的调查，回答自己的生活状况为“下”的人比前年增加5%，超过20%。如将上述人与处于“中下”状况的人合在一起，达61.8%。这充分说明“中产阶级意识”正在淡薄。总之，那种认为中等收入的人数增多，实际工资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不完全符合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无视劳动者的个性发展\*

社会和历史的实践运动是由各个组成部分在有机的和矛盾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解放斗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一些国家(如法国)的社会运动和斗争，都在这个运动中相互影响。

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民族和传统方式上)都是这些进程的行为者和目击者。三大类根本性的、决定性的问题都源于这些过程。这三大类问题是：和平问题、社会关系中的民主和公正问题、广大群众以新的方式成为社会中一

---

\* 摘自〔法〕卡扎诺瓦的《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人在当今世界的责任》一文，载《思想》杂志总第242期，1984年。

员的各种愿望问题。近15年来，各种运动、许多组织和基督教负责人(出于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考虑)都曾经着重确认这三类问题的广度和紧迫性。他们对这一事实本身的论证既不相同，又彼此吻合，在我看来他们都从根本上关注这些问题。

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里，人类的生产力为消除贫困、饥饿、失业和大量死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人们反对把自动化和核能变为制造灾难和杀戕人类家庭的工具的这种愿望，形成了近几年来和平运动的多样性和力量。千百万关心和平的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参加了这些运动。

但是，由于不同社会的相互矛盾的潜在力量，物质生产力，诸如核热能，要么毁灭人类，要么各国人民积极自觉地动员起来，建设和平与民主新的国际秩序。这难道不能使我们人类历史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吗？难道不能使人们在历史、政治和伦理学方面，从理论上重新加以考虑吗？

我这里指的是完全新颖的社会公正感的出现，各种形式的、深刻的、反对不公正的斗争和思潮，以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已是我们时代的主流。

这一问题的出现与15年来的社会关系演变不可分割。1968—1970年以来，随着危机的全面、尖锐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视劳动者的个性发展，而千百万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认为个性的发展应当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群众向往摆脱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奴役和掠夺，获得个人和集体的解放，向往由公民——劳动者作为特定的主体，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参加民主和友善的多边关系中获得

个人财富，他们不断强化自己的斗争，并且获得了经验。

这些现实和进程要求人们对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思考。而这种思考同时也是在主要方面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法国就是这样。许多作者用技术效用分析劳动，分析劳动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城市空间关系、性关系、集体生活关系以及与文化的关系）。但是他们撇开了资本主义效益的逻辑所规定的方向，就事论事地研究技术。一些作者认为，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还可以“发挥”作用，并将超过泰罗制，在作出必要的牺牲、完成为危机所迫而进行的改组之后，建立一种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即以真诚相见的共生并存的源泉。另外一些著作所用的方法雷同，他们认为我们是朝着、并且应该朝着一个“二元”社会前进。这就是说，朝着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把友善的共生并存和由以工资为生的公民分担牺牲的苦行结合起来，获得使个性能够发展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社会迈进。换句话说，这样的“二元”社会将不损害企业管理上的资本主义准则，不危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之外的关系）的全面运动的结果。

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观念所做的这种盖然判断，是力图排斥其中的革命核心。这种盖然判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在1981年的教皇通谕中显露无遗。教皇让·保罗二世想让人知道劳动者向往解放，向往在从结果上，即与形成、产生和重视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上来考虑的生产劳动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有困难的。教皇把这种进程完全归因于资本与人——劳动者的矛盾。但是通谕仅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由物质手段组成的东西，他完全不懂得资本在本质上是生

产中的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与劳动者的矛盾被让·保罗二世用遮遮盖盖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东西，使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公民（为了解决千百万劳动者在个人生活和集体实践中遇到的生活问题和生活方式问题）革命地掌握和控制关键的生产手段与管理制度，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认为上述简单提及的这一组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人在当今世界上的方向。在我看来，这是一些基本方面，可以用来观察上述过程。我要说的是15年来已经居于中心地位的一个特定问题的条件及方面，即解放与拯救的关系。

解放（当然包括与解放一词密切有关的从妨碍个性发展，从实行剥削、社会压迫、文化和政治压迫的组织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一涵义）与拯救（做弥撒及个人和集体祭祀上帝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首要的现实。我认为它源自最近的一些发展。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即男女的教育、信息、解放运动，解放运动的新发展已处在一种从旧的生活方式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新文明所要求的中心地位的时期；处在依靠矛盾向往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各种潜力的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我们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努力展开的活动的几个方面，即生活、生活意义和文明生活方式危机。这一问题的发展过程（在企业、学校、家庭中以及在对自己的男子或女子地位的实践或疑问的发展运动中）更为明显。它导致人们对过去能够，现在仍可使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大的社会历史类型中作为“个人”存在的方式的基本方面不断进行思考。

这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危机以及它的复杂的构思，取决于法国25年来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的矛盾特点。这些巨大变化是：工资劳动者人数剧增、农村人口外流、城市化的加速、妇女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失业、超额剥削、失望等等。这些现象与上一个世纪类似的过程相比，有着历史质变上的巨大差异。

自1981年5月以来，今天的法国就出现了特别尖锐的生活方式危机运动、改革和斗争运动。它们的固有特点都会造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今天，人民群众的斗争实际上都有可能使国家摆脱危机，也就是说社会朝着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变化。与此为争取新的管理准则及人的技能而进行斗争同时而来的还有人类管理关系的另一种潮流的要求。在法国，对我们来说，这些斗争就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各种形式的公私营经济、思想冲突与模仿共存中进行的。

为争取管理财富和管理人的准则而进行的斗争（不包括为资本主义金融利益准则而进行的斗争）都是争取改变生活的斗争。我认为，这些斗争是与争取和平与新的目标秩序的斗争不可分割的。无论是信教的劳动者还是不信教的劳动者，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在反对精神上的不人道的、对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大资本金融利益这一主要目标上是一致的。基督教青年工人和法国天主教工人行动在和平问题、失业问题和生活方式问题以及在提供方案解决危机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有力地证明了这种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是在尊重各自在哲学观点上不可克服的差异中表现出来的。

各国人民的社会历史实际上并不是一部无神论者与有神

论者冲突的历史，而是一部阶级对抗史。以往基督教农民和下层教士曾经奋起反对特权者(其中有些人是无神论者)，今天基督教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唯物主义者兄弟们所受到的损害其根源都相同，即跨国公司追逐金融利润积累的政策。

工人、劳动者、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强有力的团结已在反对金钱势力的共同斗争的实践中深深扎下了根。人们在共同的日常生活中按照根本不同的制度和哲学传统，表明和设想着共同的深切向往。在我们看来，以这种方式生活着的公民——劳动者有权这样地生活：就是说正视有差别这一现实，在根本问题上完全一致。这样，他们的斗争和设想就能为孕育中的新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在这种新文明中，每个人都将以自己有效的责任心的发挥程度，衡量自己的自由。

## “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

一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能够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的法国，另一方面是一个弱小的、无组织的、被弃置于超度剥削之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与数百万人息息相关。

.....

两个法国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它们并不象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公共部门的法国与私营部门的法国相对立。人们可以在国营部门范围内看到一些待遇很差的阶层，而在私营部门

---

\* 摘自〔法〕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帷幕后面的法国》一书，1982年版。作者是法国电视台著名的经济记者。

里可以看到那些受到很好保护的绿洲。人们知道，公证人并不是公职人员，而医院里的助理护理员也不是特权阶层。现实和需要作的区别是更为复杂的。

很明显，权利和好处的分配与行业集团的各种现象有关。

当政府帮助那些本位主义的发展和有系统地支持那些最强有力的从而是受惠最多的集团时，也就因此建立了不平等的第二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孕育的不平等的领域结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法国目前的形势。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向银行让步，因为它需要银行，而国家又总是抵制清洁工们的要求，因为它只需要这些清洁工干活。由于国家这种反常的干预，被掩饰着的不平等可以一直发展到造成第二条鸿沟。这第二条鸿沟加上富有的法国人与贫穷的法国人之间的鸿沟，形成有组织的法国人与无组织的法国人之间的对立；强者与弱者的对立。

……

然而，人们现在掌握的大致的说明数字已足以表明法国财富的总的构成情况了。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集中而且不平等。10%的最富有的法国人占有总财富的50%—58%（这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反过来，50%的最不富裕的人仅占总财富的5%。这方面的集中比收入方面的集中高2倍。在收入方面，25%的工资最高的人才占总收入的一半。这种集中愈往上层愈明显，因为5%的最富有的人占全国总财富的30%，1%的最富有的人仍占总财富的11%。

能够说这些不平等正在减小吗？很遗憾，答复并不能使



人感到满意。储蓄经济研究中心197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不平等在25年里翻了一番。这与人们所看到的关于收入方面的缓慢发展变化完全不同。造成这种集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些不平等的自然发展趋势在扩大，而这又是由许多原因产生的。富人能够大量储蓄，他们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产，他们可以大量借债（人们只把钱借给富人），他们可以享受大批不动产的增值，他们有更大量的遗产并经常地可以得到馈赠。因此，大富户的财产完全有可能比小家小户的财产增加得更快。从1945年到1975年，1%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每年增加的速度为18.1%，而10%最贫穷的人仅增加6.6%。这是一场兔子与乌龟式的赛跑，在这场比赛中，兔子又是在乌龟前面好远的地方开始起跑的。

## 法国社会的贫穷形式\*

法国社会中的新富翁和穷人人人数在迅速增加。到目前为止，法国已有100多万人脱离了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失业的人数急剧增长。但人们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战后“光荣的30年”的副产品。法国正在滑向一个拥有两种社会契约形式的社会：一部分家庭有正常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并有社会保障做后盾，接受的是凯恩斯经济制度的管理；而另一部分命运不佳的家庭“创造”出一些新的在贫困中生存的方式，例如：打黑工、借债、家庭或邻居互助，或向社会保障机构和其他社会

---

\* 摘自〔法〕M-A·巴尔特《法国社会的贫穷形式》一文，载《法国社会事务评论》1987年，第2期。

团体求助。

贫穷的形式有多种，贫穷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从历史上看，法国的穷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贫穷的劳动者、新穷人和一小部分穷人。

所谓贫穷的劳动者，从字义上看，这些人是有工作但生活拮据的人。尽管他们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或者夫妇中有一人有固定的收入，但常常被一些经济问题所困扰，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收入而言，他们的收入最低，而且时常因一些意外情况如失业、离婚或子女问世，而使自己处于贫困边缘。这种穷人逐渐从通过体力劳动来维持生存变成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年老体弱或家庭困难者很可能被排挤出劳动世界，失去社会的保障，成为新穷人。

新穷人是从贫穷的劳动者中产生的，但与后者不同，他们不再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以打临时工为生。这部分人不可能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医药费用几乎完全自理。他们有时会被劳动世界所接受，同时又被拒之门外，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反对人们称他们为新穷人。这类人经济上无保障，时时刻刻受着贫穷的威胁，这种状况改变了他们的性格。

一小部分穷人即指那些经常处于乞讨和流浪状况的人。这些人甚至从事抢劫盗窃和装病骗钱。在人们眼里，这是一群集中了社会最肮脏和最卑劣的人：无业游民、流浪汉、妓女、犯人和酒鬼等。

贫困是一个与社会消费标准有关的概念，这种看法今天已被普遍接受。通过这三种贫穷形式可以发现即使是穷人也

有一个从富到穷，从有社会地位到失去社会地位的过程，而社会的发展和等级的划分又加剧了这种贫穷现象。

针对大量出现的穷人，法国出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管理机构：一种是公共救济事业局，该局是为一小部分穷人设立的；另一种是社会保障机构，是专为贫穷的劳动者设立的。至于新穷人，最初是无人问津的，但随着新穷人人数的增加，社会救济事业局中的行政管理人員开始把关心的重点转向新穷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考虑到社会公正，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和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或者说，用最少的开支来救济更多的穷人，提高自己的行政效率。因为他们认为新穷人是“可拯救的”，而且不用很长时间。

## 当前日本工人的生活及其意识\*

“1989年国民春季斗争联络会”发布的《国民春季斗争白皮书》说，日本的“实际工资水平10年间一直处于停滞状况”。“尽管从年龄层次上看，1987年国民实际收入水平比1977年增长了1.5倍，但从实际值上看，20至30岁的高中毕业人员和30至39岁的大学毕业人员，在这10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善。显然，对这部分人来说，这是个人工资零度增长的时代。

说“10年间工资停滞不动”决非夸张。从平均年龄上看，日本工人10年间工资的确增长了10%强，每年增长1%左右，但这些增长，不过是因为平均年龄的上升和工龄长的高龄人员

---

\* 摘自〔日〕《社会主义》，1989年第2期。

相对增加造成的。即使从平均值上看，这10年间的名义工资也在不断下降。政府发表的消费者物价近年虽然处于最低水平，但并不反映家庭生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距工人的切身感受相差甚远。

在这10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21万亿日元增长到333万亿日元，增长了50%。资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的正常利润从1977年的46,000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的126,000亿日元，几乎增加了3倍。然而，这种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高速增长，低工资和高垄断利润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愈益加强，从下列数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85年度到1988年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分别是4.5%、2.7%、5.2%和5.1%，而工人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只分别增长了负0.1%、1.9%、1.0%和3.2%。

尽管日本垄断企业的正常利润，1987年度增长了20.5%，1988年度增长了24.3%，但包括加班费在内的月工资，却仅增长了2.0%和4.2%。制造业规定之外的劳动时间，同前一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0.5和9.6小时，1988年一年的实际工作时间为2246.8小时，比联邦德国、法国等多五六百个小时。

日本著名工会组织钢铁劳联于1988年对工会会员的意识做过一次调查，了解到日本工人对工资和退休金非常不满，其不满度高达81.6%和85.6%。私铁总联在1989年2月进行的意识调查也表明，工人对工资现状最为不满，“不满”与“极为不满”的人合计高达90.2%，此外，对“进入老年后的准备”、“工作时间”和“业余生活”等也极为不满。

日本总理府1988年9月的“关于经济结构的舆论调查”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世界最高水平，

你有这种相应的实际感觉吗？”结果有69.2%的回答说“没有”。

自1975年以后，日本企业进行了所谓“合理化”的结构调整，裁减人员，强制退休，结果加重了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使日本出现了“过度劳动致死”的社会问题，仅1987年一年就确认过有499件“过度劳动致死”事件。日本工人4个人中就有3个人感到了“过度劳动致死”的危险，而“过度劳动致死”问题，不过是日本工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

## 工人“富裕化”了吗？\*

最近，“工人”、“工人阶级”这些词，在新闻媒介中已经比较少见，“职员”这个词，已被用来泛指一般靠工资生活的人，有的企业内部报纸，甚至用“产业人”、“企业人”这样的词来表示从经理、董事到一般的雇员。

那么，“工人”、“工人阶级”这些词已经陈腐和过时了吗？

本文想从根本上重新探讨一下何谓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阶级的问题，考察一下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 一、现代日本的阶级构成

现代的日本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呢？拥有1亿2千多万人口的日本国民又是由什么样的阶级构成的呢？

---

\* 摘自〔日〕北田宽二（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工人“富裕化”了吗？》一，载日本《经济》1989年第5期。

在谈阶级构成之前，首先谈谈什么是阶级，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弄清阶级的概念。对此，列宁曾下了个著名的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①</sup>

所谓阶级不是指“贫富的差别”，而是指在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这一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基础上，在社会劳动中所起作用不同的人的集团。这些集团，或者由于拥有生产资料能占有他人的劳动，或者因为没有生产资料被他人剥削自己的劳动。领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即贫富的差别）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那么，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阶级呢？恩格斯规定说：“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sup>②</sup>

这一雇佣工人阶级在日本国民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据1985年《国情调查快报》统计，198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满15岁以上的就业者、休业者及完全失业者合计）为6,027.1万人，其中，工人阶级4,309.8万人，占71.5%。在这些人中，职员层（从事专门技术职业及事务的人）1,522万人，占全体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25.3%，生产劳动层（从事农、林、渔业及工矿、运输者）1,752.7万人，占29.1%，非生产劳动层（商业、服务业及失业者）829.8万人，占13.8%。也就是说，日本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属于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阶级。在现代日本的1亿2千多万人口中，约有8千万人是工人及其家属，也就是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

日本的工人阶级队伍战后迅速壮大。1955年，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为46.3%，1960年超过50%，1970年达60%，1985年上升到70%。与此相反，从事农林、渔业的自营业者从1955年的37.7%到1960年降至30.6%，1970年为18.1%，1980年为9.8%，1985年为8.3%，迅速下降。工人阶级的实际人数从1955年的1,741.9万人到1985年增至4,309.8万人，增加约2.5倍；相反，农、林、渔业的自营业者（农民占大多数）在上述30年间，由1,504.6万人，降至497.7万人，减少了约三分之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从国民的阶级构成来看，也就是欧洲用100年时间完成的农民层分化、没落，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在日本只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使得国民中绝大多数人成为雇佣工人及其家属。

## 二、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阶级呢？

工人阶级，首先是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近几年，有人说工人阶级已“富裕化”，“拥有资产”，甚至已“中产阶级”化，等等，众说纷纭。的确，现在的工人，同战前及战后一个时期相比，他们已有各种家具、汽车、家用电器，甚至还有自己的住宅。然而，这一切全是消费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必要的收入以维持自己生活的生产资料。

工人阶级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自由的）阶级。在这一点上，虽然同是参加劳动的阶级，但是它又是与自耕农、自营业者不同的阶级。

同时，从身份上说，工人阶级是不隶属于别人的自由的阶级。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属于自己所有，因而，能把自己身体所具有的劳动力，作为自己所拥有的商品来出卖。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所能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劳动力，不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就不能生存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

购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人，当然就是私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能生产剩余价值，能使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契约，决不可能在公正的条件下缔结。即使工人拥有住宅、汽车、耐用消费品，但没有生产资料这一点还是工人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特征。同时，工人阶级还具有以下的特点，工人阶级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sup>①</sup>。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大规模的发展，与其他劳动阶级，如自耕农及自营工商业者在大资本的力量面前失败、没落的状况相反，工人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发展到占人口的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劳动最主要的承担者。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将成为废物，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活动也将停业。

### 三、何谓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关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马克思曾叙述如下：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①</sup>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中，这一“贫困化”理论，是受到来自资本方面的以及来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最激烈攻击的理论之一，也是妄图抽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修正主义思潮首先要“修正”的理论。因为是否承认在资本积累的另一极，工人阶级的贫困也正在积累，这个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路线的问题。如果资本的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能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就无需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无需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了。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并不意味着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下降，衣、食、住等生活条件恶化，生计窘迫的工人数量持续增加。所谓工人状况的恶化即贫困化，归根结底不外乎是他们社会状况的恶化。

社会状况恶化首先表现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 高度发展，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整个社会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和扩大，与此相应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却明显下降。其次，它还表现在，少数资本家的巨额个人收入和奢侈的生活与工人的痛苦的生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马克思说：“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sup>①</sup>

列宁也批判了否定工人阶级贫困化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强调贫困化是就社会意义来说的。他说：“马克思谈的是贫困和受鄙视等现象的增长，同时也指出了相反的趋向和唯一能产生这种趋向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已经被现实完全证明：第一，我们确实看到，资本主义有产生和加剧贫困的趋势，即使不存在上述相反的趋势，这种贫困也极可观。第二，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不适应。”<sup>②</sup>

当然，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挨饿的“绝对贫困化”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还呈扩大的趋势。在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3,000万人，有几十万无家可归者和儿童流浪街头。在日本，有1,183万个家庭，约占全部家庭的31.8%，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以下，约有235万个家庭是老年家庭和母子家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此外，据推算，除了约有70万需救济的家庭之外，收入在救济标准以下的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7—368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4卷，第177页。

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贫困，可以说是“绝对的贫困”，同时，社会贫困的扩大和深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人的工资水平越来越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增大，这种状况促使妇女、儿童也进入劳动市场。在今天，为了勉强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平，全家劳动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人数剧增，人口向城市集中以及全家劳动，给工人带来了“新的贫困”，并使问题更加严重化。

对于集中在城市的工人来说，住宅、交通、环境、公害、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由于妇女参加劳动以及全家劳动的发展，使得以往靠家务劳动处理的领域，也得由社会来保障，因而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在日本，公共设施落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中尤为突出。

第二，贫困化，不仅表现在工人的消费生活方面，而且还由于在劳动过程中剥削和压迫的强化而更加深化。

在劳动现场，在资本强化专制统治的状况下，工人从事长时间的、超强度的劳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工伤事故、工人患精神及神经障碍等疾病以及“过劳死”的数量激增，这是最能说明现代工人贫困化的一个方面。

这种在劳动现场剥削和压迫的强化，还同资本专制造成的调换工作、出差、单身赴任，进而还同公共设施和制度的落后结合在一起，加剧了家庭破裂、青少年犯罪、性颓废、犯罪率增加等工人道德颓废现象的发展。

## 新中间阶级事实上与传统的 工人阶级具有共同的客观阶级利益\*

经济组织和劳动分工的最新变化，使经营、管理、监督、销售、服务、核算等工作大量增加。这些职业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有许多共同特点，与资本家和劳动人民都有很大区别，足以把他们看作一个新的中间阶级。人们对新中间阶级是否具有阶级属性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答案，表明问题并未解决。

**马克思和新中间阶级**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阶级关系的论述的核心。在马克思提出的阶级体系中，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马克思不否认其他阶级的存在，但认为他们有着向两极分化的趋势。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二阶级模式。他们主张把新中间阶级纳入有关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学说，把它和工人阶级区别开。其论据之一是认为工人阶级从事生产劳动，而新中间阶级从事非生产劳动。虽然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明显的区别，但不能把它同阶级差别等同起来。另一个论据是认为新中间阶级完成资本家的职能。但管理的职权是根据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授与的，管理人员不能从受他支配的劳动中获利。

**维贝尔和新中间阶级** 维贝尔理论是一种多阶级体系，他是用“生活机遇”来解释“阶级状况”，因而促使许多人

---

\* 摘自〔英〕J·M·巴巴莱特《阶级理论的局限和地位概念的消失：同新中间阶级有关的问题》一文，载《社会学》杂志，1986年版。

根据工作者的就业情况来确定各种人的阶级差别。新维贝尔主义者便是以就业情况（一方面是收入、工作保障、晋升机会，另一方面是工作任务和关系）的差异为依据，把新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分开。新维贝尔主义者的难题是，他们对新中间阶级就业情况所作的分析，既用来证明它不过是个地位不同的群体，也可用来证明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地位是声望还是权利** 对于维贝尔来说，地位取决于“社会对于荣誉的敬重”，这里只强调社会评价和声望。实际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时，声望并不重要，因为民主和市场关系促使一种可以用金钱换来声望的地位序列取代传统的地位序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着以社会公认并带有强制性的规范为基础的不平等，工会和职业团体的经济权利便是一例。同业工会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为获得权利而斗争。

**阶级的权力和不平等的权利** 阶级不平等不仅是分配上的不平等，主要还是关系上的不平等。占有优越物质条件的人被赋予相应的权力。有一个阶级行使资本的权力，便有一个阶级受这种权力的支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说成是雇主和受雇者是说得通的。雇主阶级的最终要求是行使权力降低雇佣市场的价格，受雇者阶级则反抗雇主阶级的权力以便使本阶级成员的需求得到稳定的或更大的满足。所谓新中间阶级尽管同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以及无组织的工人阶级有种种不同，可以明确区分开，但他们终究受到相同的限制。而且，他们同雇主的关系本质相同。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地位的群体。

**政治观点和阶级利益** 新中间阶级事实上与传统的工

人阶级具有共同的客观阶级利益，尽管他们的文化倾向和政治方向(或叫主观利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应该说是从共同的阶级处境派生的地位差别。

## 在瑞典，阶级社会绝不是临近消逝\*

众所周知，通常把瑞典看作是这样一种国家，在这里，资本主义达到了极其高度的进步，似乎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几十年间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拉平”的趋势。

自然，在瑞典生产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改变着这样一些社会经济参数，诸如，自立人口的数目和成分，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的职业——部门结构。这些变化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这些变化进行细心而不带偏见的分析时就可看到，在我们思想论敌的武库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其实质在于，根据官方的雇佣劳动的统计，在瑞典，近50年来，非农业部门工人的人数减少了。工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也相应地下降了。

资产阶级专家们在声称工人阶级“消失了”的时候，援引的正是这些简单的材料。但是，这类概括并没有被若干方法论的根据和更详细的统计计算所证实。

首先，我们指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社会界限问题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抛开词句上的伪装，可以把这种解释

---

\* 摘自〔瑞典〕K·X·赫尔曼松(瑞典左翼党执委会委员)《现实资产阶级的神话》一文，载〔苏〕《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85年第11期。

归结如下：归根到底包括在工人阶级成分之内的只有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者。与这种粗俗的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规定：第一，构成狭义的工人阶级的是在物质生产（工业、建筑业、水运业、电业、农业、林业）中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一切在企业中进行劳动并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第二，马克思主义者也从广义上来研究工人阶级，包括广义的工人阶级内的，不仅有生产领域中的工作者，而且还有在非生产领域中工作的为数众多的集团以及无权的国家职员，在流通和服务领域处于类似地位的私人企业的职员，等等。雇佣劳动者的这些集团同生产工人一道组成整个工人阶级。

根据这种方法论，可以分析一下瑞典工人阶级（从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方面来研究）人数变动的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可以从瑞典资产阶级学者G·泰尔鲍恩的调查著作（《瑞典的阶级结构〔1930—1980年〕》，隆德，1981年版）中取出统计资料来进行这种分析。尽管这些资料并不包括最近的10年的，然而，它们可以使我们看出，在50年的时期内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变化的长期趋势。

至于说到狭义的工人阶级，那么重要的是指出：在这个时期（1930—1980年）内，农业领域，即在农业、园艺、渔业中就业的工人人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瑞典农业人口锐减（占自立人口的4%以下），同时农业工人人数大为降低。50年前，它在国内无产阶级中占1/5，而现在他们则占1/30。这就是由于农业中的科学技术进步而触及世界上一切工业化国家的最大部门变化的结果。

在瑞典各工业部门内的就业则形成另一种情况。在这里，

工人人数（这里指的只是5人以下企业的工人）直到1965年（包括1965年在内）一直在增长。1930年产业工人有435,000人左右（占自立人口的10.7%），而到1965年产业工人人数已达到685,000人（即占自立人口的13.3%）。后来产业工人人数降低了。在1980年，属于这类工人的有595,000人（占自立人口的11.2%，同上书）。在80年代，变化是不稳定的，因为在有些年内，例如在1984年内就可看到工业中的就业有所增长。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根本没有变化：剩余价值和绝大多数国民收入的生产者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从38%到27%的雇佣劳动者，而工人阶级的传统核心依然是产业工人。

也应当考虑到，在我们所考察的30到80年代的很长而又很大变动的时期内，影响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是极其强有力的因素——科学技术革命、生产的国际化以及瑞典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的变化，等等。正如所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活劳动的科学技术进步，其中包括在完全机械化的瑞典农业中活劳动的减少，归根到底在极大地限制了瑞典生产就业的扩大。从70年代起，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外市场（1/3以上的国内工业产品在这里销售）竞争激化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同样地减慢了。

生产的国际化趋势也同样地影响了就业，结果在60到80年代内，主要在外国企业而不是国内企业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了，因为瑞典已成为若干跨国公司的基地，在这些公司的许多外国大企业里，目前就业的增长比在瑞典的分公司内更迅速。在1979年，仅在10个跨国公司的外国企业里工作的就有214,000人（同上书）。



虽然上面所列举的所有条件对瑞典的一般就业水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协调一致的部门结构的发展却是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核心的社会经济界限还保持着。所以情况并不是这样:瑞典资本正在非工业化,或者工业资本的发展不再导致居民的非无产阶级化。资本的积累具有国际性质并且碰到了日益增长的困难,这在国内生产就业结构上反映出来。

十分紧张的部门间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并不证明工人阶级“消失”。比如说,如果1980年在纺织工业和针织工业中工人人数比1965年减少了2/3的话,那么,反之,在食品工业和汽车工业中就业却增加了。在按工作人员的数量在瑞典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床制造业中,在1965年到1975年内就业增长了,尽管过了5年后又回到了过去的水平,但目前又正在增长。

统计资料说明,狭义的工人阶级按其数量及其在关键部门集中的程度来说,从劳动同资本对立的观点来看,仍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范畴。工人阶级“消失”的趋势并未显露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非生产领域内劳动性质和就业的变化对工人阶级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重要的是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越来越广泛地囊括生产本身,而且囊括流通和为居民的服务,独立的企业主——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过渡到现代雇佣劳动的过程加强了。

所谓“劳动再生产”(即以工作者全家的力量和时间的消耗来恢复他的劳动能力)领域的变化也对雇佣劳动的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

再生产（即借助于某种数量的生活资料来恢复工作者的劳动能力和维持他一家的生活）是在工作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这是社会上不计算的、无报酬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供养人”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这种家务劳动在家庭经济范围内会逐渐消失而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市政的和国家的服务企业所使用的雇佣劳动所取代。

所有这些便使直接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工人阶级得到非物质生产和服务领域的雇佣劳动者的庞大的补充。

由于这些领域的扩大，例如，在商业中就业的工人人数便从1930年的65,000人增加到1979年的140,000人，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虽然最近2—3年内增加不多。办事员名额也大为增加了。饮食业、洗衣业、缝纫工厂等的工作者的人数在公共部门内从20,000人增加到380,000到420,000人，在私人资本主义领域内从5,000人增加到20,000人（同上书）。

所有这些劳动者集团同生产工人一道组成工人阶级。在50年内，资本主义对劳动进行剥削的条件使得那些处于工人地位的人的人数摇摆于占人口的35—38%之间。在绝对数上，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内大约增加了40万人。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几乎同前半期一样。从1979年到1982年，基本经济部门内的总就业数大约增加了4万人，失业人数几乎增加了5万人（计算所依据的数据载于《劳工统计年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出版，日内瓦，1983年）。换句话说，在80年代初，工人人数有增加稍快于减少的趋势。由此可见，从长期看，出现了惊人的稳定状况。

总之，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阶级人数逐渐减少，这个阶级接近于完全消失的论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只要把这种论断用现实加以对比的话。虽然工人阶级成分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近10年来瑞典并没有非无产阶级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属于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的客观条件当然是这样一种情况：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因此，工作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个别资本家、资本家联合体（通常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而存在）、国家或市政机关。

但是，并不是一切获取工资的人都成为工人。雇佣人员也以执行企业委托给他的某些资本主义职能。这些职能以组织计划、监督、行政活动及其他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事这些活动的是各种中间阶层（包括企业经理）。因此，一个人属于工人阶级不仅决定于这个人受雇佣的，而且决定于他不是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社会权力（经济、政治、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权力）的社会集团的人。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消灭或根本消除基本社会阶级之间的经济及其他差别。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保持着明显的社会差别。有助于保存阶级关系的这种趋势实际上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表现出来了。对于工人和普通职员说来，甚至起码的劳动权即生存本身都经常受到威胁。在住房的分配、受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的可能性方面，在保健、生产事故发生率以及利用空闲时间等方面，都充满着阶级不平等的现象。工人的个人财产大大少于特权社会阶层的个人财产，这种情况促使各阶级物质状况差距的扩大。

上述总结中所描绘的情景证明阶级不平等在一切领域内的统治。例如，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提供给工人子弟的个人能

力实现的条件，甚至在他们受到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也不同于中间阶层(可以列入中间阶层的是这样一些人，除小资产阶级外，泰尔鲍恩本人在他的调查著作中认为他们是特殊类别的人，虽然他们是“受雇佣的，但是，他们同统治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联系的”，同上书。这里指的是那些维护和帮助保持统治阶级权力的集团。)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拥有的那些条件。

各个社会集团的劳动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对工人比对职员来说，更普遍的现象是：沉重的体力负担，工位的有限独立性。由于喧闹、剧烈的污染、接触核物质、振荡等，工人劳动的环境常常是不好的，工作时间不适宜，提高熟练程度的可能性不大，而劳动操作单调。

由此可见，不是保持着现状，而是阶级不平等的加深，工人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问题在于，不仅工人阶级的住房和休息条件，而且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比特权阶层和阶级要差。调查报告说：“在保证医疗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引起健康状况的差别，这表现为死亡率上的差别。我们未能发现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有某种拉平的现象。”(瑞典经济学家J·奥德诺菲：《劳动市场是否处于危机之中》，载L·霍尔耶尔松等著《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地区安排工作政策》一书，斯德哥尔摩，1984年版)

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可以说，在瑞典，阶级社会绝不是临近消逝。甚至即使说在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进程中，在各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变化，而制度的主要特点仍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一切重要指标上，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他们利用文化成果的可能性都比

其他阶级要差。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断言，阶级社会似乎已经蜕化变质，工人阶级融化于无组织的具有平等权利公民群众之中，是错误的。

## 黑人与白人仍然不平等\*

自1964年的民权法案颁布以后，25年来美国黑人和白人在收入、教育、职业和就业方面的不平等被缩小到何种程度了呢？

**收入** 1967年，年收入不足5,000美元者在黑人中的比例相当于白人比例的2倍，1986年，前者是后者的4倍。1987年，美国白人中等家庭收入从1986年的31,935美元增至32,274美元，而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从1986年的18,247美元降至18,098美元。过去20年内，富人（主要是白人）更富了，而穷人（主要是黑人）则变得更穷。1987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白人所占的百分比大大下降，而黑人中穷人的比例上升。

**教育** 自民权法案颁布以来，黑人和白人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有所减小。不过，近年来的趋势表明，黑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正在失去他们的地盘。60年代和70年代初，黑人曾在教育方面获得了一些权利，而自1975年以来，这些成果一直在不断丧失。从1975年到1985年，白人青年中上大学者的比例从53%提高到55%，而黑人青年中的上述比例从48%降低到44%。在研究生中的这一比例的下降更为突出。从1976

---

\* 摘自〔美〕《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4期。

年到1985年，黑人中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下降了32%，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下降了27%。上述情况是由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造成的。

**职业和失业** 1988年，白人担任经理和专业工作者的可能性比黑人多一倍以上。而黑人从事服务业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不平等还反映在黑人和白人的失业率上。即使黑人具有和白人相同的学历，失业率上的差距也是很大的。1964年黑人失业者与白人失业者的比例是2.1:1，1987年仍是这个比例。而在大都会地区和中心城市，这个比例更高。

在美国，白人对少数人群体(有色人种)的歧视依然存在。受歧视程度依以下次序递增：亚洲人、西班牙语美洲人、美洲印第安人、黑人。在居住问题上，对于亚洲人和西班牙语美洲人来说，随着这些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种族隔离程度有所降低。城市化是他们在空间上与白人同化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但这一过程对于黑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黑人的种族隔离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基本无关，多数黑人都高度集中在大都会地区的中心城市。这种状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由于就业机会从中心城市移到郊区和非大都会地区，较新较优厚的职业机会都在远离黑人居住区的地方，从而迫使黑人家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找工作。因路途遥远造成的开支又降低了黑人的实际收入。此外，黑人工人往往集中于生产行业中比较古老的工厂中，这些工厂也是最经常被关闭的工厂。

总之，黑人与白人仍然不平等，而由于住房问题上的种族歧视，在美国的大都会地区居住区的种族隔离程度很高，黑人的城市化程度很低，从而更加重了这种不平等。这种歧视

迫使许多黑人居住在中心城市，而职业和其他机会却正在移往郊区。

## 美国黑人的状况\*

在美国，3,000多万黑人与其他种族的公民相比，受教育少，收入低，生活环境恶劣，且早于其他种族的人死亡。25年前，美国就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但种族意识仍象一部老电影一样遗留在美国人的思想中。

从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白人认为黑人是平等的，1/3强的白人认为由于与白人相比黑人缺乏雄心和自制力，所以不能把事情做好。测验还表明，只有少数黑人认为他们是平等的，许多黑人确信，白色美国会乐于尽其所能地使黑人处于社会的底层。许多白人原则上支持反对种族歧视，而实际上并不这样做，许多黑人又太相信那些法律条文，这样一来则使那些正逐渐衰弱的条文显得更加无力。

现实的黑人社会正遭受着早孕、吸毒、犯罪、艾滋病等苦难的折磨，而根本原因是经济不景气，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使黑人陷入了都市中的贫困，当然，他们的肤色也使得他们很难逃脱这一命运。这样说是因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社会隔离。在美国，白人和黑人常在一起工作，但却很少在一起娱乐，他们很少居住在同一区域；第二，种族间固定的陈旧印象；第三，由于民主党对黑人选民实行限制，黑人的选票则不象白人的选票那样受到竞选者们的惠顾。

---

\* 摘自英国《经济学家》编辑部文章（1990年3月3日）。

在城郊能建立一个家庭是美国人所期望的，而且也常常是能实现的。早在战后黑人由乡村到城市、由南方到北方之前，一些城市中的白人中产阶级就已把眼光放到了城郊，而黑人的移民加快了他们的行动。一般说来，如能有钱，黑人也会情愿象白人一样到郊区去住，但这很难。虽然在美国，白人住在纯白人区的比率在80年代已由47%下降到35%，但住房上的黑白隔离依然存在。尽管种族歧视已消灭，可那些相当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要想摆脱他们的生活圈子也是困难的。一个寻找住处的黑人，无论他收入多少，受教育程度如何，让他在黑人区或一个合得来的邻居之间做出选择，他倾向于选择前者。

说起黑人生活的圈子和模式，不禁使人想起那生活在拥挤简陋的公寓中接受救济的单身妇女。在黑人儿童中有一半的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白人儿童仅有16%)，而这些孩子中2/3的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一个由单身妇女支撑的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是一个由一对夫妇组成的家庭收入的1/3。

许多移民团体都曾提出过传统的办法：教育。许多黑人青年都有犯罪前科。尽管现在很多黑人青年能够完成高等教育，但仍被认为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许多没有父亲的黑孩子，他们失去了父爱和行为的楷模，又被他们那些自己还是孩子的小母亲所溺爱。那些常担心成为威胁对象的教师们，对黑孩子天生的固执大惊小怪，对待他们十分冷漠，把他们送入特别教育班，许多孩子就是这样在对当今社会的复杂和需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离开了学校。

黑人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它不会因为肤色而冷淡他们；希望能有某个党，能够承认黑人选民，并赢得胜利。



## 贫困向少数民族和妇女阶层集中\*

在60年代，美国通过开展公民权运动和执行约翰逊政府的“向贫困开战”的政策，废除了种族歧视，使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大大前进了一步；60至70年代的女权运动又使对女性的歧视得以废除，从而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从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已发展为世界水平的福利国家，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这股潮流却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倾向。首先看一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变动的两个特点：第一，黑人中的贫困层比例一直是白人同一比例的近3倍；第二，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中南美裔民族的贫困化速度很快。美国的中南美裔人通过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近年增加得很快，1985年时已占美国总人口的7%，成为仅次于黑人(12%)的少数民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讲西班牙语，生活方式和文化也保持着自己的特点，这一人口的增加对美国的文化统合构成了威胁，因而受到保守派别的猛烈攻击。

各种族间的收入差距，80年代以后已有所扩大。在70年代前半期，黑人工资相当于白人的61%，到80年代已降到55%左右。各个种族的失业率也不一样，在70年代前半期，黑人的失业率约是白人的2倍左右，到80年代已上升到2.5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人青年的高失业率，在80年代，16—19岁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为40—50%，20—25岁黑人青年的失

\* 摘自〔日〕《经济》1988年第6期。

业率约为25—30%。

今天的美国正在为因离婚而导致的家庭解体以及吸毒、少女妊娠等社会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及黑人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黑人青少年是美国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与这个问题相关，我们来看一下黑人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在1960年时，白人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为24.30%，而黑人高中毕业生的同一比例仅为18.7%；到1975年，白人的这一比例仍在缓慢上升，而黑人的这一比例却迅速下降，从而又扩大了白人和黑人的差距，1985年白人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为35.0%，而黑人仅为25.5%。

歧视女性的现象比较复杂。从全日制职工的工资来看，男女依然不同，但是其差距已有所缩小。1980年女职工的周平均工资相当于男职工的64.4%，1985年上升到68.2%，可见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至少使女职工的境遇有所好转。与日本等国的女性相比，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不过，如果从整体来分析美国女性的话，结论则有很大变化。在贫困层人口中，生活在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1969年占43.2%，1985年上升到49.5%。在男女就业逐渐平等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女性贫困层的扩大，与美国的社会问题，对黑人的歧视以及青少年问题有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女户主中的42%是黑人，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户主中的73%是女性；从青少年来看，在全国15—24岁的户主中有3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比例在15—24岁黑人户主中占62%。可以说，在那些既有了孩子又没有接受充分的教育，而且不能做全日制工作的阶层，贫困的队伍正在扩大。

## 二 “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 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当今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与以前的债务危机尽管特点不同，但在资本主义史上，债务危机却不是绝无仅有的。外债累累、财政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的通病。与之相比，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银行大亨主动向弱国提出延长贷款偿还期一直是西方扩张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或者为殖民主义的完全占领，或者为某种经济和政治渗透提供进身之阶，从而为外围国家长期依赖帝国主义中心奠定基础。

有关第三世界债务问题的记录不胜枚举。18世纪70年代，埃及政府负债累累，以致于不得不把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二用来还债，并且最终为英国侵略和接管埃及提供了借口。19世纪，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比利时、希腊、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曾经由于还不起外债而导致列强直接控制这些国家的财政。在拉美历史上，也有无数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尽管有这样一连串的记录，但第三世界过去和现在的债

---

\* 摘自〔美〕哈里·马格多夫《第三世界债务：过去与现在》一文，载《每月评论》1986年2月号。

务还是有一些重要差别：

(1) 过去，延长贷款偿还期与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常常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的地盘，把非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帝国主义体系；现在是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已经策划的各种干预形式大多是为了阻止外围国家脱离中心，阻止它们失去与帝国主义体系的联系。

(2) 过去，海军和军舰是用来讨债的；目前，在一个具有尖端技术的时代里，加上发达的银行国际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是主要的执法者。

(3) 现在，若干大债务国的拖欠，就比过去更有力量造成金融中心的极大混乱。

不过，除了这些差别以外，过去与现在之间也有一定的基本类似之处：

(1) 延长贷款偿还期给贷方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利润，它还是开辟其他经济渗透形式如市场、投资机会、开采自然资源的工具和支柱。银行大亨与他们的国家之间还有一种共生关系：延长贷款偿还期是扩大贷出国势力范围的外交手段；一旦必要，国家就会直接或通过国际机构讨还债务。

(2) 通过银行向国外发放贷款，是不停地追逐更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和20年代一样，人们在世界各地财政部长门口的台阶上，经常可以看到等待接见，以便提供其贷款的代理人。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就象是一些麻醉品推销商。但是，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第三世界的统治阶层也已经吸毒上瘾。结果，最近的债务膨胀导致出现了类似于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进退维谷。美国银行的强有力的行动推动大多数借债国陷入了负债累累，借新债只是为了还旧

债的状态。

(3) 贯穿于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共同局面是：涨潮时，外围国家淹没在金钱的洪水中；一旦退潮，他们则落入金钱的陷阱。同样典型的是，除非革命政府拒付前任统治阶层的债款，否则，为债务所迫的沉重压力，最终还要由下层阶级来承担。

陷入无法挣脱的债务圈套的典型国家，则是那些被开拓为殖民地或成为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前哨部队的国家。长期的殖民主义和经济渗透，产生了一些单方面的、极不正常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的模式——就自然资源的开发、工业和外贸而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由外国投资和贷款来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中日益兴起的商业团体，都是和这些新模式相适应的团体，所以，他们没有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的目标和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这一类资本家阶级与外国投资者和银行大亨的通力合作，为了把贫穷的民众牢牢掌握在手中，他们又依靠与封建贵族的合作。由于高度依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市场和投资，所以，这个阶级经常求助于向国外借款，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依赖关系。当然，债务只是控制你掉入依附性陷阱的魔爪；亦如所见，债会越借越多。而且，外围国家与宗主国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是这样。这生动地揭示了隐藏在第三世界国际收支差额背后的秘密。

一个骗局总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那些制造骗局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受骗的人。受骗者往往是那些单纯、幼稚、容易被人欺骗的人们。不过比较典型的是那些心甘情愿地主动陷入骗局之中的人，就第三世界（指不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编者)的名流权贵来说，肯定正是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最上层的厚颜无耻的人都热衷于鼓吹自由市场和资金自由流往国外，他们寻求的自由不但是从国外得到钞票，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利润舶往其他国家。的确，第三世界的大量财富，多年来一直不停地在美国和西欧转换为银行存款、不动产、企业或证券，即使在债务危机达到顶点时，这种情况也还在继续着。世界银行的估计表明，从1979到1982年间，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的外流资本约达670亿美元。有充分理由相信，1982年以来，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外流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在《挑战》杂志1985年11—12月号的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里，圣·路易斯州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费利克斯曾提过这个问题。他在综合了若干来源的信息后得出结论：富裕的拉丁美洲人至少已经把1,800亿美元，即相当于这一地区目前外债的一半，都存在于该大陆以外的地方。在资本外流的同时，工资和预算却被削减了。然而，那里对于收回这些财产，以便减少外债这一点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不屑讨论一下。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样作会干预资本家的财产权。

人民正在忍受着不公平的压榨，而私人资本却准予流入安全而又有利可图的避风港，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详尽的回答将需要更广泛、更复杂的分析，这远不是本文所能及的。但是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附于中心的那种关系的性质，以及迁就支配着不发达国家的那种不稳定的阶级联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拒付债务以及外资国有化，也不被认为是跳出债务陷阱的一条可行之路。这样的激烈行动，必将

要求从根本上重新确定经济的方向，使其朝着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而且，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利益与现存国际社会结构完全一致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

## 债务国的虚弱地位\*

第三世界欠债情况如下：

1971年        900亿美元

1979年        5,300亿美元

1982年        8,500亿美元

1989年        13,000亿美元

1982年至1988年，发展中国家共偿还利息和本金9,000多亿美元。1982年以来借款增加并不是得到更多贷款的结果，因为自1983年起，偿还利息和本金已超过新的贷款。1985年至1988年，债务国每年以1,500—1,600亿美元的速度在偿还债务，但由于利滚利的积累，债务仍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债务国的人民来说，债务危机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

债务国人民忿忿不平的是，当时通过借债获得的大部分好处被达官贵人所窃取，其财富已被存入国内银行，而现在偿还债务却成了全民的事。由于人民越来越懂得了债务危机的实质，要求政府停止偿还债务的政治压力也与日俱增。

许多债务国近年来积极组织出口以图摆脱债务危机，加

---

\* 摘自〔瑞典〕《瑞典内部》，1990年第2期。

强出口成为他们所谓的“结构调整”的中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全然不顾环境保护问题，致使生产环境恶化、污水泛滥、空气污染、自然保护区丧失等情况频频出现。有些国家为了能取得增加出口的效果，甚至关闭学校和诊疗中心。

不少拉美国家为了减轻债务愿意低价出卖资源。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可以优惠价格购得股票、不动产、农场、森林等，例如他们可以购买智利的森林，在最短时间内砍伐大批成材的树木而获利。这种做法在国际金融界越来越流行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同，但对债务国来说，将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问题。

近年来，工业国一直把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有毒垃圾贮存地。一些公司发现，毒害贫穷国家比把有毒垃圾存放在本国要廉价好多倍。由于债务的压迫，不少不发达国家政府同意接收各种包括放射性废料在内的有毒物质。西非、加勒比地区和若干亚洲国家已与发达国家签订了废物贮存协议。据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UNEP)统计，仅非洲国家就有十来个国家签订了或正在签订该类协议。虽然国际舆论谴责这种做法，但仍无法阻止这类交易的迅速增长。

总之，债务危机使得债务国尤其他们的人民处于更加依赖别人的虚弱地位。掠夺人力资源和破坏自然的作法更加突出，剥削和毒化第三世界国家仍在继续。现在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将擅长于做“干净的”和有利可图的生意，例如电子和新信息技术，并继续改善生态环境，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大自然，而占据着世界人口很高比例的贫穷国家将继续在饥饿和污染肮脏的环境中生活下去。



## 美国垄断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掠夺\*

拉美许多国家在19世纪初就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不过这种独立并非真正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独立。美国把拉美看作是它的“后院”，从政治上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侵略与干涉，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从经济上把拉美作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以及原料的供应基地，阻碍自立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美国的战略。古巴革命成功，拉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它的战略。“进步同盟”的出台就是战略转变的具体体现。它的目标是标榜土地改革、工业化和民主化，在拉美各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用以防止古巴革命的蔓延，消除要求变革的人民的的不满情绪。不过，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强烈反对，土地改革基本上没有进行，而由于美国的支配，民主化也成为泡影，剩下来的只有一条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路线。

与美国的战略相呼应，拉美各国从60年代开始先后建立起如同得到美国支持、通过军事政变而建立起来的巴西军事政权那样的强权体制。在这种强权体制下，最优先的目标是，依靠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来实现经济增长，用以巩固强权体制。积极地引进外国资本和低工资劳动力的存在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拉美各国所实行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开

---

\* 摘自〔日〕德永良明（日本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拉丁美洲经济与美国垄断资本》一文，载《经济》1990年第2期。

发,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完全一致。对美国垄断资本来说,在这种有利的投资环境中,可以保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要保持这种有利的投资环境,就必须通过投资支持强权体制,使之保持长期的稳定。

.....

在1982年资本净流入额减少以前的1977—1981年这5年,(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包括再投资)额为149.09亿美元;而投资收益额为281.22亿美元,再加上手续费和专利权使用费23.45亿美元,总收益额共达304.67亿美元,总收益额超过总投资额155.63亿美元。从拉美这方面看,这就意味着数额达155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

如上所述,拉美各国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从70年代起有了巨额逆差。大部分逆差是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造成的。据说1974年巴西贸易收支逆差46.84亿美元的46%、经常项目收支逆差71.47亿美元的34%是115家跨国公司造成的<sup>①</sup>。此外,跨国公司还利用以在拉美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和形成共同市场为目标而成立的地区合作机构所给予的优惠条件,在拉美地区内部贸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接着我们再看看美国跨国公司在拉美农业领域的活动。

1978年美国进口170亿美元农产品,其中40%来自拉美。由此可见,拉美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sup>②</sup>。农业在拉

① 见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选编》第17页,1985年版。

② 见R·巴巴克、P·弗林:《农业综合企业》,1987年版。

美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是那些工业化进展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出口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拉美的香蕉产量占全世界香蕉总产量的48%。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农业的支配以香蕉为最典型。拉美香蕉出口国基本上得不到什么收益，绝大部分收益落入了垄断全世界香蕉市场70%的迪尔·蒙特等美国3家大公司的腰包。当今跨国公司是否直接从事生产，这无关紧要，通过流通、加工和销售可稳获暴利，这是一大特征。这些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和支配，保存了大土地所有制，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其结果是使农村失业增加，贫困化加剧。

.....

拉美的工业化和经济开发，对外依靠的是两根支柱：一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一是美国跨国银行的贷款。在拉美的累积债务余额中，借自民间的债务特别是借自商业银行的债务的比率很大，而借自美国商业银行的债务的比率尤其大。

在流入的外资当中，民间资金所占的比率截至50年代是低水平的。进入70年代以后，借自民间银行的债务急剧增加，而借自美国民间银行的债务的比率也愈来愈大。1986年10月，在拉美10个债务国借自民间银行的债务余额中，借自美国民间银行的债务所占的比率竟高达40%，金额为761亿美元<sup>①</sup>；其中巴西和墨西哥的这项债务余额分别为237亿美元和242亿美元，两者合计占63%。

由此可见，美国跨国银行不仅与拉美累积债务的增加有

---

<sup>①</sup> 见1987年5月21日《日本经济新闻》。

密切关系，而且在此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

美国跨国公司在拉美工业化、特别是在化学工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使拉美各国改变了历来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大大地提高了工业品出口的比重，确立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巨额贸易收支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对外债务也增加了。这是美国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

拉美各国原本打算通过工业化和经济开发以发展经济、出口工业品以获取外汇，从而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但依附于跨国公司扩张的工业化，却加深了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附，以致于导致经济危机。而依赖跨国银行的开发政策的必然结局，则是累积债务增加，从而在金融上加深对帝国主义诸国的依附。因此，可以说美国垄断资本是造成拉美各国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

##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本质\*

近几年日本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增加特别显著。日本政府在第4次中期目标中，提出了从1988年到1992年向发展中国家回流500亿美元的方针。

---

\* 摘自〔日〕鷺见一夫(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问题》一文，载《社会党月刊》1990年2月号。

为大肆宣扬此举，“对世界做贡献的日本”、“援助大国日本”之类的宣传到处可闻。但许多日本国民都对此困惑不解。

### **多种面貌的政府开发援助**

援助有各种不同的面貌。大体可以分：人道主义的援助、怀有经济企图的援助和政治战略性的援助3种类型。当然，这些又常常搅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划分。

由于“援助”这个词具有打动一般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的作用，政府一直把人道主义的援助计划或项目摆在前面加以宣传。然而这种援助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且用钱也比较少。

用钱最多的是第二种类型的援助。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招引企业利益的性质很强。如在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的铁、铝冶炼项目，政府开发援助是以投资或贷款的形式支援日本企业向海外扩张，并为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作准备。

另外，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具有政治战略性质。这种性质以前都是内在的。近几年由于美国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求“分担责任”的呼声增强，就以“国际的责任”或“应分的负担”等名义为理由公开地提出来了。如“小马歇尔计划”（对菲律宾的国际援助构想）就是日本政府基于把菲律宾维系在反共防卫体制内的战略考虑而提出的。

### **日本援助的特点**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日元借款所占比重极大，并且偏重于大规模建设项目。一般人认为，日本国际合作事业协会（JICA）负责的“赠与”是政府开发援助的中心部分。但是，从款额上看，以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ECF）

为窗口的“日元借款”却是较多的。1987年两者的构成比例是前者为42%，后来为58%。日元借款相当多的部分是用于发电站、道路、港湾、机场等基本建设项目。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中，用于基建项目的比重很高。开发援助委员会（DAC）参加国在这方面的平均数是20%，而日本所占比率则为43%。

这类有关经济基本建设的项目，由于对受援国的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特别要求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然而，日本的援助贷款对这一方面却几乎不予考虑。因此，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正在世界各地愈益严重地扩散着“公害输出”和“环境破坏”。

#### **支持输出公害的政府开发援助**

近几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公害问题的严重性大大缓和了。虽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强化了“限制公害”，但是，实际上是由于把公害企业转移到了海外。始川崎制铁公司，就是因为千叶县居民反公害运动的高涨而把它的铁矿石烧结工序转移到了菲律宾的梅兰老岛。但是就象这样的公害企业向海外转移，有时甚至也利用国际合作事业协会的资金。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还招致热带雨林的大量破坏，例如马来西亚沙捞越的森林道路建设，巴西亚马逊河东部地区的热带林的破坏，都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有关系。

#### **开发模式与援助模式的破产**

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扭曲，由于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扩大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纳巴达溪谷的水电站建设计划了。这个计划拟定在今后50年内，在纳巴达河流域建设30个大型的、135个中型的和3,000个小型

的水电站。这个计划如果实施，100万以上的人口(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就要被强行迁出，约35万公顷森林和20万公顷农田将被水淹没。由于这个计划是为了小部分富裕阶层谋利而牺牲社会底层、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因而在印度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日本以同世界银行合作贷款为名提供日元贷款，结果为日本企业招来了相当于援助款10倍金额的建筑订货。

### 欺骗性的植树造林合作

近年来产生一种可称之为地球环境问题的狂热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披着热衷于协助“环境保护”的外衣，打出援助植树造林事业的招牌。然而，实际情况是极具欺骗性的。可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植树造林事业为例。

日本本州造纸公司下属子公司汇特公司于1971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丹地区取得了森林采伐权。1973年开工。该公司从这个森林采伐木材，制造削片，再卖给本州造纸公司。采伐是以伐光砍光的方式进行的。当这个地区的森林采伐罄尽时，国际合作事业协会以无偿技术合作的形式，于1975年—1976年，为该地区派遣调查团制定了造林计划，并以试验性造林的名义，在1975年提供了9,780万日元(利率0.75%，偿还期限20年，延期偿付5年)，1977年提供了3亿2900万日元(利息2.5%，偿还期限18年，延期偿付10年)的贷款。

其实，国际合作事业协会所实施的合作植树造林不过是对日本企业乱砍乱伐造成的荒废林区，以技术合作的名义协助制定造林计划，并对采伐的企业以试验性植树造林事业的名义提供低利长期贷款。而且在这个计划中种植的又都是适于做削片用材的速生树种，对当地居民毫无用处，既不能提

供果品和药材，又不能保持水土。依此看来，就不能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国际合作事业协会进行的所谓造林合作，究竟是为了谁？

同样的事例在西新不列颠州也有发生。日商岩井公司出资75%与当地合办的公司也展开了大规模采伐活动。值得惊奇的是这种采伐竟然得到了国际合作事业协会开发贷款的资助。该协会从1973年到1980年间，分别为当地的道路建设，修建简易机场，开设商店、诊所和木材生产、加工提供大量的低利长期贷款。在该地区林木采伐接近尾声的1979—1981年，也派遣了调查团，制定造林计划，推行试验性植树造林事业，而其具体承担者则为日商岩井公司。

由此可知，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既支持输出公害，又造成受援国家的环境破坏。而且援助的大部分，只对受援国的一部分富裕阶层和日本企业有利，对受援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土著居民，只能起到压迫的作用。

### 三“经济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十分尖锐”

#### 经济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十分尖锐\*

当我们进入90年代时，三种全球性的变化正在顺利地进

---

\* 摘自〔美〕C·弗雷·伯格斯滕〔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前任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助理部长（1977—1981年）、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助理（1969—1971年）〕《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一文，载《外交季刊》1990年夏季号。



行着。第一，苏联与东欧的改革。它如果成功的话，将结束冷战和大部分东西方对抗，并将大量裁减军备。第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将明显下降；经济将更上升到全球议事日程的首位。各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将越来越取决于其经济威力而不是军事实力。美国的相对实力，以及甚至还有苏联的相对实力都将下降；欧洲，甚至还有日本的相对实力，都将上升。第三，世界经济将完成其从战后第一代的美苏统治体制向美国—欧洲—日本的“三极”发展。

9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世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新的国际框架是否会产生经济问题上的冲突抑或产生竞争与合作结合的健康局面。历史使人认为，有发生冲突的相当大的危险性，也许会从经济领域迸发出来，造成或加剧政治上的对抗。这种格局曾经使1914年前的世界秩序遭到破坏，并且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再次产生作用。目前是建立一种避免未来出现这种紧张局势的全球性框架的时候了。

鉴于安全排发生变化，这个世界应当调整以适应主要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的结束可能大大加剧贸易战的形势。在整个战后时期，由于安全是压倒一切的迫切问题，削弱了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的经济争端。美国及其同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为了避免损害它们的全球安全结构，经常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冷战政治实际上保护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保证了美国对它们的支持。美国很少为寻求其经济目的而直接使用其防卫力量。

取消“安全层”可能减少这种分隔。当然，美国及其他国家可能很想利用安全问题来寻求经济利益，这样的政策将使经济与安全领域保持合作变得相当困难。同时，由于东西方

冲突为整个战后时期的许多美国国际义务提供了理论论据，所以结束冷战可能向某些美国人表明，美国大体上应该退出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这种义务。

总之，在主要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化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相互影响；取消“安全层”便增加发生经济冲突的危险，这会损害安全关系。

经济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十分尖锐。日本政治家石原进太郎预言，“21世纪将是经济竞争的世纪”。这种冲突最可能出现在美国和日本之间。

由于日本，美国的挫折仍然很严重，日本同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仍然很大，而且由于前两年日元疲软以及日本经济增长减慢，它可能不久再次上升。看来日本市场不接受多数进口商品和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无法打入的情况还是非常令人气愤的。日本集中力量在大范围内寻求战略高科技工业的优势，其中包括美国保持着很大竞争优势的许多部分，这是最使人感到担心的事。

关于欧洲，普遍感到担心的是，一个真正联合起来的欧洲大陆将认为自己能够自给自足，并且一心想着地区发展，从而对促进全球性经济合作不感兴趣。的确，欧洲委员会本身对统一欧洲市场的研究报告预示，由于排除了剩下的贸易障碍，来自欧共体外部的进口商品几乎每个部分都将减少。

欧洲共同体的一个动机是恢复欧洲大陆的世界领导地位，要求恢复历史上早期欧洲各成员国所享有的真正光彩夺目的形象。在由经济问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上，追求经济领导权可能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

这种动力如果受到美国和日本一致政策的支持（或引

导),可能是相当大的,它可能推动欧洲走向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合作领导地位。但由于欧洲目前的政策忙于农业与飞机,也可能会在对抗方面摇摆不定。把银行和工业紧密联系起来的联邦德国模式,有时由于政府的支持,是一种可能引起外国恼火的做法,法国历来实行的重商主义显然仍然很有活力,它一再努力排斥日本的竞争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东欧国家的卷入可能增强欧共体内由国家指导和控制的经济思想。如果市场导向的英国在这个重要过渡时期宣布放弃欧共体的选择,对抗的风险将会增加。

最后,美国对它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信心已经动摇。贸易界的“鹰派”表示,由于取得某些成功,削减必要的防务,目前正在为单方面采取行动足以促进美国贸易利益开辟途径。美国现在对其盟国所希望提供的帮助确实更少了一——由于已不再需要把压倒一切的优势放在政治凝聚力上,美国的影响已达到最大限度,从而也就降低了它的经济需求。

美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早已加剧,而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对抗也会迸发出来。美国经济任何明显的下降都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对外赤字重新上升会使1985—1987年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7个主要工业国集团的其他几位财政部长制定的战略失去信用(该战略主要通过货币兑换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对贸易上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特别是由于这种合作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或多次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失败,都会加强“谴责外国人”的趋势。

这种经济冲突在90年代以及90年代以后受非军事关系和三大经济强国支配的世界里将如何演变呢?一种可能是出现

一些集团，每个集团以“三强”中的一强为中心。世界已经向这个方向前进，这是普遍的看法。

在此刻，发展亚洲或美洲的集团似乎是不可能的。亚洲的贸易被分成三个方面：本地区内的贸易，同西半球的贸易，以及同欧洲和中东的贸易。从政治上看，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参加由日本领导的集团，除非所有的其他途径实际上都走不通了。美洲之间准备磋商可能受到欢迎，但除了世界上实际失败之外，与亚洲相比，更不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个重要的集团。

对潜在经济冲突产生影响的第二个问题是，“三强”中各自将如何同别的国家相处。目前，经济强国在不同问题上使它们自己跟别的伙伴密切合作：美国与欧洲试图打开日本的制成品市场；美国与日本促使欧洲避免对外国实行任何新的歧视政策；欧洲和日本批评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的单方面行动。改变结盟状况一般来说会为体系的稳定提供某种健康的基础，如果这些联盟出现在一致国际条例和金融协定的框架之内的话。

不过，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几乎所有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都认为，三极体系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历史和角逐理论都认为，在这样一种安排中，每一方都强烈倾向于担心其他两方面会联合起来长期反对自己，这就必定使各方都采取过火的政策。要是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自认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攻击，那么事实上，两方往往会在大致三极平等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可能建立它们自己的“二元核心”统治。

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三强”之间的冲突将

演变成美欧联盟反对日本，把日本看成是贸易与投资问题上的局外人。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为其他工业国家、或许还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普遍可以看出，出现了一些种族隔阂，即使这不是故意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国和日本将拴在一起反对联合的欧洲。如果欧洲的确是唯一的集团，并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经济实体，那么，其他全球性的角色出于传统的权力均衡就可能需要联合起来反对它。如果欧洲转为向内看并且对外公开歧视，那么这种结局是很可能的。

然而，美国人必须知道，很可能是第三种可能性：欧洲一日本的联合。这些地区在未来重要的过渡时期可能享有比美国更高的增长率——或许以相当大的幅度增长。大概最重要的是，欧洲和日本以及亚洲其他部分对美国未来的劲头普遍抱有疑虑，欧洲人和日本人也许觉得，只有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施加外部压力，美国才会革新其国内政策。美国采取的任何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将使这些疑虑增加，从而促使欧洲人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施密特和德斯坦于70年代末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以缓冲来自美国的经济不稳定性。90年代以及以后的时期，亚洲和欧洲之间显然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联合。

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联合作为一种永久性结构的存在，都将使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事务变得极其不稳定。以这种“联盟”为目标的地区由于外部压力促使国内力量不断加强，几乎肯定会转为向内看。它们早已在寻求诸如美国保护主义、欧洲地方主义、日本传统主义这样的方针。预定的区域可能会寻求组织(或扩大)由邻近的支持者参加的集团，而其他区域

则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

## 资本主义内部开始一场新冲突\*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选择1989年作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冷战寿终正寝而资本主义内部开始一场新冲突的一年。如果说原先的那场冷战是追求军事优势驱动下的一场竞争的话，谋求经济和技术上的统治地位将会推动这场新的竞争。日本的倏然升起使得美国日益不安全。然而驱使美国遏制日本的，与其说是日本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如说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沦丧，而这又助长国家的不安全感和仇外心理。

贸易赤字和债务国地位不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危及国家的安全，但是这两者已经颇使人烦恼了——助长了美国的国家不安全感。其结果是对外的沙文主义抬头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国家不安全感已经开始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诸如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义务分担、第三世界债务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前途等。在所有这些领域，美国人看来最担心、也是最不满的、因此也占去决策者最多的精力和注意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无疑就是日本。

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存在，美国逐步从主张多边自由贸易的世界斗士变成了这种贸易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国会

---

\* 摘自〔美〕沙菲奎·伊斯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国际金融问题研究员)《资本主义陷于冲突之中》一文，载〔美〕《外交季刊》1989/90专号。

为寻求美国失败的办**法**，对外国进行了研究，对此的反应是，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称其为“撬棍”。然而，这根撬棍由于背离了多边贸易的主张，从而危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本身的存在，并没有把封闭的市场撬开多少。

对于美国8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里根这位战后最热衷于放任主义的总统的主持下，美国自30年代以来最厉害地倒向了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在里根对货币市场采取自由贸易的态度以及肿胀的美元迫使他放弃对商品市场采取自由贸易的态度之前，倾斜就开始了。里根任总统不到6个月，他的贸易代表就迫使日本“自愿限制”汽车的出口。1984年，里根再度当选前几个月，日本还被迫自愿限制对美国纺织品的出口。在里根的第二次任期内，这些限制一直有效，里根政府还对钢铁和机床的进口提出了自愿限制的要求。

1986年7月，日本终于同意增加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配额，以避免美国实行反倾销税。这一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国从纯粹依靠限制外国进口转向采取一种强化的态度，包括为美国的出口采取保护性的行动。这样一来，就播下了“受管制的贸易”在80年代末变种的种籽。

1986年，日本逃避了反倾销税，但是1年后，由于违反关于半导体的协议，而遇到了关税；1987年4月，里根总统对日本的某些产品的进口征收报复性关税。这样一来，里根获得了可疑的盛名：他成了战后第一位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总统。里根在任职的最后1年，进一步实行保护出口的新战略，他签署了《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同时，他的贸易代表起劲地对进口实行有原的攻击：对中国和墨西哥的纺织

品与服装以及其他国家的钢实行配额；对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南朝鲜和荷兰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对巴西和日本实行经济制裁。

现在，布什政府正设法在自由贸易和受管制贸易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办法是更加看重后者。在受管制的贸易范围内，新政府也正在改变进口限制与出口保护间的平衡，大力推行后者。

为了达到这些新目标，美国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办法。在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具有可靠的竞争优势的领域，布什政府仍然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决定对贸易谈判采取多边的态度。在涉及具体部门利益（大部分是高技术或低技术的制造业）的时候，布什政府采取单方面的态度。最后，全盘的贸易政策则看来越来越受制于“集团主义”和“双边主义”。

华盛顿奉行集团主义和双边主义只会鼓励别国也这么干。同加拿大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导致了同墨西哥、甚至同日本达成类似的协定进行会谈。它还使人担心出现了一个“北美要塞”，而这个要塞面临的是其他国家拼命想冲破它的壁垒，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建起它们自己的壁垒。美国在贸易上所作出的姿态使北方的日本和南朝鲜，南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紧努力，把现有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扩大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建立一个太平洋集团。布什政府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太平洋伙伴关系”，派了3名内阁高级官员去该新组织11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会议。这样一个集团会利用美国来充当对付令人担心的日本统治地位的缓冲物，亚洲的伙伴们还会利用它作为打进北美要塞的入口。



双边主义也越来越影响美国限制进口和保护出口的政策，而且主要是针对日本的。里根政府同日本的贸易谈判中做到了从奉行“以进程为目标”的政策，变为奉行“以结果为目标”的政策。这样一来，早先的开出详细冗长的清单的办法和后来的开出优先项目的清单的办法（诸如面向市场的具体部门进程），变成为迫使日本参加双边卡特尔的政策，1986年的半导体协定就是一例。

布什政府现在又使双边主义前进了一步，奉行一种旨在同不公平的外国——请读作“日本人的”——贸易做法作斗争的以结果为目标的政策。布什政府执行这一政策的工具是“积极进取的互惠”和“报复性超级301条款”这一双重棍子。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受到过于严厉的打击，正在提出众多的主张来促进进口，其中最新的一项是通商产业省给日本公司进口产品扣减税赋的计划。

美国专为日本设计的最新的一项政策措施是所谓的结构性障碍倡议会谈。这一会谈还谋求日本人接受西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和习惯：少储蓄，消除效率不高的夫妻店，破除各种企业集团之间的长期关系。华盛顿认为，排除这些“结构性障碍”将使日本的市场为美国的企业开放，并减少对日贸易赤字。

日本政府顾及国内对另一轮美国单方面压力作出不利的反应，利用这一会谈来要求美国接受一套“东方的”价值观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日本告诉美国的是：更多地储蓄和投资，不鼓励公司追求短期的利润，鼓励公司改进商业上采用可行的研究成果和技术，花更多的钱来训练和教育劳动力。

然而，这种态度在缓和日本国内对日益增强的美国压力

的激烈反应上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日本的舆论正越来越变得反美，这是一种日益感到不满、受挫和受辱的情绪。美国的态度也正在加强崇拜日本帝国主义的右翼分子和鼓吹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的地位。反过来，日本的反动分子又使美国更加热衷于通过积极进取的互惠和受管制的贸易来打开日本的市场。这些政策在美国搞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自由的思想库分析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中日益得势，从而使国会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弹药，来推动政府沿着保护主义的有害道路进一步走下去。

### 我们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一浪胜一浪\*

1989年，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高达490亿美元。若到1995年，这个贸易逆差完全消失，那么，美日关系就会转向平静，是这样么？

当然，该预测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尽管它可能发生），但主要观点不在这里。我们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一浪胜一浪，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至多，它只是太平洋两岸彼此间感到的忧虑和不满的象征。如同经济一样反映出来的情绪高度紧张是不那么不容易通过谈判来消除的。

如果日本所有的出口，比如说，都是小玩意儿，美国会

---

\* 摘自〔美〕罗·J·塞缪尔森《畏惧与幻想——感情如同经济一样被卷入美日冲突》一文，载《新闻周刊》1990年4月2日。

介意吗？不会的。真正使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日本在一个接一个的高科技领域占有统治地位的这个幽灵。让日本人愤怒的是美国人从不放松对日本的指责，尽管日本增加了它的对外援助和进口，但是批评和责难还是愈来愈烈。消除无效率的农场，放弃夫妻店，美国想用他们的想象去改造日本。

甚至熟练的穿梭外交贸易差额的巨大变动，都不能弥补这些隐晦的抱怨。美国无法中止日本技术上的飞跃，日本也不能在外来压力下与外界绝缘。

美国与日本之间共同具有谬见。美国的谬见在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会威胁到美国的生活水平。的确，一些美国公司已受到伤害。但它们的破产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恶化，也不仅仅日本产品的美国买主得到了益处。

日本的谬见是所有来自外国的批评者都是因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美国人在日本国内未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不够。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却掩盖了一个真正的事实：日本从不希望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艰苦努力。外国人在日本的存在是那样的少，决非偶然，请看：

日本进口的制造业生产的货品价值约等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3%，而这个比例在美国是7%，联邦德国是14%。

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的总额为日本全部公司资产的1%，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9%，在英国是14%，在联邦德国是17%。

日本认为他们自己享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理解。正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林肯在他的一本新书《日本的不平等贸易》中写的，这是使保护主义

的政策和态度合理化了。一些贸易障碍是超乎寻常的。1900年，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日本提交了一份关于一种基本集成电路的专利申请报告，这份报告直到1989年才被批准授给，这样，就给了日本芯片产业30年的自由发展机会，以致目前它已处于领先地位。

让美国感到烦恼的是日本的态度。当日本被允许在其他国家自由地经营活动时，他们自己的市场却用政府的或文化的障碍来限制别人的进入。这些所谓的“公平”是一种政治上的必要，如果外国看到自己被排除在日本市场与日本国内投资之外，特定的手法将不起作用。相互限制的需要最终地将证明是不可抗拒的。

但这毕竟是个事实，日本在每个变化上都取得了一些进步。有些美国人的担心是偏激的，许多美国人似乎进入这么一种幻觉，有一天日本将操纵美国，日本将使美国的一半公司破产，同时买走另一半公司，所有外国厂商（不单是日本的）所雇佣的劳工占美国劳工总数的4%。这些过度的幻觉轻视了我们自己的力量而夸大日本的。1989年，美国傲居世界出口总量的第一位，联邦德国与日本次之。从东京股市最近猛跌的信息来看，日本的经济机器不象我们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完美。今天的危险是政治上的。两个国家都被公共舆论所夸大的民族骄傲和自尊所陶醉。美国的反日情绪激起日本的反美情绪，这是一种破坏性的逻辑。

## 要对“敲打日本”反戈一击\*

对日本来说，90年代是极为重要的时期，是可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战败到占领时期相提并论的大变动时期。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到90年代中期，《日美安全条约》很可能根据美方的通告被废除，对日本的“敲打”将会变本加厉。

在这激荡的90年代，日本将怎样生存下去？尤其是为了防止和消除变本加厉的“敲打”，应采取何种行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现在和今后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可称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称霸世界，在其基础上的日本经济增长，美苏冷战结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90年代是这种国际秩序大转折的时期。其先兆已在1989年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变化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变化，一是日美关系的质变。与此同时，围绕着日本的国际环境也正在急剧变化，日本已被赶到了应从根本上转变迄今的外交和政治的地步。如不能实现这个转变，日本将落在世界的后面。

最近，日美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即日美经济摩擦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将在90年代变得更加明朗。例如，“日美结构协商”这一名称就雄辩地说明了日美关系的质变。以前的经济摩擦，都是因纤维、钢铁、彩电、汽车、半

---

\* 摘自〔日〕外添要一（东京大学教授）《90年代日本的生路》一文，题目为该文的副标题，载《宝石》1990年第1期。

导体产品等个别商品发生的。但是，现在已越过了这个阶段，把日本社会或美国社会的结构本身作为问题提出来，议论的范围扩大到对方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上。正因为这个缘故，才冠以“结构协商”的名称。简言之，干涉内政，管闲事管到了彼此的价值观上。

1989年为进行结构协商来日本的美商商业部代表卡拉·希尔斯是这样责问日本的：“由于日本的流通体系复杂且不透明，美国企业根本无法加入进去。由于大城市的地价昂贵，普通的日本人盖不起房子，即使盖得起来，也象兔子窝。因此，美国造的大型家具和家用电器，虽然很漂亮，人们也无法购买。”“停止幕后交易吧！你们储蓄过头了，买更多的东西吧！”对此，日方回敬美方说：“你们过分奢侈，请多储蓄吧！”

美国的汽油费太便宜，每升价格日本是120日元，美国只有30~40日元，只有日本的1/3或1/4。美国人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比日本人多4倍。因此，日方就指责美方说：“由于美国人如此奢侈，才产生资源枯竭的问题和二氧化碳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最严重的是由此产生了财政赤字的问题。”

彼此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要求对方“改善”，对此，双方的反应都是：“这是我们的事，你别管闲事。”这就是日美结构协商的现状。

就流通体系的问题来说，依我个人之见，日本式流通体系还是不改为好，因为它有不少优点。然而，尽管日本的流通体系具有很多优点，但在外交场合，当美国“要求改善”时，日本却很难说一个“不”字。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相互条件的平等。日本若想作为国际国家生存下去，对此就不能说一个“不”字。这一点对美方也是一样。美国对日方要求其增加汽

油税金的主张，虽然心里想着“这是我们的事情”，但在今天的状况下，美国人也难以开口说个“不”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目前的日美结构协商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也干涉生活方式。过去从来没有走到这一步。然而，日美结构协商却已开始进行，可见日美关系正发生了多大的质变。

下面从另一角度谈一下日美关系的变化。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现已沦落为债务国，而日本作为战败国接受占领，现在却发展成为债权国。因此，在“金钱”方面，日美双方的胜负已成定局。日本用闲资购得蒂法尼的大楼、洛克菲勒中心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等，由此产生了种种摩擦。

在高技术方面，双方的胜负也已成为定局。在一部分军事技术领域美国还在领先，但到90年代，在这些领域里日本也将赶上和超越美国，而且将会拉开距离。总之，日本开始以“金钱”和“高技术”支配世界，对此美国深感恐惧。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FSX（航空自卫队下一代支援战斗机）的共同开发。对日本来说，自己可以解决，无需共同开发，但考虑到日美关系，才接受了共同开发的要求。然而，美国国内的反对意见也是顽固的，因为宇航技术是美国优于日本的少数领域之一。90年代，日美之间在“金钱”和“高技术”两个方面的优劣将日益明显起来。这两个方面适用于所有武器。

从迄今的历史来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要在如下4个方面领先就可以称霸世界：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日本在金融方面已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方面也可以这样说。经济方面的衡量尺度是国民生产总值，若计算人均产值，日

本已超过20,000美元，超过了美国，在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国家中独占鳌头。

日本在金融和经济上能够居世界第一，全靠高技术、尖端技术。有尖端技术就会有钱。那么在军事方面，只要我们下决心，就不难成为一个大国。单靠决心不一定能够成为军事大国。但对日本来说，已有充分的能力，剩下的只是下决心的问题。

这样看来，支配世界的四要素中日本已具备三个，最后一个文化很重要，但问题极大。在文化上，日本在90年代能够拥有多大力量，这是消除外国的变本加厉的“敲打”、把21世纪变成日本世纪的关键之所在。

现在海部首相应该做的事情，是同苏联、东欧直接交换意见，尽早表示日本同美国不同的立场。如继续推进向美一边倒的外交，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人抄腿摔倒在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毕竟不是永久的，然而不管是自民党、外务省还是在野党，谁也没有关于日美安全条约之后的明确政见。为了在世界新体制下生存下去，日本必须从现阶段明确表明和美国不同的独立的立场。

现有的日本政党均已完全落后于时代，因为这些政党的区分立足于一个时代以前的旧论点，而不是根据今天和今后的日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区分的。在60年代，赞成或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来说曾经是重大的课题，因此代表不同立场的自民党和社会党有过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区分依然保留到现在，这就太落后于时代了。

政界应重新组合。按照旧的课题结成的现有政党应全部解散，要按今天的课题和主张分别组成政党。日本要想正确



地适应世界的动向，首先重建国内体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

综上所述，我对90年代的展望如下：首先，1992年欧共体的统一将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其次，到90年代中期，可能出现华约和北约的瓦解、日美安全条约的废除等事态。若果真如此，90年代后半期将是摸索新秩序的时期，21世纪将是崭新时代的开端。因此，留给日本的时间很少，国内的体制极其令人担心。

### 必须根除屈从美国的战后意识\*

日本应该拥有独自的世界战略，开展不受拘束的外交。在一定的情况下，日本也许选择苏联而不是选择美国。但是，我决不是说要废除日美安保体制。我作为一名政治家认为，日美关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即使对美国，在应该说“不”的时候就应该说“不”。而且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在美国歇斯底里之中，日本也许会成为“剿伐”的对象。

世界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美国进行的“敲打日本”将会如何发展？我认为，在冷战结束的时代，经济摩擦今后将会更加激烈。

今后的世界将会出现多极现象。日本、美国、欧洲——

---

\* 摘自〔日〕石原慎太郎（日本国会众议员、政治家）《我断然主张“日本可以说‘不’”》一文，载《宝石》1990年2月号。

这是包括将会统一的德国在内的欧共体所联合起来的欧洲，也包括以某种方式加入的东欧。几个这样的极将会在上世界上产生。在形成这种格局的过程中，日本所受到的责难将会和冷战时代一样。

这就是说，第一，会有这样的反应，“日本本质不同，所以是一种威胁”。其次，产生与这种威胁相对抗的结构，如保护性贸易和进行各种制裁等。这种动向现在也以经济同盟的形式对日本进行着，而最终将形成“剿伐日本”。

日本对此应有思想准备。如果说怎样反击之，只有停止继续对美国言听计从。日本应该具有坚定的主见，明确地表示赞同或否定。

索尼公司收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地产公司收买洛克菲勒中心引起了非难，称日本用金钱买走了美国的灵魂。应该说，这是出于视日本为落后民族的民族优越感的非难。

实际上，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曾向三菱地产，而且也向三井和住友的房地产公司提出过要求，希望它们购买。这是我直接从三井、住友两公司的最高层听到的消息。这就是说，首先出卖灵魂的正是美国自己。美国人也应该正确认识这一点。

在美国，对于日本问题，有“樱花派”和在议会占相当多数的“敲打日本派”。前者的代表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清醒地知道，日本的高技术及其批量生产体制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被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之中，所以“对日本不能只说坏话”。

但是，这两派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不希望日本比现在更强大。所以，国务院和国防部使日本的FSX国产化

的计划落了空。美国看了三菱重工的设计蓝图大吃一惊，他们清楚如果日本自己生产将会出现性能极为优秀的战斗机，相比之下他们自己想要让日本购买的 F15 和 F16 都象是被击落的出色的“第二种零式战斗机”。所以，他们以外交压力打破了日本的国产计划而改为日美共同研制开发。这一妥协是在中曾根首相时代实现的。中曾根在里根将军面前，是一个挺胸立正只会喊“是”的士兵。所谓“两根”外交实际就是如此。

日本在某些领域掌握着优于美国的尖端技术，这是手中的王牌，因此在外交方面应该明确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对方交涉。然而，为什么总是把这些王牌作为礼物而轻易地送给对方呢？

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国防部和国务院干得实在漂亮，而议会中的“敲打日本派”不了解内情却乱吵乱嚷，说什么“如果搞共同开发，就会让日本盗走美国的技术。还是应该象过去那样，让他们买我们的 F15、F16”。如果这样的话，好不容易实现共同开发的国防部方面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而且，议会又打了商务省的屁股，所以，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这是布什一竹下时代的事情。如果具体地说明其要求的不合理性，其中的一条就是，日本绝对不许将美国提供的技术转为他用，而美国则可以将日本提供的技术转为他用。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单方面条约。正是在这种时刻，日本应该坚决说“不”，然而日本没有这样做，始终采取卑屈的外交姿态，只要不引起纠纷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一个在美国占领时以美国意志造就的国家，它是没有自主精神的、没有脊骨的海参一样的国家。美国要使日本的经济获得成功，这是为了美国的亚洲，而不是为了同时

培养一个有自主精神的武士。

日本需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这样做，有时也会令美国讨厌，但对于建立真正的日美关系、使双方为了世界而进行有效的合作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根除屈从美国的战后意识。过去的日美外交是由长期束缚于战后意识的基层官僚进行的，这是日本外交陷于困境的原因。应该立即纠正这种外交姿态。

## 第五部分

#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

## 现代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 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消灭脑体

### 劳动分裂创造了技术条件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特征是，不仅单个的劳动手段由电子计算机来控制——即所谓反馈控制，因而整个生产体系和交通以及通信体系也都由电子计算机来控制了。办公自动化的迅猛发展，就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之一。60年代中期是特定产品加工的流水作业线，70年代中期是以数控机床为中心而形成的灵活生产体系(FMS)，而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以把电子计算机、智能机器人和厂内信息通信网络(LAN)等联结在一起的电子计算机统筹调控体系(CIM)为先导的生产体系。根据人工智能体系自动搜集到的生产线的信息，可以立即以不亚于熟练工程师的速度制订出工程计划的计划体系业已开发出来，并已开始实用，旨在开发比现在的运算速度快得多的电子计算机而正在从事约瑟夫森元件和超电导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为集成电路、微机 and 电子计

---

\* 摘自〔日〕中村静治(日本国立横滨大学教授)《现代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文，载《经济》1989年第10期。

算机研制通用软件的工程项目也已上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以同一操作程序操纵任何电子计算机，就如同汽车司机驾驶汽车一样。现在，在生产现场，操纵机械的劳动正在变为编程序的软件化劳动，而电视屏幕则发挥着集中调控和监视劳动的作用。在交通运输领域，船舶和飞机自不待言，就是电车和汽车也都安装了自动操纵装置。卫星通信和光通信的实用化因属电子计算机飞跃进步的结果，报刊杂志编辑和排版的高效率化亦系电子计算机大普及的结晶。

上述的一切都意味着传统熟练技能的解体，新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不同的技术生产者的诞生。这标志着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大飞跃。

其结果是，工人阶级中愈来愈多的人转向非生产部门，也就是第三产业部门就业人数激增，劳动力流动加速，从而进入了“自由劳动者时代”。据日本总务厅1989年2月调查，改行的人占全体就业人数的4.2%，过去一年中改行的人达247万人。而使这一“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商业化的，则是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利库路特公司。这家公司以电子计算机搜集各种就业门路信息，然后以电子计算机编辑排印价格极为低廉的就业向导和指南之类的信息杂志出售，其中仅一种杂志每周在首都圈范围内就销售20万册。据说60万字的稿件，利库路特公司用电子计算机排版，两名工人一天半就可以处理完毕。由此可见，利库路特公司使大批量廉价就业向导和指南信息杂志商品化，也是得助于电子计算机的。

应用电子计算机所引起的劳动内容的变化和劳动力的流动化，是一个飞跃；它的意义可以与从以纯机械的往返运动

为特征的单一工具向具有使部件对流运动、回转运动机能的复合工具飞跃，从手工操作工具向机械操作工具飞跃相媲美。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技术革命的最终归宿，将是劳动从资本的解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马克思早已预见到这一天的必然到来，他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中写道：

“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sup>①</sup>

为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这一自然规律、亦即铁的必然性作了充分的阐述。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一文中写道：

“马克思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科学著作中没有人象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我们将知道，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从而使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sup>②</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244页。

作为机械的发达和飞跃，由电子计算机控制所形成的自动化体系，电子计算机统筹调控体系的出现，正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形成新社会的因素”的“成熟”，以及他们所预见的扬弃那种把人终身束缚在一种劳动上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裂的技术条件的成熟。同时，自动化体系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它使直接劳动所起作用的比率大为下降，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前提之一的“边际费用递增法则”已明显地难以成立。日本的高技术商品席卷欧美各国，引起仅次于兵戎相见的激烈“摩擦”，其重要原因亦在于此。

### **现代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众所周知，现代的技术革命是从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为开发以原子弹为中心的新武器及其生产方法而揭开序幕的。1945年以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就是靠以核武器和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和中心货币美元的威力领导与社会主义相抗衡的帝国主义同盟的。这个帝国主义同盟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抗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等工农国家以及旧殖民地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且也是为了以协调的力量和体制对付帝国主义各国国内的革命势力。美国的垄断资本以资本主义世界宪兵的面貌君临天下，它插手干涉所有的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上的边界纠纷。这种干涉是亚非拉各地战后40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过的战争和内乱的根源。电子计算机也就是在这个干涉、战争和内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为攫取高额利润，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和技术(跨国公司化)。由于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世界性的技术趋同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进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



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迫使美国不得不撕毁美元兑换黄金的协定。从那以后，美元地位可以说只是依靠核武器来支撑了。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弹头的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却是世界上头号债务大国。就是这个国家的货币——美元，扮演着国际中心货币的角色。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上述过程中形成的。

日本资本主义壮大起来了，它成了世界头号的机器人王国（据1988年联合组织调查，美国拥有2.5万元，联邦德国拥有<sup>1</sup>.24万元，日本拥有4.67万元）；它依靠贸易顺差的积累成了世界的头号债权大国。然而，它必须依靠世界头号债务大国美国，为向军工生产倾斜的美国经济填空补漏；否则，便无法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局面。这也是一个矛盾。此外，核武器已经到了绝对不能使用的关头，因为如果一旦发生核战争就会毁灭全人类，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均将同归于尽，而地球则将重返冰河时代。尽管如此，耗费巨资大规模地生产核武器之事仍然在继续进行。如此等等，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走上了最后的悬崖绝壁。现代的技术革命以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明确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在考察各种变革时，必须如同马克思唤起我们注意的那样，要善于区别物质的变革，与人们在物质的变革当中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一矛盾而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凡处于如当前这种变革时期的大变革时期，总是要有一些曲解物质条件变革的意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意识形态风靡一时的。诸如否认自动化与机械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性，从而演绎出资本主义因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而发生

了质变的结论；说把现代技术革命推进到今天这种程度的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佳形态；说资本主义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向“超工业化社会”过渡；说现在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等等。为此，当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技术发展的辩证法，揭露上述各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正确地宣传现代技术革命的历史意义，以便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万众一心、共同行动的斗争中作出贡献。

## 国际合作不可能回避资本主义 经济反复出现的危机\*

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市场暴跌，接着引发了世界股市的连锁反应，据说它的直接导火线是由于美国财政部长贝克10月15日的一次发言。他对日本和联邦德国诱使利率升高的金融政策提出批评并要求加以修改。实际这乃是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也说明发达国家的政策协调体制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了防止美元贬值，美国如果执行紧缩金融的政策，结果就是股价下跌，经济萧条；如果放松一下经济政策，优先照顾股价和经济繁荣，则美元就会失去信任，外国资金就不会流入美国，于是利率暴涨，美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就愈感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日本和联邦德国如要放松一下金融政策，

---

\* 摘自〔日〕川锅正敏《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政策上已达到极限——“滞胀”与“国际协调”》一文，载《经济》1988年第1期。

不使日元和马克继续升值，则担心会发生通货膨胀，若要紧缩金融以防止未来的通货膨胀，又将招致美元贬值的后果。总之，主要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它们已无法坚守七国财长会议达成的协议。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光靠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也不能摆脱困境，因为目前所面临的不只是股市和外汇市场的危机，还有世界经济结构上的不均衡。这种形势如若任其发展下去，迟早会导致美元暴跌，这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体制的危机。一旦出现失衡就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应付得了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各国协调政策。人们几乎都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今天正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危机局面——“体制危机”和“结构不均衡”，即使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实施紧急的对症疗法也无济于事，因为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主要是在各国遵守“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贸易及关税协定”这两个协定的条件下结成的一种体制。由于美国滥发纸币和目前尚找不出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其他体制，以及各国垄断资本竞争激烈，更加深了对立和贸易摩擦，因而，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结构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又互为作用，终于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入了“滞胀”的阶段，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并打开局面，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在政策上顺应形势的措施。但只要过剩的生产力和过剩的美元问题得不到解决，“滞胀”的威胁就无法消除，在这个“滞胀”的新阶段中发生的“石油危机”，已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动荡。在日本，“滞胀”的新的表现形式则是国内产业的空心

化、大企业手中的剩余资金和大批失业。

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总是设法在国内外寻求对策，以掩盖其本身的脆弱性和矛盾，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克服当前的难关，不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可怕的“世界性通货紧缩”，似乎都希望美国政府能致力削减“孪生赤字”，因而选择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路线。但无论怎样加强这种合作，也不可能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更不可能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反复出现的危机。

## 面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未来10年充满着社会变革的潜在可能。随着第三世界无力偿还的债务的积累，以及我们周围的所有股票市场的崩溃，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正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同时，巨大的国际性的生产调整由于工业生产退出美国而得以进行，它留下一个为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提供服务的低薪服务部门。美国看来正向着一个不断增长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变化。

一个区分为拥有一切和一无所有的社会，它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者将起来反抗，要求变革。我预料在下一个10年间这样的运动，即使不能成功地产生实质性的变革，也会象本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一样，成为又一股风暴冲击美国资本主义的堡垒。每一次新的风暴将

---

\* 摘自《社会学综览》1989年第1期。作者〔美〕博纳西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职。

动摇这个制度的基础，直到有一天整个大厦倾覆。

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对它自身失去信心，结构内的冲突渗透到西方文明之中。科学——这个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挑战。玩世不恭的态度广泛流传，普遍的精神空虚及各种逃避现实的方式都是这种冲突的反映。

中产阶级也陷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为了生存，我们感到有必要做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确保我们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追求我们生存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正是那个压迫我们的制度。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种族主义根植于我们的结构之中，它不会因为宣称赞同某些肯定措施或任命几个很高层次的有色人管理者和专业人员而消除，也不会因为象黑人历史月等“多文化”方案的建立和官方指责种族歧视事件而消除。事实上，只要不平等本身没有受到挑战，种族主义的实质就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展望90年代，我看到一种需要，一种在基层进行广泛斗争的需要；一种在这个制度的底层，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结束剥削的需要。

作为结论，我想，要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必须同要求经济平等的斗争并行，两者不可分开。我相信20世纪90年代将从失望中产生希望，从分散中产生统一，从那些被现存制度当作弃儿的人中产生出领导。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一种倒退的倾向，但作为结果，我希望我们将被推向前进。象疾风一样，以更大的力量，向一个人都平等公正的社会前进。

## 财富占有不平等与经济萧条\*

在本书的第六章，我曾论证了财富占有不平等不仅加剧银行系统的不稳定，而且也使在经济受到衰退袭击时突然出现的投机诈骗活动激增。衰退与银行系统的崩溃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萧条。1929年，财富占有不平等达到了顶峰，恰好1%的美国家庭就拥有36%强的国民财富。结果，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经济灾难，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

由于20世纪60年代躲过了一次大萧条，90年代将会经历另一次累积的影响——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颗灾难的种子是由里根政府误入歧途的财政政策早就播下的。20世纪20年代，亲资方、亲富人的减税造成财富高度集中，这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1981年和1986年两次减税正在产生同样的结果。现在，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不要几年，它就会超过1929年所达到的顶峰。富人交纳低税只是造成财富占有不平等的一个因素。历史上的利率（本身就是财富集中的产物），是另一个因素。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在1986年几乎翻了一番——仅一年时间，便由14人加增到26人——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财富所占份额的日益扩大，是以牺牲穷人

---

\* 摘自〔美〕莱维·巴特拉（美国经济学家）《1990年的大萧条》一书第7、第9章，1987年版。

利益为代价的。占美国人口5%的最富有者的收入要比整个底层40%的人口的收入多得多。而且，1%最富有者所拥有的财富比底层90%的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这些数字都是不祥之兆。它向我们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次经济衰退将于1989—1990年来到，这件事与由于财富空前集中所造成的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结合在一起，将史无前例的萧条于20世纪90年代苏醒过来。

我们已经知道，低货币增长、低通货膨胀以及解除规章管制是20世纪20年代的特点。就这些方面而言，20世纪80年代，即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与20年代类似的情况。企业间的兼并活动也颇为相似。这两个10年都表明，工业的集中在迅速扩大。

20世纪20年代是共和党总统采取明显的亲资方、反劳工态度的10年。在这方面，80年代也与此类似。那时就象现在这样，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反映了货币主义的观点。那时就象现在这样，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确信，不可能有持续的萧条，尽管他们的逻辑全然不同。那时专家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自动机制能治愈其全部疾病，包括失业问题，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今天，相信那个自动机制的人不多了；而是相反，大多数人现在认为，政府有足够的经验去防止另一次危机。尽管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但专家们坚信，未来不会出现新的大萧条，就象他们在20年代那样。其实，当时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希费尔和丹尼斯·罗伯逊就曾庄严地保证，世界正处于发生经济大灾难的前夕。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两个10年之间，当然有些重要的差异。政府预算在20年代呈盈余状态，但到目前为止的80年代却有

巨额赤字，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有所改变。利率在当时很低，但在80年代却创下了新纪录。20年代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近5年来，美国却一直受着前所未有的债务折磨。

两个10年之间的这些差异清楚地表明，有利于获得者的西方时代在20年代达到其顶峰，而现在却正处于气息奄奄的状态之中。事实上，我们不应该为这些差异而大惊小怪。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料到这些差异。令人吃惊的倒是为我们所发现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就是有规律的周期。

美国经济表现出两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一个当然是财富和收入的集中日趋严重，另一个则是庞大的预算赤字。

改变这些趋势的明确办法就是恢复里根总统任职以前的那些税率。然而，这个方法只能部分地解决预算赤字问题，很难减轻财富占有极不平等的现象。国会两院经济联合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83年，占美国人口1%的上层人物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1/3以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一直在奉行减轻收入和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但成效甚少。遗产继承法、累进所得税、赠与税等等漏洞百出，致使富人得以避免按其全部纳税份额付税。其实，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全然没有触及财富占有不平等中的最大因素——遗产继承税，该税继续有利于巩固少数人手中的财富。

作者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根源是：政府受到有钱人势力及其院中集团势力的操纵。

作者认为，应该创造一个理想经济的社会。政府规模小和社会各阶级间财富占有不平等的差别小是这种经济的显著特征。在美国将会出现民众资本主义或工业的民主，蓝领雇员



和白领雇员的代表将要管理工业。公司利润是今天财富占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将要在民众中进行分配。一旦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能够通过遗产税而被缩小到最低限度，这种不平等就会被制止住。在经济衰退时期，将不会有雇员被解雇，因为全体雇员在集体地管理工厂，仅仅劳动时间会减少，从而全体雇员平等地分担商业合同的负担。那时，将不需要失业补贴和为此而产生的官僚机构。同样，在经济高涨时期，全体雇员共同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由于财富占有不平等的差距很小，将不会出现投机狂热现象，因而也不会出现大萧条。简而言之，借助于根本的经济改革，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大动乱的萧条，还可以创造出一种对人人都公平的理想经济。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已经无法维持下去

在7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状况明显加剧，其政治结构的危机也变得日益严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无法维持下去。这种趋势在80年代越发强烈了，它表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正在进入一个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

一系列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动荡不安，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主要，它们构成了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 
- 摘自〔澳〕M·施米德《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经济特征》一文，载《社会主义学术界》1986年第11期。

第一，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仍然是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因此，这些矛盾不断导致各种新的危机，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不稳定。这些危机中包括国内和国际方面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危机、能源危机和其他资源的危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社会进程的机制遇到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资本主义改变其组织形式、社会政策和政治战略，而这种调节机制曾有助于资本主义去适应过去数十年中千变万化的形势。

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曾发生过上述类似的情况。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将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便得以苟延残喘。在其最初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经济对加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具体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这种调节形式再次发生了变化，这种趋势给资本主义总危机增添了新的和长期存在的特征。与此同时，极为混乱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生产进程也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

决定资本主义总危机特征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与和平政策分庭抗礼的帝国主义势必要与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这给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增添了另一个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正面临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无法控制的局面。近10年来，这种状况急剧地激化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质量和数量”的比例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力调节劳动和资本的分配之间的旧矛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无力去调节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这对于再生产过程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资本主义生产也面临着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新矛盾。科技

进步大大减少了人直接依赖于机器的现象，这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创造性地自我表现。但与此相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让工人们更加服从于资本调节，使他们完全听任结构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生产技术设备的消极影响等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试图通过“适应性”战略来解决危机问题。但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的适应性战略既不可能克服其内部发展所固有的客观矛盾和局限性，也不可能消除新的世界范围的力量(如民主力量)平衡。